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民族之光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民族之光

拉美独立第一国

1801年，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第二次出征意大利，就在他取得了马伦哥大捷，迫使奥地利签订和约后不久，忽然从加勒比海的法属殖民地传来报告：海地黑人的暴动已经不可收拾，当地人民已经制定了宪法，规定要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族独立。一个叫杜桑·卢韦杜尔的黑人，已被选为海地的终身总统。

拿破仑吃了一惊。海地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岛国，但他却不愿轻易放弃。考虑到自己正在忙于平定欧洲的反法联盟，无法抽身，于是他把妹夫黎克勒叫来，任命他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带领54艘战舰和3万士兵前往海地，一定要让法国的旗帜在那里重新飘扬。

拿破仑为什么会不惜血本，派出如此庞大的远征船队？杜桑·卢韦杜尔又是谁？这要从海地的特殊地位说起。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圣多明各岛的西半部，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为法国所侵占。岛上居民大多是非洲黑奴的后代。1791年，法国革命政府准备解放黑人奴隶的消息传来，海地的奴隶主们惊恐不安，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黑人要求废除奴隶制的革命。同年8月22日，黑人领袖布克曼领导黑人奴隶举行大起义，他们手持砍刀、斧头，到处捕杀奴隶主，烧毁种植园，向海地角进军，短短两个月，就有200多个种植园被焚毁，2000多名奴隶主被打死。

法国占领军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杀害了布克曼。这时，原来在起义队伍中担任军医的杜桑·卢韦杜尔迅速崛起，很快成为黑人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

杜桑·卢韦杜尔，1743年5月出生在海地的一个黑人奴隶家庭。从小给奴隶主放牧牲畜，后被提拔为牲畜管理人，因而他有机会接受教育，读过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学习过古代军事家的战略战术。他十分痛恨奴隶制度，向往着人身自由。布克曼发动大起义后，他率领1000多名黑奴参加了起义队伍。开始任军医，后来经常被邀请参加起义领导委员会讨论重大问题。

杜桑主张采用游击战术，为此他亲自训练了600人的游击部队，打了不少胜仗，使得起义部队军威大振，杜桑也成了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

为了实现奴隶解放和国家独立，杜桑等起义领导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决定采用灵活的斗争方针，先与西班牙建立暂时的同盟，共同打击法国侵略军。但不久杜桑就发现，西班牙的盟军英国人又在被收复的城镇中恢复奴隶制。于是，杜桑利用1794年法国政府批准解放海地所有黑人奴隶法令的机会，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他写信给宿敌拉奥将军，表示海地人民已获解放，他愿与法国人站在一起，拉奥表示欢迎杜桑从圣多明各回到海地，并授予他中将军衔。拉奥任海地总督后，又任命杜桑为副总督。杜桑回到海地后，不动声色地为海地人民的解放做看准备。

他先率领部队猛攻西班牙人，把他们赶出了海地北部，然后以北部为根据地，经过3年的准备，又带兵南下攻打英军，在阿尔蒂波尼特河谷一仗，获得全胜，迫使英国人投降。最后分兵两路，赶走了东部残存的西班牙人，解放了海地的全部领土。

在解放海地国土的过程中，杜桑始终巧妙地维系着同法国的“友好”关系，表现出一副法国爱国志士的样子，使法国人放心。此时的杜桑虽已年近

半百,但仍过着普通士兵的艰苦生活。他参加过 200 多次战斗,负伤 20 多次,两颗门牙都被弹片打掉。士兵们不仅把他当作无可争辩的军事统帅,而且当做共患难的朋友。

1798 年 4 月 14 日,杜桑率领起义军胜利进入海地首都太子港时,只见他身着将军服,头裹黄头巾,在大风雨中受到全城居民的欢迎,场面异常感人。

法国政府为了控制海地,曾派埃杜维尔前往海地,并以高官厚禄诱骗杜桑到法国去。杜桑坚定地表示,现在“还没有一条大得可以容纳我的船只”。埃杜维尔诱骗不成,便煽动黑白混血人与黑人火并,杜桑则平定了叛乱,把埃杜维尔赶出了海地。

1801 年,杜桑率军解放圣多明各市,使全岛实现统一,海地宣告独立。同年 7 月,海地议会通过宪法,宣布解放全部黑人奴隶,选举杜桑为终身总统。

正处于声威显赫时期的拿破仑,当然不会容忍海地独立,他准备重新征服海地后,以圣多明各为基地,在美洲建立法兰西殖民大帝国。杜桑预计到法国人不会甘心,但没有料到拿破仑会派出如此庞大的远征军。为了保卫海地来之不易的独立,杜桑振臂疾呼:朋友们!整个法国都开来要使我们重新沦为奴隶,“让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是应该得到自由的。”

在杜桑指挥下,海地军民把法军将要登陆的城市放火烧光,并在水中放了毒粉。法国远征军登陆后一筹莫展,反而被海地的游击队打得狼狈不堪,一个月内损失了 5000 人,另有 8000 多名伤员和黄热病患者住进了医院,黎克勒感到已无法用武力征服海地,转而采取“谈判”阴谋,准备诱捕杜桑,借此瓦解起义军。

黎克勒写信给杜桑说:我们谈判吧,我保证你的安全。你将会发现没有比我更诚实的朋友了。杜桑轻信了黎克勒的“诚实”,仅带着养子和一名副官前往谈判地点,马上被法军逮捕,并于 1802 年 6 月由法舰“英雄号”送往法国,监禁在靠近瑞士边境的一所监狱里。但他仍对海地的前途充满信心:只要我们手里还掌握着枪杆,你们法国人高举屠刀的手总有一天会瘫软下来的。

1803 年 4 月 6 日,杜桑病逝于狱中。临终前,他仍乐观地表示:“他们毁灭我,不过是砍倒了一棵自由之树,这棵树一定会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的根已深深扎在地下。”

海地人民没有辜负杜桑的期望。他们重燃革命之火,狠狠打击法国远征军,消灭法军 3 万余人。1803 年,法军被迫投降。

1804 年 1 月 1 日,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海地正式宣告成立。这个奴隶创建的国家,赢得了美洲各国人民的尊敬,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多洛雷斯的呼声

1810年9月16日凌晨，四名勇士策马奔驰在墨西哥瓜那华托平原上。不久，他们到达多洛雷斯镇教堂，把一个名叫伊达尔哥的神甫叫醒，气喘吁吁地告诉他：一个叛徒泄露了武装起义的计划，西班牙军队正在进行大搜捕，情况万分危急。伊达尔哥当机立断，决定立刻举行起义。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教堂急促的钟声召来大批的印第安农民。只见年近60岁的伊达尔哥健步登上讲台，庄严宣布：对于我们，国王也好，捐税也好，再也不存在了。这些可恶的赋税，是残暴和奴役的象征，压迫了我们三个世纪。”他高声问道：“你们愿意自由吗？三百年前，可恨的西班牙人夺走了我们祖先的土地，你们愿意夺回来吗？”长期积压在广大印第安农民心中的怒火，顿时迸发出来，他们齐声回答：“绞死这些西班牙强盗！”接着伊达尔哥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坏政府！美洲独立万岁！”这些呼声回荡在多洛雷斯的上空，这就是墨西哥历史上著名的“多洛雷斯的呼声”。

被誉为“墨西哥独立之父”的米洛尔·伊达尔哥，1753年5月出生在墨西哥城附近。父母都是土生白人。青年时代，伊达尔哥进入圣尼古拉斯神学院学习，后又到墨西哥大学就读。他十分热爱法国文学和历史，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母校圣尼古拉斯神学院，担任哲学神学教授，后又升任院长。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伊达尔哥读了很多被教会列为禁书的革命书籍。他拥护法国革命的原则，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因而被解除神学院院长职务，后又被贬为一般的神甫。但他仍未停止宣传自由、平等和人权思想。故有“小法兰西”之称。1803年，他接替了去世哥哥留下的空缺，担任多洛雷斯教区的神甫职务，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并向印第安人传授生产知识，受到当地印第安人的爱戴和尊重。但他的这些举动却受到宗教裁判所和殖民政府的怀疑和迫害。他的桑园和葡萄园被摧毁，行动受到监视。

1810年，在拉丁美洲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墨西哥的爱国者组织秘密团体，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伊达尔哥就是这些团体的领导人之一。同年9月，因起义计划泄露，西班牙军队源源开来，大举逮捕爱国者。在这危急关头，伊达尔哥决定立即发动印第安农民起义。“多洛雷斯的呼声”拉开了墨西哥独立战争的序幕。

伊达尔哥很快组织了一支1000人的起义队伍。他高举着瓜达卢佩圣母像旗帜，率领起义军向圣米格尔进军。沿途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农民和混血人加入，伊达尔哥被拥戴为“美洲起义军统帅”。为了发动墨西哥广大人民都起来投入争取独立的斗争，伊达尔哥派人分头前往各地，宣传“多洛雷斯的呼声”。被派往阿卡普尔科山区的神甫莫雷洛斯，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成为伊达尔哥事业的继承人。

9月下旬，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克了重要城市瓜那华托。同年10月，起义军就已发展到8万人之众，开始向首府墨西哥城发起进攻。伊达尔哥发出命令，10天之内，奴隶主必须完全释放所有的奴隶，违者处以死刑；废除印第安人的贡税，今后不再征收任何赋税；将从印第安人那里非法夺取的一切土地，归还给印第安农村公社；一切旧的有关司法、文件、记录、契约和诉讼案件一律无效。

10月30日，起义军与殖民军在通往墨西哥城的十字架山隘发生激战。

起义军在付出 2000 人牺牲的代价后夺取隘口。此时，西班牙军队的主力不在墨西哥城内，城防空虚。伊达尔哥兵临城下，西班牙总督在惊慌之中，竟然命令把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保护神，洛斯·雷梅迪奥斯圣母像，从山上的神庙里移至墨西哥城大教堂，拜为西班牙殖民军统帅。总督涕泪跪拜，祈求保佑。这样，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中，就出现了瓜达卢佩圣母和洛斯·雷梅迪奥斯圣母“圣母间”的战争。

伊达尔哥这时完全有力量一举占领墨西哥城，但他却挥师北上，与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主力正面交锋，结果伤亡惨重，被迫退守瓜达拉哈拉城。1811 年 1 月，西班牙军队逼近瓜达拉哈拉城，伊达尔哥下令起义军出城迎敌，在卡尔德龙桥附近与西班牙军进行了决战。由于起义军缺乏装备和训练，指挥又不够统一，结果再遭惨败。伊达尔哥等人在向美墨边境撤退途中，因叛徒出卖而被俘。

1811 年 7 月 30 日，伊达尔哥在奇瓦瓦城慷慨就义，终年 58 岁。为了缅怀伊达尔哥这位“墨西哥独立之父”，他发出“多洛雷斯的呼声”这一天——9 月 16 日，被定为墨西哥国庆日。

神圣同盟

1814年9月的最后几天，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正处于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开幕前的忙乱之中。全城披上节日盛装，会议大厦粉饰一新。各大饭店的经理无不挖空心思，盘算着如何大捞一笔。政府的礼宾机构更是不断加班加点，忙作一团，外交大臣梅特涅则一心想着如何借机在欧洲各国君主和大臣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智慧和威风。

奥地利举国上下正在迎接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维也纳分赃会议。

10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包括了除土耳其以外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仅正式代表就有216人。由于此次会议不仅要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旧秩序，同时还要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直接影响着各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的规格之高，可谓史无前例。他们中包括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奥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以及奥国外交大臣梅特涅、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瑞、战败国法国的外交部长塔列朗等。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名流要员，此时都云集这里，准备着安排欧洲历史的未来。

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次会议除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外，没有举行过一次正式会议。虽然名为欧洲最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但真正的主宰和操纵者是俄、英、普、奥四国。亚历山大一世、卡斯尔瑞、梅特涅和普鲁士首席部长哈尔登堡成为会议的“四巨头”。会议的一切问题都由这四国组成的“叫国委员会”秘密决定。与会的其他各国代表，既无从了解内幕，又无权发表意见，每日只是沉溺于舞会、狩猎和游览之中。时间，维也纳街头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各种舞会，酒宴和狩猎无休无止。当时就有人讽刺说：维也纳会议不是议事会，而是跳舞会。

维也纳会议一开场，立即暴露出与会各国，特别是俄、英、普、奥四大战胜国之间矛盾重重。四国中沙皇俄国的胃口最大，态度最强硬。亚历山大一世力图成为欧洲霸主，为此施展各种诡计，使西欧各大国互相竞争，彼此敌对，相互牵制。英国的方针则是尽量削弱法国，确保欧洲大陆的均势，拉拢普、奥同俄、法抗衡。梅特涅力图取得在中欧和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恢复奥国对意大利的统治。普鲁士则主张严惩法国，扩张自己的领土，确保德意志的霸权。

会议上争执最为激烈的是波兰和萨克森的领土归属问题。俄国要求独占华沙大公国，于是提出作为补偿，把萨克森让给普鲁士。奥地利对此坚决反对，英国支持奥地利。法国不愿普鲁士太强大，也站在英、奥一边。1815年1月3日，英、奥、法三国签订秘密同盟条约，规定三国如遇他国进攻，均有互相援助的责任。这样，以俄、普为一方，以英、奥、法为一方，维也纳会议上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双方几乎闹到决裂的地步。

最后，还是出于对拿破仑的仇恨和恐惧，把他们重新粘合起来。3月7日，拿破仑戏剧性地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惊恐之余，各战胜国间的争吵停止了，并再次组成反法同盟，向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开战。同年6月9日，就在滑铁卢战役发生的前几天，各国与会代表在匆忙中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总决议》。

根据这个最后决议的规定，波兰遭到第四次瓜分。沙俄夺得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领土，波兹南和格但斯克留给普鲁士，加里西

亚仍属奥地利。剩下的克拉科夫及其毗邻地区组成一个共和国，交由俄、奥、普三国共同“保护”。沙俄继续占有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但由于瑞典失去了芬兰，把挪威划归瑞典作为“补偿”。

《最后决议》规定建立德意志联邦。但沙俄不愿在自己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因此力主使德国保持分裂局面。根据俄国的主张，德意志联邦由 34 个邦国、4 个自由市组成。联邦设立一个由各邦代表组成的“邦联议会”，由奥国担任主席。沙俄力图使德意志联邦中最大的两个邦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竞争，互为削弱。

英国为了加强海上霸权地位，强使会议同意它继续占领马耳他，以及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路西亚和毛里求斯，并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南非开普殖民地和锡兰岛，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巩固和扩大了殖民霸权。

依照这个“最后决议”，意大利仍维持四分五裂的状态。除撒丁王国维持独立外，奥国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意大利半岛的实际统治者。中部是罗马教皇国，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则受到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

对于战败的法国，《最后决议》规定法国恢复到 1792 年的疆界，它的 53 个海陆军要塞，由反法联军占领 3—5 年。法国必须赔偿 7 亿法郎并交出海军。拿破仑时代归并法国的比利时被并入荷兰，成立尼德兰王国，兼治卢森堡王国。瑞士被宣布为永久中立，撒丁王国收回萨伏依和尼斯，热那亚也划归撒丁。

尽管各国的君主和大臣在分割领土时勾心斗角，但在恢复旧制度方面却没有争论。他们一致同意法国代表塔列朗提出的恢复“正统主义”原则，恢复了欧洲各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法国、西班牙、两西西里的波旁王朝；葡萄牙的布拉冈扎王朝，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的旧王室，由此重新粉墨登场，恢复了他们的反动统治，从而出现了全欧洲规模的复辟浪潮。

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反动秩序，史称“维也纳体系”。为了巩固这一体系，1815 年 9 月，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成立“神圣同盟”。9 月 26 日，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联名发表宣言，宣布缔结“神圣同盟”，目的在于保卫君主政体和基督教义，所有缔约各国都必须相互提供金钱、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不久，除英国外的全部欧洲国家都加入了这个以俄国为首的同盟。为了用武力阻止波拿巴王朝在法国重登王位，俄、英、奥、普又于同年 11 月结成四国同盟。作为神圣同盟的补充。同盟条约规定：四国将定期举行会议，镇压革命运动，确保“欧洲均势”。从 1815 年维也纳体系建立开始，欧洲社会进入了一个反动统治的黑暗时期。

南美解放者

1816年1月的一天，从牙买加岛驶来的一条帆船，停靠在黑人共和国海地的港口。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在伙伴的陪同下上了岸，匆匆赶往海地总统的官邸。总统佩蒂翁迎出办公室，和这位中年人紧紧握手，两人边走边谈进入了客厅。一个小时后，只见这位中年人满面笑容地走出来，回身向佩蒂翁总统挥手告别，乘船而去。

这个来去匆匆的中年人，就是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西蒙·玻利瓦尔。他此行是来向已经独立的海地寻求援助，并得到了七只战船和大批武器弹药。

1783年7月，玻利瓦尔出生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一个白人种植园主家庭。他3岁丧父，9岁丧母，他们兄妹四人由外祖父和舅舅抚养成人。少年时代，信仰卢梭学说的罗德里格斯，受聘为玻利瓦尔的家庭教师，成为玻利瓦尔的启蒙良师和忠诚的朋友。

1797年，14岁的玻利瓦尔进入皇家士官生兵团学习军事知识。一年半后获陆军少尉军衔。1799年，16岁的他前往西班牙留学，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804年，他在巴黎圣母院参观了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后，十分感慨地表示：“我十分赞赏这位法国英雄……他是世界第一统帅，…但他当了皇帝，自那天起，我把他看成是虚伪的暴君，自由的耻辱。”他和罗德里格斯在去意大利旅行途中，曾站在萨克罗山巅庄严宣誓：“誓死解放祖国”。

1807年，玻利瓦尔取道美国回到加拉加斯。他的家很快成为爱国青年聚会的中心。玻利瓦尔坚决主张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1810年，拿破仑军队占领西班牙的消息传到委内瑞拉，加拉加斯人民立即发动起义，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玻利瓦尔参加子执政委员会的工作，并前往英国，说服了多年流亡在外的米兰达，回国领导独立运动。

1811年7月，委内瑞拉共和国宣告成立，组成了以米兰达为首的新政府。玻利瓦尔是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并被任命为卡贝略港要塞司令。1812年，西班牙殖民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进攻，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遭到颠覆。米兰达被捕，不久在狱中牺牲。玻利瓦尔流亡到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城，并发表了著名的《卡塔赫纳宣告》，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继续战斗。

玻利瓦尔在新格拉纳达政府的帮助下，很快组成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队伍，从哥伦比亚出发，重新远征委内瑞拉。他们越过海拔4000米、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脉，突袭西班牙殖民军，在1813年8月重新占领了加拉加斯，成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玻利瓦尔被任命为爱国军最高军事统帅，并被授予“解放者”称号。

1814年3月，拿破仑帝国瓦解，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复辟，派出一万人的远征军，开往拉美殖民地镇压革命。拉美独立运动进入困难时期。拉波塔战役，爱国军死伤1000余人，第二共和国被扼杀。玻利瓦尔再次逃亡国外，并于1815年9月发表了《牙买加来信》，号召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团结起来，在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中互相支援。

1816年1月，玻利瓦尔从牙买加来到海地，得到大力援助。他接受了海地总统佩蒂翁的建议，决定通过废除奴隶制来发动群众，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同年3月，玻利瓦尔带领200多名战士乘船渡海，在加拉加斯登陆失败。

吸取经验教训，1817年元旦，玻利瓦尔率领远征军再次回到委内瑞拉

时，首先宣布了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号召黑人奴隶起来斗争。然后避开西班牙侵略军的主力，从奥利诺科河口顺流西上，经过森林地带，占领了安哥斯图拉，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玻利瓦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下令没收西班牙王室的财产，把土地分给参加解放战争的士兵们。这个法令轰动了委内瑞拉，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大批黑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纷纷前来参加爱国军。

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领2000名精锐步兵和骑兵，穿越1200公里的原始森林，出现在安第斯山脚下。他们准备袭击占据新格拉纳达的西班牙殖民军。这真是一次惊险的长途跋涉。山峰陡峭，荒无人烟，唯一的一条崎岖山路已被西班牙人所控制，玻利瓦尔的队伍只能在山梁野谷中攀援行进，一个接一个，拉成了几里长的一条长线。天气坏极了，随着海拔不断升高，雨水变成雪。战士们在齐腰深的冰水里走了七天七夜。空气越来越稀薄，不少战士感到头晕目眩，在战友们的惊呼声中掉下万丈深渊。

7月6日，爱国军终于穿越了安第斯山的隘口。这时，西班牙军上来阻截了。爱国军将士知道，前进是唯一的生路。在玻利瓦尔带领下，他们像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爱国军乘胜前进，解放了新格拉纳达的首府波哥大，接着回师委内瑞拉，大败西班牙军主力，开进首都加拉加斯，再向西进军，解放了基多（今厄瓜多尔首都），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包括了今天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四国，玻利瓦尔被选为第一任总统。

1822年7月，玻利瓦尔和南方革命军统帅圣马丁在瓜亚基尔港会面，双方共同制订了作战方案后，玻利瓦尔下令进军秘鲁。1824年消灭了在秘鲁的西班牙军主力，俘虏了总督和四名元帅。1825年，玻利瓦尔再次发兵，解放了上秘鲁。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勋，把上秘鲁改名为“玻利维亚”。至此，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军全部被歼灭。

随着墨西哥和巴西相继宣告独立，拉丁美洲基本脱离了殖民主义的牢笼。

1826年，玻利瓦尔在巴拿马召开南美各国会议，期望能把整个南美洲变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由他担任总统，但未能实现。

1830年12月17日，玻利瓦尔因患急性肺病在圣马尔塔去世，终年47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我最后的祝愿是为祖国祝愿。假如我的逝世有助于结束分裂和巩固联盟，我将安详进入坟墓。”“我不要别的荣誉，只希望哥伦比亚巩固。”

1842年，委内瑞拉政府派出一艘战船，在许多拉美国家舰艇的护航下，把玻利瓦尔的遗骸，迎回了他的故乡加拉加斯，重新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祭奠这位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

彼得卢血案

1819年8月16日，在英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兰开夏全体工人正在准备召开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集会。从清晨开始，人们穿着盛装，带着乐队，手中高举着旗帜和横幅，上面写有“废除谷物法”、“自由或死”、“普遍投票选举”和“没有代表权的税制是暴政”等口号，从四面八方秩序井然地走向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密尔顿和罗许戴尔带领6000多人组成的队伍过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200多名漂亮的少女，她们随着音乐载歌载舞，吸引了数千名看热闹的人。圣彼得广场上，这时已聚集着6万余人，场面浩大，气氛异常热烈。

大会刚开始不久，突然一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身穿蓝白制服的曼彻斯特义勇骑兵队和一队骠骑兵，奉治安法官的命令前来袭击集会。他们个个手持闪闪发光的利剑，策马向集会的人群冲来。他们一面狂叫着：“散开！散开！”一面挥舞着利剑向赤手空拳的集会群众砍去。

霎时间，圣彼得广场上断肢残臂四飞，人们愤怒的喊叫声和受伤者痛苦的呻吟声混杂一片。在人群四散奔逃时，骑兵们仍在右突左冲，在人群中来回冲击和砍杀。

当集会群众冲出广场时，守在广场四周的步兵，又用刺刀向他们乱捅滥刺——一部分群众被逼到教友会教徒集会大厅墙角的木材堆旁。人们纷纷跳过木材堆，拾起石块，进行了仅有的还击，但不久，就有四尊大炮被拖来，又有200多名警察加入了这场大屠杀。仅仅10分钟，整个圣彼得广场已是一片死寂，附近居民吓得把窗帘拉一个来，不敢再看这血腥的场面。广场上狼藉一片，四处流淌的鲜血中，躺着那些被砍伤和杀死的人。

在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英国，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暴的镇压，事情还要从法国大革命结束后的英国国内形势说起。

为了打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令》，英国同法国间的长期战争，终于在1815年以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宣告结束。英国的企业家们都在憧憬着战争结束后欧洲广阔市场的开放，和将会给他们带来的美好前景。

然而和平并未立刻给英国带来繁荣。滑铁卢战役后，庞大的军需品订货突然停止，欧洲大陆经过长期的战争创伤后，尚未恢复元气，无法吸收更多的英国商品。同时，英国在大陆战争期间繁重的赋税负担，已使国内民众精疲力竭，购买力十分低下，不少工厂陆续倒闭。

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工业，造成数以万计的炼铁工人、煤矿工人和纺织工人因失业而流浪街头。战后30万名陆海军士兵的复员，更使英国失业大军的人数猛增到40万人以上。

1815年，由托利党人控制的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人为地造成粮食价格猛涨。上地贵族从中获得厚利，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却更加恶化，同时也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托利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一系列骚动相继发生。还在《谷物法》尚在讨论时，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等工业城市中就陆续发生了反对《谷物法》的斗争，并一直延续到1816年底。

1817年，英国议会通过镇压法令，并宣布停止实施《人身保护法》。但是，这没有能够使各地的群众斗争平息下来。兰开夏五、六千名失业工人，专程前往伦敦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变政策和解除他们的痛苦。一批在

英国很有名望的新闻记者、诗人和作家，分别在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

人们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议会只是雇主们手中的工具，议会必须改革。急进派领袖科贝特对群众说：“唯一拯救的办法，就是在下院或人民院进行改革，给所有直接税的交纳人以投票权，议员每年选举一次。除此而外，再无其他办法了。”于是，一个以改革议会为主要目标的群众运动兴起了。工人们希望通过议会改革，由工人控制议会，使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急进派在伦敦、伯明翰及其他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随后又筹备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举行有兰开夏全体工人参加的大会。

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发给参加会议群众的指令是：“整洁”、“严肃”、“秩序”和“和平”，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为了保证参加会议的群众遵守纪律，各地事先还作了严格训练，要求在会议期间做到肃静无哗，态度坚决和眼从指挥。

但是，会议组织者们的良好愿望，被曼彻斯特义勇骑兵队的利剑砍得粉碎。

在圣彼得广场的这次大屠杀中，有 11 人死亡，其中包括四位妇女和一个婴儿，400 余人受伤。这是英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场集体屠杀。人们把它和滑铁卢战役相提并论，讥讽地称之为“彼得卢战役”。

一个为盲人造福的盲人

1812年的一天，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一个名叫路易斯·布里尔的3岁法国男孩，正在家里翻弄他父亲的工具袋。当他拿出一只锋利的钻头时，不慎被尖钻戳进了左眼。不久，右眼也受感染，几个月后，他的双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3岁的孩子从此成了“不见天日”的盲童，实在令人心碎，因为在当时，盲童不是被训练成为一个职业乞丐，就是送到工厂里去铲煤。

路易斯懂事后，逐渐学会了自理生活，并开始帮父亲干些活。他父亲决心不让儿子遭受一般盲童的悲惨命运。在路易斯7岁时，父亲送他到村里的小学上学。由于他记忆过人，能把老师讲的课，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所以，很快成了班上拔尖的学生。

10岁时，路易斯被父亲送到巴黎的青年盲人国民学校。这时的盲文还是书本上面一个个凸出的大字母，盲人靠慢慢挪动手指来识别。学校图书馆里只有三部书，每部分成20册，每册重达20磅。这种盲人书本不但制作费用昂贵，而且字母大，纸张厚，义笨又重，读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盲童没有耐心，经常个耐烦地把书摔在一边，不停地哭闹。

看到这种情形，善于动脑的路易斯感到盲人需要一种方便的盲文字母作为学习工具，于是他开始为创造这种盲文不断地思索。几年后，当他听说有一种“夜字”时，受到很大启发。所谓的“夜字”就是值夜班的士兵为传递信息而使用的一种符号。使用的方法是用铁笔在厚纸上刻写凸起的小圆点和划道。用手指触摸这种符号很容易辨别。路易斯对“夜字”中所使用的小圆点很感兴趣，一直在对它进行研究和改进。

路易斯25岁那年，盲童学校的一位老师创造出一种用小圆点组成单词的盲文，这种盲文不用划道道，而用圆点组成虚线构成字母。路易斯并没有因为有人跑到他前面而停步不前。怎样用小圆点编制盲文的念头，一直在他脑子里打转。他开始设想用六个小圆点组成一组，简化那位老师造的字母，这六个小圆点是足够组成许多不同的字母和单词的。

这些圆点虽小，但盲人的手指尖接触时却很合适，他们不必移动手指就可以识别一个个的字母，进而组成不同的单词及句子，十分巧妙。盲人使用路易斯所创造的盲文，不用别人帮助也能学习写作，记课堂笔记和写日记。有些老师最初还对路易斯的创造有所保留，但很快在事实面前接受了这种字母。没多久，以路易斯的姓命名的“布里尔盲文字母”就在这所盲童学校里首先正式使用了。

路易斯·布里尔发明的盲文字母，是迄今为止盲人使用起来最快、最简易的盲文，使用小圆点印刻的书，从编制到阅读都很便利，成本也较低，携带方便。因为具有这些优点，“布里尔字母”的盲文书籍开始大量发行，最后终于成为一种在法国通行的盲文。

1853年，41岁的路易斯·布里尔因患肺结核病去逝。他最终未能看到“布里尔字母”成为一种世界通行的盲文字母。

当一个双目失明对生活缺乏信心的人，如果能在精神上找到慰藉，在黑暗中见到光明，从而领悟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人生意义时，都应当感谢路易斯·布里尔为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路易斯·布里尔作为一个造福盲人的世界文化名人，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安第斯军统帅圣马丁

1822年7月26日，是拉美历史上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领导南美洲独立战争的两位杰出领袖——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28日凌晨2点，圣马丁突然不辞而别，径自回到秘鲁。9月22日，他在秘鲁国会发表了辞职演说后，当夜悄然离去，不久即前往欧洲。

由于这次会谈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事后又未发表任何宣言，使人们对会谈内容讳莫如深。联系到圣马丁的突然隐退和出走，更使这次重要会晤笼罩了谜一样的色彩，多年以来，一直有“瓜亚基尔迷雾”之称。在南美独立战争中，与玻利瓦尔齐名的圣马丁，为什么会悄然引退，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1778年2月，何塞·德·圣马丁出生在阿根廷北部亚佩乌镇的一个军人世家。圣马丁8岁时，全家迁往西班牙。12岁时，他加入军队任士官生，先后参加了同摩尔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的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18岁时晋升为中尉，后因在反对拿破仑占领军的战争中多次受勋，晋级为少校。

此时，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欧洲和美洲社会空前动荡。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圣马丁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感到失望。他秘密地同阿根廷国内的爱国志士建立了联系，加入了秘密组织“劳塔罗”，立志为祖国阿根廷和拉美的独立而献身。

1811年，阿根廷革命爆发后，圣马丁以身体欠佳为由，退出西班牙军队。第二年，他搭乘“乔治——坎宁”号轮船，回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首先发起成立了“劳塔罗”支部，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核心。同年，他精心挑选，组成一个骑兵团，呕心沥血地对这支部队进行严格训练。在圣马丁的指挥下，这个骑兵团几乎参加了阿根廷独立战争所有的重大战役，成为南美独立战争中最出色的部队，并为爱国部队培训出19名将军和200名军官。

1813年2月3日，骑兵团在圣洛伦索与西班牙殖民军激战后，取得辉煌胜利，大大鼓舞了拉美人民的士气。圣马丁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十分英勇。在战斗中，他的坐骑中弹倒下，他的一条腿被压在马腹下，敌人的刺刀划破了他的面部，但他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取得胜利。

1814年，圣马丁被阿根廷执政委员会任命为北方军司令后，他开始着手整编爱国军，加强军纪，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他的部队在战斗中多次以少胜多，打退西班牙军队的进攻。

圣马丁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家，而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革命家。他从独立战争一开始就认为：阿根廷的独立同拉美其它国家的独立密切相关。只有摧毁西班牙在南美的武装力量，阿根廷的独立才有保证。为此，他主张首先集中全力解放秘鲁，拔掉这个西班牙在南美的重要军事据点。他制订首先解放智利，再从海路进攻秘鲁的计划，并开始全力进行准备，在门多萨一带人民的大力帮助下，圣马丁于1816年8月创建了“安第斯军”，拉开了解放智利和秘鲁的序幕。

1817年春，圣马丁“率领5000人的安第斯军，从门多萨出发，踏着皑皑白雪，翻越高耸险峻的安第斯山，开始战略远征。随军行动的有1600匹战

马，260 多门大炮和各种辎重，被认为是“军事史上最惊险和光辉的长征之一”。2月12日，南北两路按时到达会师地，在查卡布科突然出击，大败西班牙守军。两天后乘势解放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不久解放了智利全境。

在接连不断的重大胜利面前，圣马丁仍保持着谦虚谨慎和廉洁俭朴。他把一切荣誉归功于英勇的安第斯军官兵，并拒绝担任智利最高军政领导人。他把圣地亚哥市为感谢他解放智利而送给他的黄金，回赠该市，用于修建公共图书馆的资金。

智利解放后，圣马丁“随即准备远征秘鲁，完成解放南美的大业。他募集资金，征募战士，用缴获敌人的船只创建了“智利海军”。1820年8月，圣马丁率领着拥有24艘战舰和武装运输船的“解放秘鲁军”，从智利出发，开始了“决定南美命运”的远征。圣马丁首先在秘鲁南部登陆，然后向纵深发展。1821年7月，远征军开进南美殖民统治的最后堡垒利马城，秘鲁的解放标志着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人们高呼：“圣马丁将军万岁”时，他却连连摆手，高呼“秘鲁独立万岁”、“自由万岁！”

1821年7月28日，秘鲁上空升起了红白二色国旗，宣告正式独立。圣马丁被推选为“秘鲁护国公”。考虑到仅仅依靠“远征秘鲁军”，无力消灭盘踞在秘鲁山区的西班牙军，圣马丁感到只有取得玻利瓦尔爱国军的援助，才能把西班牙人最后赶出南美洲。

1822年7月26日，圣马丁与玻利瓦尔会晤于瓜亚基尔，商讨最后解放秘鲁的计划。圣马丁对玻利瓦尔表示：“美洲将不会忘记我们两人相互拥抱这一天”。他发现玻利瓦尔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为了南美解放事业的大计：圣马丁同意南北两路爱国军联合起来，由玻利瓦尔指挥，自己则隐退。他在给担任智利最高军政领导人奥希金斯的信中写道：“秘鲁同时容纳不了玻利瓦尔和我两个人，……为了美洲取得胜利，让他进来吧。”

同年9月，圣马丁辞去秘鲁护国公职务，然后经智利，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824年2月，他留下妻子的遗骨，带着独生女儿前往欧洲，先在布鲁塞尔，后在巴黎郊区一所简朴的别墅里度过了他的余生。

南美人民曾一再邀请他回到南美安度晚年，他都一一谢绝。他在回信中写道：“我为这些国家的独立征战了十年，唯一的热望就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的国家。”

1850年8月17日，这位与玻利瓦尔齐名的南美独立战争领袖人物病逝于法国布伦，终年72岁。后来阿根廷人民把他的遗骨迎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安葬在五月广场。拉美人民始终怀念着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为希腊献身的英国诗人

1824年4月19日，在希腊梅索朗吉昂市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一个身染重病的英国诗人，充满感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我已经把自己的时间、资财和健康全部献给了它——现在把生命也献给了它，希腊，希腊，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临终前，他还高呼着：“前进！前进！”

这个为希腊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英国诗人，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1月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古老而破落的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了贵族爵位。17岁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大学时代的拜伦，在深受启蒙思想熏陶的同时，又形成了热情狂放，追求真理的性格。1807年，他在第一本个人诗集《懒散的时刻》中，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上流社会的鄙视。

拜伦带刺的诗集当然不会合上流社会的口味。《爱丁堡评论》不久发表一篇文章，以傲慢轻蔑的口吻嘲笑拜伦：“不要再徒劳无功地写诗了。”拜伦被激怒了，他要一切最热烈的情绪集中一个方向：写出精彩的东西，气死饶舌者。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创作，写出长篇讽刺诗《英国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对鼓吹逃避现实，美化专制的评论家给予了有力地鞭挞。

1809年6月，拜伦离开英国，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先后去了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国，于1811年7月回到英国。这次旅行极大地开阔了诗人的眼界，使他看到了西班牙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斗争，特别是希腊人民在土耳其奴役下的痛苦生活，更给拜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拜伦在途中写下的长诗《哈罗尔德游记》第一、二章于1813年出版后，震动下欧洲的诗坛。诗中回忆了古希腊的丰功伟业，十分感慨地描述了希腊的现状：美的希腊，光荣的遗迹，使人心伤！逝去了，但是不朽；伟大，虽已消亡！这充满激情的诗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到三天，第一版就销售一空，这部长诗使拜伦名闻天下。

从此后，拜伦在积极投入国内政治斗争的同时，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唤起欧洲舆论对希腊的注意。”

拜伦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充满激情的言词，引起当权者的仇恨。他们利用拜伦的家庭变故，大肆造谣中伤，恶毒的诽谤，迫使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英国。

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一家客店里，拜伦第一次遇见了英国杰出诗人雪莱。共同的思想追求，使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朋友。拜伦的创作热情因此而特别高涨，在短期内就拿出了不少的名篇。1816年末，拜伦来到阳光普照的意大利，在这里完成了《哈罗尔德游记》的最后一章。全书四章，长达4700余行。

拜伦不仅是诗人，也是战士。他在意大利期间，积极参加了“烧炭党”的活动，并很快成为一位领袖人物。这一时期，拜伦最重要的作品是讽刺长诗《青铜世纪》和诗体长篇《唐·璜》。

1821年，希腊人民经过长期的组织和准备，终于发动武装起义，宣布希腊独立。不甘心失败的土耳其苏丹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向希腊军民反扑，就在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再次处于危机关头，拜伦毅然决定离开意大利，亲

自去希腊参加战斗。

1823年7月14日,拜伦等人搭乘自己出资装备的战斗舰“赫库利斯号”,前往希腊。舰上带有拜伦出钱购置的五匹战马、大量药品和武器弹药,以及5万元西班牙金币和现金支票。在半年的飘流中,他们遭遇风暴,忍饥挨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824年1月抵达希腊的米苏龙占港。

拜伦的到来,对战斗中的希腊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队鸣放礼炮,军乐队奏着音乐,希腊新政权的领袖和大批市民前往海边迎接。身穿军装的拜伦,犹如凯旋的英雄,受到希腊人民热烈欢迎。

这时,希腊军民刚刚打退土军的第一次围攻。拜伦来到后,很快被任命为梅索朗吉昂地区的军事领导人。他一改温文尔雅的诗人形象,俨然成了一位手握战剑的军事统帅。拜伦首先着手整顿军队组织,设法加强内部的团结。为了打破土耳其的海上优势,他积极筹划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海军。

为了帮助希腊新政权克服财政困难,缓解军队无粮无饷的窘境,拜伦毫不犹豫地变卖了自己在英国世袭的庄园,以及历年积蓄的稿酬和所有的钱款,用来支持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他还自己出钱,单独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部队。

在生活上,拜伦从踏上希腊国土那一天起,就放弃了贵族奢华的生活方式,甚至断绝了肉食。他在激励自己的一首诗中写道:

死人都已经醒来——我怎么还能酣睡?
全世界在和暴君作战——我怎么能雌伏?
庄稼已经成熟——我怎么能不赶快去收割?
我不能安睡,我的卧榻上放着荆棘。

拜伦作战十分勇敢,每逢战斗,他总是身先士卒,把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但不幸的事情发生。1824年4月在一次骑马出巡时,忽逢大雨,感受风寒,体质虚弱的拜伦染上了剧烈的痉挛症。

4月18日是复活节,当地的希腊军民为了不使患病的拜伦受到惊扰,一改多年来燃放枪炮庆祝节日的习惯。第二天,拜伦在平静中告别了人世,终年36岁。

拜伦的去世使整个希腊沉浸在悲痛之中,希腊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他的灵柩上安放战盔、佩剑和花环。他逝世的这一天,被希腊战士们宣布为国哀日。正是在拜伦崇高献身精神的鼓舞下,希腊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

为了纪念这位英国诗人为希腊民族解放斗争所作出的贡献,希腊政府后来在英国海顿公园,建造了一座拜伦的雕像。

“如有可能,我将教导石头飞起来打击世上的暴君”。这是拜伦的著名诗句,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宗旨。他用自己杰出的诗作和青春的生命,为自己留下了无畏战士的英名。

欧文与“新和谐村”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1824年，在美的印第安纳州南部，曾出现过一个人间的理想“天国”，它的名字叫“新和谐村”。

这个村庄地处丘陵起伏、碧水长流的地带。村外的山岗和谷地，是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紫红色的葡萄，一串串地挂在绿叶成的葡萄架下，把整个村镇点缀得分外秀丽。在村庄的远处，与天际相连的草场上，绿草如茵，点点牛羊，头戴宽边草帽的牧羊人，悠闲地随着羊群移动。村子周围的果园里，桃李成行，构成一道宛如翡翠的屏障。

“新和谐村”里面，更是一幅引人入胜的油画。街道两旁，白杨垂柳，夹道成荫。绿荫深处是一幢幢厂房，有面粉厂、鞋帽厂、啤酒厂、麻布厂。在村庄的中心，可以看到崭新而又整齐的住宅和公用建筑，还有会议室、阅览室、学校、医院。这些房屋周围，则是连成一片的小花园。微风吹来，到处飘逸着花香。

每当太阳升起，薄雾散尽，村里的人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劳动。看上去，他们的衣着并不讲究，但整洁。人们按照年龄大小从事着各种有益的劳动。5—7岁的儿童去学校读书，接受启蒙教育。8—10岁的儿童除读书外，还要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12岁以上的青少年在读书的同时，还要在工厂或作坊里学习某种手艺。20—25岁的青年则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队伍。25—30岁的人们每天除参加两小时的劳动外，其他的时间用来从事保卫工作和产品的分配。30—40岁的人，负责组织、管理和领导生产。40—60岁的人，主持对外交往以及产品交换。60岁以上的老人则拥有一种特权，他们负责捍卫宪法。在这个新和谐村里，人们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只要你付出一定的劳动，你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这岂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吗？是的，它确实是在世界上存在四年之久的一个“世外桃源”，这个“新和谐村”的创立人是英国人罗伯特·欧文。

1771年5月，欧文出生在北威尔士一个贫苦工匠家庭。他只读过乡村初小，从9岁起就开始自己谋生，在一家商店当学徒。10岁时，他只身一人到伦敦自谋生路，学徒三年后，当了一家服饰商店的店员。17岁时他开办了一家小工厂，由于经营有方，获利丰厚。20岁时，他被曼彻斯特一家纱厂请去作经理，按照自己的理论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革，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深受纺织界的赞誉。他也结识了许多著名人物。

1799年，欧文同人合伙买下了苏格兰新拉纳克的一家拥有2000人的纺纱厂。第二年，他成了这家工厂的经理。欧文开始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最初的改革试验。他想通过自己的改革，消灭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状态。他首先从缩短工时入手，把原来每天14小时减少到10个半小时。随后，又实行了一系列提高工人福利的改革，如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和劳动条件，为工人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和模范小学，并建立了专门商店，廉价供应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此外，这个纱厂还废除了惩罚，代之以教育规劝。更奇怪的是，1806年纱厂由于遭受经济危机而停产四个月，但工人的工资却原数照发。

新拉纳克的改革给欧文带来极大的鼓舞。企业利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同时，这个居民成份复杂，刑事案件层出不穷的新拉纳克，被改造成为当时的模范移民区，获得了“幸福之乡”的美称。

1812年，欧文开始宣传自己改造新拉纳克的成就，发表了《关于新拉纳克工厂的报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欧洲各国的达官显贵，王公大臣、资产者、慈善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家，纷纷前来参观。欧义的名字斐声四方，他成为欧洲最有名望的“慈善家”。

1817年，欧文在应邀参加关于失业问题的讨论时，提出了同失业作斗争和改善劳动者生活条件的广泛计划。他企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通过组织建立劳动公社的办法，来消除社会贫困和失业。1820年，欧文把他的设想发展成为“新社会体系”。他在《致新拉纳克郡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他的改进社会的计划。这标志着欧文一生的转折，表明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为了用典型示范来证明自己的计划是切实可行的，欧文提出了建立示范性劳动公社——共产主义新村的计划。1824年，他带着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来到美国的印第安纳州，花了20万美元买下了3万英亩的土地，开始兴建“新和谐村”。

这个共产主义新村刚出现，就像春天来到人间一样，迅速传播，给美洲的劳苦群众带来极大的希望。他们从各地赶来，汇集在这里，一时间参加新和谐村的人数竟达800人之多。一些著名人士，像美国费城科学院院民威廉·麦克留尔、经济学家约西亚·华伦等人也来到这里，热情地参加新村的建设。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不连声叫绝，派赞扬。

欧文在1825年10月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阐明了他创办“新和谐村”的目的。他说：“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介绍一个崭新的社会，把愚昧而自私的社会制度，改变为一种外朗的社会制度，这一种制度将逐渐把一切利益结合起来，并消除引起个人之间一切纷争的原因。我已买下了这片产业，并且亲自来到这里实行这种办法。”

然而，欧文万里迢迢、飘洋过海建立的这个新村的命运，说来令人伤心。由于“新和谐村”并不是真正与世界隔绝的，加入这个公社的人来自各个地方，抱有各自的目的，追求不同的利益，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这样，入社的社会上层分子和普通劳动者之间很快产生了矛盾，加上宗教信仰不同和民族的偏见，使这个公社远不像欧文预想的那么“和谐”。

同时，按照欧文的理论，公社经济活动的目的，只是满足公社社员的需要，因此，“新和谐村”不仅没有积累，而且消费超过了生产。公社里从事生产的人太少，技术员和熟练工匠尤为缺乏，工厂、作坊因而常常停产。

公社一家能和当时美国设备最完善的染坊相媲美的染坊，终日无事可干。另外，一个每周能生产400磅棉纱的纺织厂，以及一个日产60桶面粉的面粉厂常常停工。3600英亩麦地缺少足够的人手来耕种。

即使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欧文自己也无法长期补贴“新和谐村”的亏损。1828年，“新和谐村”存在四年之后，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终于宣告破产。

同一个时期内，在美国纽约等地还建立了另外18个欧文式的公社，40余个傅立叶式的合作公社，但陆续都失败了。

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主张中仍有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按劳分配的思想。它对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试验的失败，并没有动摇欧文的信心，他在回到欧洲后，继续在

英国推行合作运动。到 1832 年，英国的合作社已有近 500 个。欧文还积极参与了英国的工会运动，发起和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生产部门大联盟，当选为英国历史上首届总工会主席。晚年的欧文积极从事著述，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理论。

1858 年 11 月 17 日，欧文在故乡纽汤镇逝世，终年 87 岁。

欧文的一生曲折离奇。他从一名商店学徒成为著名的工厂主，又从一位慈善家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今天，络绎不绝来到新和谐村遗址凭吊的人们，仍然由衷地敬佩当年创立“新社会模型”的志士们的勇气。

旅行号机车

1825年9月27日，天刚蒙蒙亮，居住在英国斯多林克顿的男女老少，就纷纷起床了。他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坐车，络绎不绝地向一个地方赶去。

他们要去干什么？原来，那里就要举行一次表演，人山人海，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忽然，汽笛一声长鸣，一台喷云吐雾的庞大机车，拖着六节煤车和二十节挤满乘客的车厢，轰隆轰隆地驶来，向达林顿煤矿疾驶而去。观看表演的人群，立刻发出一片欢呼和惊叫声。有的骑着马的小伙子，催马向前，紧随不舍，一面跑，一面大声喝彩。

这条飞奔着的钢铁长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列火车——旅行号。火车的出现，使人类陆路交通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为近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发明这列火车的，就是放牛娃出身的英国工程师——乔治·斯蒂芬逊。

1781年7月，斯蒂芬逊出生在英国一个煤矿工人家中。一家八口全靠父亲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斯蒂芬逊在8岁那年就去给别人放牛。

家庭贫困的生活，每天繁重的劳动，并没有磨灭斯蒂芬逊强烈的求知欲。父亲在煤矿上是蒸汽机司炉工，每当给父亲送饭时，小斯蒂芬逊总要围着隆隆转动的机器，出神地看个不停。14岁时，他真的当上厂一名见习司炉工，他高兴极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当其他工人都回家后，斯蒂芬逊一人把蒸汽机全部拆卸开，仔细地观察了机器的内部结构。拆卸容易装配难，等他把一大堆零件重新装配起来时，已是满天星斗。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渴望自己也能造出机器的斯蒂芬逊，模仿着拆装过的蒸汽机，画了张草图，送给总工程师看。他虽然受到总工程师的鼓励，但却被告知，真要想造出更好的机器，还要读很多的书。

从此，17岁的斯蒂芬逊白天做工，晚上去煤矿夜校上课。由于他勤奋好学，刻苦用功，到22岁时，他已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机械修理工。29岁那年，因成功的解决了重大机器故障，被破格晋升为工程师。

19世纪初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由于工业革命的有力推动，英国煤的年产量已达3000万吨。如何将堆积如山的原煤运出矿区，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而促使这一局面根本改观的，便是铁路的兴起。

从19世纪初年起，英国开始铺设铁路。路轨最初为木制，后改为铁制。铁路长度一般为5至10英里，最多不超过20英里。而在牵引机车方面，特列维蒂克和特勒维虽进行过尝试，但由于马力小，速度慢，操作困难。经常出轨等原因，牵引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就在这种情况下，斯蒂芬逊开始了对火车的研究。

他经过细心观察，认定蒸汽机足解决问题的关键。为此，他步行1000多公里，前往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在那里整整研究和工作了一年，实地考察了各类蒸汽机的特点。在总结和掌握前人制造蒸汽机车的经验教训后，斯蒂芬逊便开始研制新的蒸汽机车。

他首先把传统的立式锅炉改为卧式，用扩大炉膛的办法，来增加锅炉的

受热面积和蒸汽。由于降低了锅炉的高度，使机车的行走和转弯平稳，操作也灵活多了。此外，他又在车轮边缘加上厂轨箍，以防机车出轨。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反复试验，斯蒂芬逊在 1814 年制造出了一台名叫“半统靴号”的火乍头。他驾驶着这个火车头，到煤矿进行了表演。试车结果，这台经过改进的火乍头，要比以前所有的火车头马力更大，速度也快了许多。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火车头震动仍然太厉害。在试车过程中，由于机车上的螺栓震松脱落，以至翻了车，把一名乘车的英国国会议员和英国交通公司董事长摔伤了。于是，各种嘲笑、指责、挖苦，扑面而来。有人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听到火车的汽笛叫，连天空的飞鸟也会掉下来。一些原来赞成试验火车的官员，这时也改变态度，反对继续试验，并断言蒸汽机作交通工具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斯蒂芬逊并没有像过去的火车试验者那样灰心丧气，止步不前。他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继续对火车的各个重要部分进行重大改进，终于造出了牵引力大，运行安全的“旅行号”机车，为此后火车的制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23 年，斯蒂芬逊应聘修建斯托林克顿至达林顿矿区的 25 英里的铁路。1825 年 9 月 27 日，他驾驶着“旅行号”机车，在这条刚完工的铁路上进行了试车表演。当这列火车以每小时 24 公里的速度，越过中途的一个大斜坡，安全驶抵达林顿时，斯蒂芬逊才发现，列车上还有 450 名乘客，载重量已达到 90 吨。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条铁路。

在成功的荣誉面前，斯蒂芬逊并没有就此止步。1824 年，英国政府聘请他担任修建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的工程师，并招贤制造大马力蒸汽机车，以解决利曼铁路地形崎岖不平的矛盾。

由于修筑铁路将取代许多依靠古老交通工具为生的业主的生意，这些人群起责难，攻击修建铁路是“背叛民族传统”，把铁路当作“最大的恐怖物”和“最大的祸害”。这些反对之声，加上土地所有者借口铁路是“对私有财产的巨大而不名誉的侵袭”，乘机哄抬地价，都增加了修筑铁路的难度。铁路公司不得不付出巨额的活动费用，以争取国会的核准和舆论的支持。仅仅这种经费，每英里就要 4000 镑。

在斯蒂芬逊领导下，铁路建设者们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使工程进展迅速。1829 年，斯蒂芬逊试制成功“火箭”式蒸汽机车，揭了招贤榜。经过六年周折，终于在利曼线上开出第一列火车。世界上第一条全部使用蒸汽火车头的铁路终于问世了。从此，在曼彻斯特到利物浦之间有了定期客运列车。

斯蒂芬逊在研制火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大大激发了人们对火车的兴趣。1829 年 10 月，在利物浦附近举行了一次火车比赛，参赛的有三列火车和一辆马拉车。比赛开始不久，一列火车因锅炉破裂退出，另一列火车行驶了 44 公里也因汽缸破裂而失败，只有斯蒂芬逊的“火箭号”，以 46.4 公里的速度，拖着 17 吨的货物，安全行驶了 112.6 公里，顺利到达终点曼彻斯特，比那辆四套马车快了两倍，荣获比赛冠军。

从此，火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日益受到工商各界和民众的普遍称赞和重视。铁路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整个英国出现了“铁路热”。到 1848 年，英国国会批准新建的铁路总长度，已达 12000 英里。伦敦成了南来北往、东西交通的枢纽。铁路运输不再被视为“最大的祸害”，而是生财之源。常

常是国会尚未批准，铁路尚未建成，股票早已抢购一空。

在那“铁路热”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与铁路股票交易发生了关系。火车也不再是令人恐怖的东西，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交通工具。人们之间因地域划分造成的隔绝被打破，祖先留下的古老车辆越来越无人光顾了。仅 1848 年这一年，英国铁路客运就达 2500 万人次。人类的精神文明，随着火车车轮的滚滚向前，跃入了新的纪元。

也就是在这一年，终生致力于发展铁路交通运输事业的斯蒂芬逊与世长辞，终年 67 岁。

今天，当铁路已经遍布全世界，无数列车不分日夜地穿梭在城市、乡村和各国之间时，人们不应忘记作为火车发明人的斯蒂芬逊。特别是他那种不畏艰辛，百折不回，勤奋学习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

十二月党人起义

1825年12月14日，天气寒冷，白雪覆盖了俄国首都彼得堡城。一清早，3000多名俄国陆海军官兵，从各自的营房出发，列队走向彼得堡市中心的元老院广场。只见他们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刀剑出鞘，一路高呼“拒绝宣誓！”“反对宣誓！”“要求宪法！”“要求民主！”的口号。上午10时，陆海军官兵们在元老院广场彼得一世铜像旁布成战斗方阵，荷枪实弹，准备战斗。他们的枪口和一阵阵愤怒的口号声，直指正在准备登极为皇的尼古拉一世。

他们是谁？这支由一批具有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和知识分子领导的起义队伍，就是后来被列宁高度评价为“俄国第一代革命者”的十二月党人。

19世纪初的俄国，仍是专制极权的封建帝国，保留着野蛮腐朽的农奴制度。沙皇政府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卷入争霸欧洲，充当欧洲宪兵的漩涡中，俄国人民的生活异常艰难。自拉吉舍夫发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开始，反对腐朽的农奴制，推翻专制制度的思想不断传播。1812年打败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更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一些正直的贵族青年军官，受到法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启发，对于国内政治现实日益不满，萌发了“改造祖国”的愿望。

1816年，贵族青年军官穆拉维约夫和彼斯特尔，在彼得堡建立了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救国协会。1818年，在莫斯科组成了有200人参加的第二个秘密团体——幸福协会。这两个秘密团体的成员，热情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专制，但却因在斗争方式上存在分歧而相继宣告解散。与此同时，上述两团体在俄国南方的一些成员，却在彼斯特尔的领导下组成南方协会。他们经常秘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主张消灭皇族，废除农奴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和国。他们的主要纲领充分体现在彼斯特尔所写的“俄罗斯真理”之中，这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

不久，彼得堡的禁卫军军官尼·穆拉维约夫和特鲁别茨科等人组成了北方协会。著名诗人雷列耶夫积极加入，由于他的出众才干和主张，很快当选为北方协会主席。北方协会也提倡废除农奴制，但力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他们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在尼·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上。

1822年，南北协会第一次建立了联系。第二年春天，经过彼斯特尔在彼得堡与雷列耶夫商讨，双方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采取暴力行动，发动各自控制的军队进行武装起义。任何一方开始行动，另一方应立即给予支持。起义定在沙皇亚历山大去世之际。

1825年11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他没有后嗣，按照俄国皇位继承法，他的二弟康斯坦丁应继任皇位。但康斯坦丁却将皇位继承权让给了沙皇的三弟尼古拉。不明真相的军队和居民，在亚历山大死后立即向康斯坦丁宣誓，而宫廷却指定12月14日向尼古拉一世“再宣誓”，十二月党人所期待的时机来到了。北方协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利用皇位中断，发动武装起义。

12月14日，当起义部队集结完毕，并打退了效忠皇室军队的多次进攻后，担任起义统帅的特鲁别茨科依却仍未露面，这就为尼古拉赢得了时间。他调集了9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使用霰弹向起义部队进攻。起义者退到冰冻的涅瓦河上，冰面已被炮弹打穿了许多大洞，不少人掉了进去。元老

院广场上弹痕累累，血迹斑斑，尸横遍地。

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乌克兰，南方协会马上准备起义，此时，彼斯特尔突遭逮捕。领导起义的责任落在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和别斯士舍夫的肩上。北方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他们并未因此退缩。同年12月31日，南方协会举行起义，几百名起义军从科瓦廖夫卡出发，向基辅进攻。途中因迷失了方向，六天后又转回原地，在空旷的草原上遭到沙皇军队骑兵和炮兵的猛烈攻击，被镇压了下去。

尼古拉一世亲自主持了审讯，十二月党人乐观镇定，英勇不屈。1825年7月12日，彼斯特尔、雷列耶夫、谢尔盖·穆拉维约夫、别斯士舍夫和卡霍夫斯基五人在彼得堡被处以绞刑。121名起义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了。但是，他们那种为了理想和事业英勇奋斗，不避生死，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新的一代的精神，为俄国历史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正如列宁所说：“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的事业没有落空。”

西伯得亚圣女

1825年12月，由一批贵族青年军官发动的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它像一束在俄国皇宫后院点燃的火炬，唤醒了誓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一代新人。沙皇尼古拉一世在惊恐之余，对参加起义的十二月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5人被判处绞刑，121人被终生流放西伯利亚。

在人们世代传颂十二月党人的不朽英名和事迹时，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曾为俄国历史添写了感人的一页。她们在自己丈夫遭到残酷迫害的危难时刻，毅然抛弃了舒适安逸的城市生活，告别了终生难以再见的双亲和儿女，跟随“国事犯”的丈夫，踏上了一条几乎没有生还希望的道路。她们中的许多人和丈夫一起，葬身在西伯利亚的茫茫荒原和冰天雪地之中。

第一个闯过各种障碍，前往西伯利亚的妇女是伯爵夫人叶卡杰琳娜·特鲁别茨卡娅。她的丈夫特鲁别茨科依上校是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起义失败和丈夫被流放西伯利亚，曾使特鲁别茨卡娅深感悲痛，彻夜难眠。就在丈夫被放逐的次日，她不顾父母亲友的一再劝阻，从彼得堡启程奔向西伯利亚。当她冒着风雪严寒，历经两个月的艰苦旅程，在伊尔库茨克暂作停留时，旅伴病倒了，马匹也需要重新更换。目的地还那样遥远，道路将更加艰险，命运吉凶未卜，但这些都动摇不了她的意志，她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快些备马，快些上路。

特鲁别茨卡娅的举动，使沙皇政府惊恐不安，尼古拉一世下令设法阻止这一“可怕行动”，使她“迷途知返”。于是当地省长先用彼得堡的豪华生活诱导她，说那里有“舞会、灯光辉煌的宫廷、自由和尊敬”，而前面却“只有监狱、凌辱、永无止境的压迫和贫困”。特鲁别茨卡娅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在丈夫的影响下，她对上流社会的腐败生活早已感到厌恶。尼古拉一世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暴行，更深深地激怒了她，因而她不为这些花言巧语所动。

当省长又嘲讽她不过是丈夫“空虚幻觉”的牺牲品和“可怜的奴隶”时，特鲁别茨卡娅坚定地答道：“对刽子手的蔑视，对正义的理解，会成为我们的可靠支柱。”这时，省长拿出了最后一招，让她在一份文件上签名，承认甘愿放弃一切贵族特权和财产继承权。令省长感到吃惊的是，这位外表娇柔的贵族少妇，竟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表示宁愿接受严酷的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也决不需求伪善的自由和“受了凌辱的荣誉”。省长无计可施，只得气急败坏地下令为她备马。

特鲁别茨卡娅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第一个来到了西伯利亚的聂尔琴斯克矿坑，她给黑暗的牢狱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更可贵的是，她为后来的妇女们开拓了艰难而光荣的道路。

同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家庭一样，亚历山德拉·穆拉维约娃也承受沙皇政府镇压政策带来的一个个沉重打击。她的丈夫H·穆拉维约夫是“北方协会”的领导人。突遭逮捕和被流放，使他未能同家人联系，他为自己给家庭带来的困境深感不安。可是，妻子在回信中感人的话语，却使他这位坚强的男人流下了眼泪：

“不要为我担忧，我能够经受一切。你自责为家庭带来不幸，可我却感

到自己是一个最幸福的妇女……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孩子们的最好榜样。”

穆拉维约娃历尽艰辛来到西伯利亚不久，又接连遭遇到新的不幸：她的双亲相继病故，儿女们也病得奄奄一息。但人们从她脸上看到的却是明朗的微笑和昂扬的精神。当人们被沉重的苦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她带来了普希金《致西伯利亚囚徒》的激昂诗篇：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
决不会那样消亡……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阴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为了帮助被流放者改善生活条件，穆拉维约娃还把苦刑犯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通过书信传送到彼得堡，在那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改善的措施。

不幸的是，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和矿坑的苦难生活，过早地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这位被人们称为“西伯利亚圣女”和“爱神”的妇女，28岁就离开了人世。尽管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和不幸，但直到病逝时，穆拉维约娃的脸上始终带着幸福的微笑。

玛丽娅·沃尔康斯卡娅是俄国名将拉耶夫斯基的女儿，在起义前不久，她嫁给了十二月党人南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沃尔康斯基。

尽管玛丽娅在起义前一无所知，但尼古拉一世的血腥镇压和丈夫的被捕、流放，使她的思想趋向革命。她坚信丈夫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和高尚的，十二月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和英雄。因而，她认为自己应当立刻奔赴他们最需要自己的地方。当她越过千山万水，天使般地出现在文大面前时，沃尔康斯基几乎疑在梦中。玛丽娅激动地跪在地上亲吻丈夫脚踝上的镣铐，以此来表达对蒙受屈辱的爱国者的深深敬意。

玛丽娅的到来，给地狱般的矿坑带来了欢愉和乐趣。她热情刚强，性格豪爽，乐于助人。为了尽力帮助这些正处在困难中的人们，她在整大忙着洗衣、做饭，尽力改善囚犯们伙食的同时，还买来成卷的麻布，为衣衫破烂的人做衣服。她尽力精心护理每一个病人，给他们送去自己的食物和药品。为帮助那些准备逃离流放地的难友，玛丽娅在暗中慷慨地资助他们，虽然他们当中有的又被追回，却没有一人肯供出玛丽娅的名字，因为他们都从内心感激这位和善可亲的“神的天使”。

1841年3月，正在服刑的十二月党人米哈依尔·卢宁由于在通信中抨击沙皇的专制制度，再次被判刑并流放他地。玛丽娅十分钦佩卢宁的勇气，她在卢宁动身前为他缝制了大衣，并在衣缝中装进纸币。当卢宁被隔绝在荒无人烟的流放地时，玛丽娅仍经常设法为他捎去书籍和文具。卢宁直到去世前，一直与玛丽娅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像热爱自己的姐姐那样地热爱”玛丽娅。卢宁死后，玛丽娅和卢宁的姐姐取得联系，帮助安排处理卢宁遗留的书籍和文稿，并为他修建了墓碑。

长年的流放生活，不但没有能够摧毁玛丽娅的意志，反而把她磨炼得更加刚毅坚强。20年后，当她终于从流放地回到家乡时，她写了《祖母的札记》一书，成为后世研究十二月党人活动的珍贵资料。她在书中这样地概括了自己的幸福观：

“幸福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都能找到……我的丈夫越是不幸，越需要我的支持和坚定。当我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时，我感到非常幸福，得到了精神上的安宁。”

正是这些美丽而勇敢的俄罗斯妇女，给十二月党人漫长的苦役生活增添了生气和欢乐。在她们的积极倡议下，矿坑里成立了“犯人科学院”，傍晚时大家聚会一堂，唱歌，朗诵，有时还举办文学、军事、物理和化学课程的讲座。

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用热情的诗句赞颂了这些“西伯利亚圣女”：

美妙绝伦的形象！你未必

在哪个国家的历史上，

找得到更加美丽的东西。

她们的名字永不该忘。

如果说，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过去对她们丈夫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还了解不多的话，那么，长年的流放生活，却把她们推上政治舞台，从而使她们成为第一代参加革命活动的俄国妇女。

戴王冠的警察

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尼古拉一世踩着贵族青年革命者的鲜血，登上了沙皇的宝座。在此后的30年中，他在对内极力维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拼命扼杀自由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同时，疯狂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因此，人们把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称为是俄国“专制制度的顶点”。

尼古拉一世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手中遭到种种非议的权力，撕去一切君主都试图穿戴的伪善外衣，断然实行公开的暴政。他发誓说：“只要我一息尚存，革命就不会传到俄国来。”

在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尼古拉一世全力加强警察职能，下令设立了宪兵团和内廷第三厅，专门负责惩办“国事犯”，监视分裂分子和外国人，放逐嫌疑犯，搜集秘密情报等。

尼古拉一世这位“戴王冠的警察”，还千方百计“给自由言论加上铁的面罩”。1826年和1828年，他先后两次颁布了苛刻的书刊检查条例，凡怀疑宗教、批评专制制度、提倡政治改革的作品，一律被禁止出版；作者和书报检查官如有违反条例，轻则禁闭，重则流放。别林斯基，赫尔岑，恰达耶夫等进步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因发表反对专制统治的作品而受到迫害；讴歌自由的伟大诗人普希金被沙皇政府设计致死，诗人莱蒙托夫因痛斥杀害普希金，而被流放到高加索。

根据尼古拉一世“不需要博学之士，而需要忠臣”的信条，俄国教育部门制定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反动教育方针。在大学里，禁止讲授哲学、自然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在官方批准发行的书籍和教材中，农奴制俄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被说得“富丽堂皇”，光辉灿烂。这种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维持腐朽不堪的俄国农奴制度，尼古拉一世下令确立贵族禁地制，规定贵族禁地只能由长子继承，不得分割和出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上巩固高级贵族的地位。资产阶级分子只能成为新设立的世袭和私人的“荣誉公民”等级，不得攀附贵族而获得贵族头衔。

尼古拉一世继承老沙皇的对外扩张政策，把保护欧洲专制政体和解决东方问题，作为俄国对外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为此，他悍然镇压了波兰民族起义和匈牙利革命，充当了凶狠的刽子手和宪兵。

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波兰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由沙皇兼任波兰国王。1830年后，波兰贵族在城市贫民和农民的支持下，发起了波兰民族解放运动。1831年1月，波兰贵族议会剥夺了尼古拉一世及其家族在波兰的王位，尼古拉一世闻讯，立即调动10万大军和300门大炮进攻波兰。在占领华沙，扑灭起义后，再次宣布波兰为俄罗斯帝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波兰王位由俄国皇室世袭。

1848年初，欧洲各国革命风潮蓬勃兴起。尼古拉一世即刻在俄国西部边境驻屯军队，储备军需，随时准备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

1849年春，匈牙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英勇抗击奥地利军队的入侵。奥军接连败北，损失惨重，匈牙利革命政府控制了几乎全部的领土。应奥地利政府的请求，尼古拉一世迅速派遣了14万俄军侵入匈牙利，残暴地扑灭了匈牙利革命。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沙皇俄国再次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保持了欧洲“宪兵”的可耻“荣誉”。

解决“东方问题”是尼古拉一世对外政策的另一项主要目标。1828年，他发动对上土耳其的战争，迫使土耳其把多瑙河口及黑海东部沿岸划归俄国，并承认了希腊、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的自治。俄国影响的不断扩大，引起了在中近东有着巨大殖民利益的英国的恐惧，英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848年欧洲革命被沙皇几十万军队最终镇压后，尼古拉一世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他不仅是欧洲的主人，而且应当是世界的主人。他决定利用当前的地况和时机，实现他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这时的土耳其在尼古拉一世的眼里是个“垂危”的病人，为了实现南下征服上土耳其帝国，打通黑海海峡，夺取近东和巴尔干的战略目标，尼古拉一世准备同英国瓜分土耳其。但是，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却更乐于同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对俄国。奥地利在东方问题上的反俄立场坚定如故。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斗争日益激化。

50年代初，尼古拉一世决定利用土耳其占领下的耶路撒冷“圣地”问题，对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1852年8月，土耳其政府在法国的压力下，保证天主教徒对圣地拥有的管辖权。尼古拉一世以此为口实，指责上土耳其政府迫害东正教徒，派遣使团，要求土耳其承认沙皇是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者”。土耳其苏丹政府在英法支持下，拒绝了沙皇的要求。俄军就此开进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1853年10月4日，土耳其向沙俄宣战。1854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由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空前孤立，同时帆船舰队无法对抗英国的汽船舰队，制海权逐渐被英法联军掌握。1854年9月6日，英法联军包围了俄国黑海舰队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尽管俄军进行了11个月的顽强抵抗，终因武器装备落后，指挥无能等原因而宣告失败。残存的黑海舰队舰只全部被凿沉或烧毁。

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的东方政策受到严重挫折。这场战争使俄军伤亡52万人，耗资达5亿卢布，俄国财政因此而陷入崩溃状态。俄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再次趋于高潮。

1855年2月，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的前夕，尼古拉一世突然服毒自杀。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只得停战求和。1856年3月30日，双方签订巴黎和约：俄国放弃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东正教臣民的保护权；黑海中立化。

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国农奴制度的腐朽和俄国经济技术的落后。这场战争的失败，成为推动俄国农奴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人间喜剧》

1828年4月的一天，巴黎贫民区卡西尼街，搬来了一位新房客。这位不到30岁的大块头，总是笑咪咪的，两道浓眉下，一对棕色的眼睛炯炯有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年出生在法国都尔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7岁时被父亲送到王多姆学校读书。1814年，巴尔扎克随全家迁居巴黎，进入大学学习法律，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担任见习生。

巴尔扎克的父亲希望儿子今后能够成为一个大律师。巴尔扎克却热衷于文学创作，决意要当一个文学家。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20岁的巴尔扎克同父母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协议：他住在外边去写作，家里每天给他4个法郎作为生活费。如果两年之内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他就乖乖地去当律师。

为了帮助儿子“改邪归正”，他母亲特意为他租了一间冬冷夏热的破房子当工作室。她认为，当儿子在这里冻得发抖、饿得肚子咕咕叫时，一定会回心转意，坐到律师事务所的皮椅子上去的。

1819年8月，巴尔扎克搬进了又脏义破的工作室。他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立即着手写作，写什么呢？小说？戏剧？还是论文？他冥思苦想了一番，最后决定写一部悲刚《克伦威尔》。他一人关在小屋里，写啊写，有时一连三四天不出屋，奋战了半年多，总算把悲剧写出来了。他兴冲冲地跑回家去朗读。可是当他兴致勃勃地朗读了三四个小时，家里的人和朋友们都快睡着厂。像他这样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历史知识和创作方法都不熟悉，怎么能一下写出好作品来呢？不用说，这个悲剧是失败了。

巴尔扎克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家里停止供给他生活费，他不得不同别人合作，用各种笔名写些平庸的小说，卖给出版商，赚钱维持生活。后来，他想自己做个出版商，出版莫里哀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于是借了钱来当老板。可是，这位外行老板总受人家的欺骗，蚀了老本，还背了一身债。紧接着，他又当了一家印刷厂的老板，计划着自己写书，自己选编，自己印刷，自己出版。但是，不管他如何拼命挣扎，还是失败了。

到1828年，巴尔扎克已欠下了9万法郎的巨额债务，每年单是利息，就要付出6000法郎。巴黎警察局奉命要逮捕巴尔扎克，他只好改名换姓，躲进了贫民区的一间小屋。从此，这位资产阶级的大少爷，成了贫民区里的一个成员。

贫民区的生活使巴尔扎克大开眼界，在这里，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听到了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咒骂和抗议，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看到过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经过冷静思考，他抛开了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夜以继日地读书，增长了各种知识。这样，他的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1829年，巴尔扎克第一部成功的作品《朱安党人》问世了。书中描写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王党发动的一次叛乱。为了写好这部小说，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献，亲自去调查战乱地区的山川地形和农民生活，访问了这次战争的参加者。他以现实主义的锐利目光，洞察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所以书写得有声有色。巴尔扎克为自己的创作成功而感到自豪，第一次在封面上印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朱安党人》的创作成功，揭开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创作序幕，

他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作品构成一个整体，以反映 19 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

1842 年，巴尔扎克写了《人间喜剧》的序言。他把作品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其中《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等，这是《人间喜剧》的主体部分。巴尔扎克原计划要写出 137 部小说，实际完成了 94 部。

打开这部包罗万象的巨著，人们可以看到 2000 多个各式各样的人物，既有将军、法官、公爵、公爵夫人、新旧贵族、僧侣、金融家，也有商人、医生、散文作家、画家、诗人、新闻记者，以及农夫、挑水夫、女戏子、老处女、卖笑妇等。他们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形象，遭遇和生活方式。在巴尔扎克的着意刻画下，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构成了 19 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缩影。

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巴尔扎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形象，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典型。

《人间喜剧》中最有名的是小说《高老头》，它代表着巴尔扎克创作上的一个高峰。小说以 1819 年至 1820 年的巴黎为背景，由四条线索紧密交织而组成。退休面条商高里奥被自己的两个女儿榨干，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贵族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迈出了向上爬的一步；苦役逃犯伏脱冷引诱拉斯蒂涅，合谋争夺遗产，身份暴露后被捕；巴黎贵妇鲍赛昂夫人败于资产阶级女子手下，凄凉地退出了上流社会。

巴尔扎克的创作异常勤奋。每天深夜 12 点，当巴黎市民们都进入梦乡时，他拉好窗帘，点上蜡烛，开始投入工作。他写了又写，手疼了，眼花了，稍稍放松一下，马上又埋头写下去。外面的天空发亮了，他已连续工作了五六个小时，手指麻木了，双眼开始流泪，他喝下浓浓的咖啡，振作一下精神，又继续写，直到 8 点钟。他休息一会儿，洗个热水澡，紧接着就开始处理白天的日常事务：接待印刷商、出版商，修改文章校样，一直工作到晚上 8 点钟。吃过晚饭后，他睡上几个小时，深夜 12 点钟又开始工作。

巴尔扎克就是这样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持续了 20 多年。但他在逝世的前三年，仍欠下 21 万法郎的债务。他还债的唯一方法，只有拼命地写作。长年的劳累，使他本来很结实的身体崩溃了。

1850 年 8 月 18 日，这位《人间喜剧》的作者，终于离开了充满悲剧的人间，终年 51 岁。

广坛巨匠雨果

1830年2月25日晚，巴黎的法兰西人剧院正要上演一位青年作家的浪漫剧《欧那尼》。戏没开演，站在剧场门口的观众却已冲突起来。

“停演！停演！这戏糟透了，它把古典艺术彻底糟塌了！我们反对演出！”许多人高喊着。

“上演！上演！这戏好极了，它充分发挥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欢迎演出！”另一些人大声争辩着。

两派从开始争辩发展到后来为动武。反对演出派爬上屋顶，把垃圾箱里的垃圾拼命往下扔，主张演出派则守住剧场决不退出，得到他们的支持，全剧照常演出。尽管剧场里没有往日的秩序和安静，反对派不时插话和起哄，但演出仍获得成功。在支持演出观众中，就有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因为支持演出，他的头还被打。一出浪漫剧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那就不能不谈谈它的作者维克多·雨果。

1802年2月26日，雨果出生在法国东部的贝藏松省。他父亲是个细木匠的儿子，在法国大革命中参加了拿破仑的军队，平定过保王党的叛乱，因此在几年内就升任为将军。他对拿破仑感恩戴德，是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雨果幼年跟随父亲的军旅到过意大利和西班牙，见过不少世面。

1812年初，父亲把雨果送回巴黎，想让他进入工艺学校，但没成功。雨果从小就对文学发生兴趣，从14岁起开始写作。15岁时，他写的诗还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奖励。年轻的雨果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文学事业。

照理说，雨果有这样一个父亲，应受到共和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母亲却是波旁王朝的坚定拥护者。波旁王朝复辟后，母亲感到年轻了许多。雨果懂事时，正赶上父母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他跟了母亲。受到保皇主义影响，反映在他初期的创作中，有不少是歌颂波旁王朝复辟的作品。

但事实很快教育了雨果。他的朋友龚隆无隆被官方指控为“阴谋叛乱”，要处以死刑。雨果事先得到消息，马上写信给龚隆的母亲，让龚隆到自己家里来躲一躲。他万没想到，当局偷看了这封信，抄录后重新封好，又寄给龚隆的母亲。幸好龚隆已逃离法国，否则警察一定会在雨果家中抓住他。雨果亲眼看到自己曾经如此信赖的政府，竟然干出私拆信件、施展阴谋的可耻勾当，他受到沉重打击。望着父亲的满头白发，回想父亲跟随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战争生涯，他懂得了共和政体的可贵。这一切都使他对保皇主义思想，产生了厌恶情绪。

在法国文坛自由主义思潮日趋高涨的背景下，雨果的政治态度迅速改变。1827年，他的诗歌中开始出现与复辟王朝唱反调，歌颂拿破仑的主题。同年，他为自己的剧本《克伦威尔》写下著名序言，成为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在这篇序言里，雨果激烈地批判了束缚资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伪古典主义，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文学主张，从而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指明了道路。从此以后，他始终遵循自己的进步的文学主张，驰骋在法国文坛上。

从1827年到1840年的13年间，是雨果文学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之一。除了引起激烈争论的浪漫剧《欧那尼》外，他的作品还有诗集《东方杂咏》和《秋叶集》，人道主义小说《死囚的末日》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这是一部善良的无辜者在中世纪封建专制制度下遭到摧残和迫害的悲剧作品。女主人公爱斯米拉达是个纯洁热情的吉普赛

少女，在巴黎街头卖艺为生。巴黎圣母院教堂的副主教孚罗德对她动了邪念，企图占为己有，当发现她另有所爱时，又刺伤她的情人并嫁祸于她，使少女被判死刑。行刑之日，圣母院丑怪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把她从刑场上救出，安置在圣母院避难。但教会诬称爱斯米拉达是反宗教的女巫。孚罗德趁机把她劫走，威逼她屈从自己的兽欲，在遭到拒绝后就把少女交给了追捕的官兵，他则在圣母院楼上看着她被送上绞架。狂怒之下的加西莫多把孚罗德推下钟楼活活摔死，他自己也到公墓自尽在爱斯米拉达的尸体旁。

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45年又被授予伯爵头衔，活跃于政治舞台，摇摆于君主立宪制和共和政体之间。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等人发表宣言试图反抗，失败后，被迫流亡国外19年之久。

在流亡布鲁塞尔和英属杰西岛期间，雨果把全部精力投入创作活动。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静观集》、《惩罚集》、《海上劳工》以及杰出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战败被俘，法国重建共和国。雨果从海外回到巴黎，积极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这位68岁的老人报名加入了国民近卫军，并捐献自己的积蓄，铸成两门大炮，其中一门取名为“雨果”。1871年2月国民议会选举，他当选为巴黎代表。

“巴黎公社”成立后，雨果并不理解和赞成。但当公社失败后，他却十分同情社员的遭遇，毅然登报声明，欢迎逃亡的公社社员到他家里避难，同时标明了详细地址。第2天，就有一伙保皇党徒前来砸烂了他家的玻璃。为了救助被判罪的公社社员，他不停地写文章，作演讲，公开为公社社员辩护，反对普鲁士入侵。

1874年，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出版。这部历时10年完成的重要作品，再现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庞大场面。雨果晚年的最后作品，是他的四部诗集。

1885年5月22日，雨果因病去世，法国举国致哀，表示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尊敬。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们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公社社员们都去参加雨果的葬礼。来自法国各地的上百万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经过凯旋门，一直前往墓地。

人民不会忘记雨果，他的名字随同他的杰出作品，传遍了整个世界。

科学共和国

1804年一个仲夏的早晨，伦敦街头走来一个报童。他个子瘦小，眉清目秀，虽然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但看上去却挺精神。他肩挎报纸包，一面啃着面包，一面哼着歌曲。

他来到一家镶有铜牌的大门前敲了几下，从挎包里取出一份报纸。在等候开门的片刻，报童的目光忽然落在身旁的栏杆上，他停止了唱歌，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如果我的头伸进栏杆里，而身子还在栏杆外，那我究竟应该算在栏杆哪一边呢？”

正当报童在凝神思索时，大门打开了。他躲闪不及，脑袋被重重地碰了一下。他的“栏杆难题”还没有找到答案，脑门上却鼓起一个大包，惹得开门的女仆和过路人都哈哈大笑。

这位闹笑话的报童，就是13岁的迈克尔·法拉第。目睹这场笑话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被窘得面红耳赤的穷孩子，日后竟成了英国最负盛名的大科学家。

1791年9月22日，法拉第出生在英国纽因敦城的一个铁匠家庭。5岁时，他随全家来到伦敦。由于家境贫苦，法拉第小小年纪就开始谋生。他13岁到一家书报店当送报童，第二年转为店里的装订工。浩瀚的书海为他打开了知识的宝库，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自学，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书报店成了他的启蒙学校。

从13岁到21岁，法拉第在这家书报店里工作了八年，等于上了八年的学，为他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大英百科全书》中的电学知识部分。

1812年，一位常来买书的皇家学会会员送给法拉第四张听讲券，主讲人是皇家学院化学教授戴维爵士。法拉第对戴维敬仰已久，现在能亲耳聆听讲演，真是欣喜异常。听讲那天，法拉第很早就去了。他坐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屏息静听，做了详细记录。回到书店，他在烛光下把记录整理抄写出来。

同年，法拉第学徒期满，将成为一名技术工人。但他希望能够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把戴维的讲演记录寄给戴维，并附上一封恳切的信，希望得到一个能够接触技术的职位。戴维被这个青年人的身世和热情打动了。1813年，皇家学院解雇了一名爱吵架的实验员，戴维推荐法拉第接替了这项工作。法拉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进入了皇家学院，并在那里工作了55年。

1813年10月，法拉第陪同戴维夫妇前去欧洲大陆旅行，先后前往法国、意大利、瑞士、德意志等国家，会见了万克林、安倍、伏打、德拉里夫等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在这所“欧洲大学”，他大大开拓了视野，学到了很多知识。

1816年，法拉第在戴维的指导下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又经过两年锻炼，他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一位能独立工作，具有独创精神的实用化学家。由于皇家学院经费困难，法拉第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营利的工业应用研究方面。他试制过铁的合金，改良了光学玻璃，研究过液化气体，发现了苯。但从1820年起，他的主要兴趣一直在揭开电磁之谜上。他大胆提出了“从磁产生电”的设想。

1823年，32岁的法拉第因为化学方面的成绩，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在

皇家学院任教。1829年，为集中精力投入电磁研究，他辞去了皇家学院的课程，谢绝了公司厂家们的重金聘请，全力投入研究，开始了他科学上的全盛期。

1831年是法拉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秋天，他的电学实验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一天，当法拉第把实验台重新调整，使他的目光可以一直看到电流针，然后合上电源。就在线路接通一刹那，电流计指针猛地跳动了一下。“啊，电流！”，法拉第欣喜若狂。经过一系列改进，他终于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完全揭开了电磁之谜。

电磁感应是近代物理学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法拉第一旦越过这座高峰，立即向纵深挺进。他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电的普遍性；在戴维多年工作的基础上，他发现了著名的电解定律。他通过对电介质和导体的深入研究，断然废除了电学理论的许多过时名称，而更换了新名词，如电极、阴极、阳极、电解、离子等。

1841年的春天，他悄悄回到伦敦。50岁的法拉第由于长年操劳过度，患有严重的精神衰弱症。在遵照医生的建议，前往瑞士休养了五年后，他又回到了实验室，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光的电磁学。法拉第郑重提出，电力线和磁力线的振动，可以产生光和其他辐射现象。一个革命性的、使人耳目一新的学说从此诞生了。

世界上没有完人。作为一个实验科学家，法拉第长年泡在实验室里。不关心时事政治，也许是他最大的缺点。他从反对政治，到反对任何带有政治口的事情。他希望世界上只有一种共和国，那就是“科学共和国”。他在给泰达尔的一封信中写道：“当科学是一种共和国时，那就算成功了。”

法拉第在确立电磁场理论时，已年近60岁。他的健康和精力已大不如前。由于他对电磁学的巨大贡献，晚年获得了全世界的敬重，各国授予他的奖章和荣誉称号像春天的鲜花一样繁多。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纯朴无私的人格，使许多人为之倾倒，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都以能和他结识为荣。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曾这样称赞说：

“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像法拉第那样，遗留下许多令人惬意的成就，当做赠与后辈的遗产而不自满……他的为人异常质朴，爱慕真理异常热烈；对于各项成就，满怀敬意；别人有所发现，力表钦羨；自己有所得，却十分谦虚；不依赖他人，一往直前的美德。所有这些融合起来，就使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高尚人格，添上一种罕有的魔力。”

面对一片荣誉，法拉第始终虚怀若谷。他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伟人。晚年时，英国皇家学会一致推选他为会长。根据他的贡献和声望，由他担任这个职务是当之无愧的。但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他对朋友说：“我还始终保留做一个平常的法拉第！”

法拉第对公益事业却从不推卸。当初有人请他给一座灯塔当技术顾问，尽管工作繁忙，他还是愉快地承担了，并且几十年如一日，对灯塔的照明设施作了许多技术改进。每当法拉第看见灯塔在滨海暮色中闪闪发光的时候，心里就感到无限的愉快。

法拉第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的科普宣传家。1825年，他协助皇家学院开办“星期五夜校”，讲授探照灯、矿井通风等广泛的内容。1826年，他提议举办了“少年讲座”，亲自为青少年讲授电学观和宇宙观。

“圣诞节讲座”是皇家学院的一种高级讲座，每年在圣诞节举行，授课对象有专业和非专业的科学家，也有在校学生。在 1858 年的“圣诞节讲座”上，威尔士王子和正在英国避难的奥尔良公爵坐在最前排，听法拉第讲授莱顿瓶原理。

法拉第最著名的一次圣诞节讲课，是在 1849 年为孩子们讲的“蜡烛燃烧的化学过程”。这篇讲稿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再版。俄国甚至发表了讲稿的原文。

1867 年 8 月 25 日，法拉第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终年 76 岁。遵照他的遗言，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举行了极为简朴的仪式，他的坟前只立了一块小小的石碑。

没有举行轰动全国的葬礼，没有在墓碑上刻下他的功绩，然而法拉第的伟大，却是任何帝王所不能比拟的。他给后人留下的科学遗产，直到今天还在为人类造福。

进化论的奠基人

1831年12月27日，英国巡洋舰“贝格尔号”汽笛长鸣，徐徐离开了朴茨茅斯港，开始了它历时五年、行程25000海里的环球考察。就在这艘军舰上，由汉斯罗教授推荐的一位22岁的英国青年，将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随船考察。他就是近代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

1809年2月，查理·罗伯特·达尔文出生在英国西部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医生。达尔文从小就喜欢钓鱼、打猎，酷爱花、草、鱼、虫，卧室里总是摆满了各种昆虫、贝壳和植物标本。1825年，他和哥哥一起被父亲送进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他们获得医科学位，以继承家业。然而，达尔文在学校里，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博物学、矿物学这些几乎同医学不相干的学问上面。

两年后，当父亲得知18岁的达尔文“无法忍受外科手术”时，他又被送进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然而达尔文在这儿再一次走上了“荒废学业”的道路。他继续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自然科学书籍，采集动植物标本，听取自然科学讲座等方面。这一时期对达尔文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共同的爱好让他们很快成为朋友，一起散步，一起到郊外旅行。达尔文因而得到了一个绰号“与汉斯罗一起走的人”。

1831年夏天，达尔文在通过神学学位考试后，听从汉斯罗的建议，参加了对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同年8月回到家中后，从汉斯罗的来信中获知，他已被批准陪同“贝格尔号”军舰前往南美海岸进行考察，没有薪水，但供给食宿。达尔文立即接受了这个提议。

在巡洋舰上的五年，决定发达尔文一生的全部事业。这五年中，他从没有偷闲过半个小时。每到一地，他总要认真调查研究，跋山涉水，走进深山老林，挖掘生物化石，采集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发现了许多新物种。他战胜了热病的袭击，经历了晕船的折磨，锻炼了意志和能力，丰富了有关生物学的实际知识，也从而产生了对“神创论”的怀疑。

1836年，达尔文随“贝格尔号”满载而归。他谢绝了担任待遇丰厚的英国地质学会秘书的邀请，用了两年的时间，埋头整理他的考察日记和各种标本，出版了很有科学价值的《航海日记》等一批著作和论文。不久，他移居伦敦郊区，建立了一个动植物试验园地，集中精力研究生物进化发展的原因和物种的起源。经过22年的大量试验和刻苦钻研，达尔文终于完成了《物种起源》一书。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每册15先令，1250册当天销售一空。1861年发行第二版，很快又脱销。

在这部科学巨著里，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向人们表明“物种不是不变的”，一切生物都由少数生物进化而来，生物的进化是自然选择历史作用的结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说教，把生物学第一次从神学束缚下解脱出来，将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大发现之一。《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

《物种起源》像一颗重型炮弹在“神学阵地的心脏上”猛烈爆炸，震动了整个欧美大陆。上至英国首相，下至御用文人，都群起攻之。一些昔日的朋友和老师，也因观点分歧而变成仇敌。与此相反，很多科学家则坚定地表示

示支持达尔文，以赫胥黎为首的进步学者更是挺身而出，称自己为“达尔文的追随者”。赫胥黎写信给达尔文：“我准备接受火刑，也要支持你的理论。”

最激烈的大辩论，于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图书馆里展开了。会场内十分拥挤，连窗台上也坐满了人。牛津大主教威柏弗斯抢先跳上讲坛，在严厉指责达尔文触犯造物主后，他以谩骂的口吻质问道：“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是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你自己是由你祖父的还是从你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说完后，他在助威者的笑声中得意地回到了座位。

这时，只见赫胥黎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在揭露威柏弗斯对进化论和人类起源的无知后，赫胥黎有力地回击了主教大人的挑衅：“我说过，我再说一遍，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祖先是类似猴子那样的动物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开河，他不但满足于自己事业中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而且还要干涉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话音未落，听众中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场内这时大吵大闹起来，突然一阵混乱，人们纷纷离开了座位，原来布留斯特夫人看到大主教被逼得无言相对时，气得昏了过去……

牛津大辩论不仅没能扼杀进化论，反而使它迅速传遍欧美各地。无论是在德国、法国还是美国，到处都出现了激烈的辩论和论战。

随着时间不断推移，到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普遍被学术界所接受。1877年，当母校剑桥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学位并承认他对于科学的伟大贡献时，达尔文已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了。他是世界70多个科学协会、大学的名誉会员、名誉院士、名誉教授，并获得了各式各样的博士称号。

但是，达尔文不沉醉于荣誉之中，他随意将那些奖章、证书塞进抽屉，而把自己的精力完全奉献给了科学事业。直到病逝前两天，他还挣扎走到实验室，记录实验的进展情况。

1882年4月19日，73岁的达尔文在唐恩镇的家中静静离开了人世。为感谢他对科学的贡献，人们把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牛顿的墓旁。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对人类科学事业的贡献，他把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明之一，代表着当时科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达尔文的一生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曾不断地追求科学，并且把我的一生献给了科学。”他用自己22部不朽的著作和80余篇论文，证明了他留给后人的一句名言：对于科学，坚持者，必可成功！

普希金之死

1837年1月27日清晨，在彼得堡近郊黑溪的军官别墅附近，响起了一声凄厉的枪声。一位年仅38岁的青年诗人，随着枪声倒在雪地上。寒风吹着他蜡黄的脸，雪地上留下了殷红的血迹。两天之后，这位不幸的诗人死去了。

这位在决斗中被杀的诗人，就是被称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贵族世家。从少年时代起，普希金就十分爱好读书。他从保姆那里听到了许多俄罗斯民间故事，在10岁的时候，就已出版了一本小诗集。

18岁那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在彼得堡，他结识了许多十二月党人，常常在一起讨论俄罗斯未来的命运。普希金这时写出了一批歌颂自由，反对专制的诗篇，引起很大的反响。

在《自由颂》一诗中，普希金称沙皇是“世界的暴君”，呼唤俄罗斯“从梦中觉醒”。这些愤怒的诗篇很快以手抄的形式，传遍了整个俄罗斯，人们赞不绝口地传诵着，争先恐后地抄录着。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听说后异常气愤，决定把普希金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由于得到友人的帮助，改为流放到南方四年，四年以后，再流放到他父母的家乡，接受当地官员的监督。

1820年5月，普希金从彼得堡动身，开始了他六年的流放生活。虽然历经了病痛、歧视等各种磨难，但却没有禁锢住普希金追求自由的思想。俄国南方优美的自然景色，哥萨克地区的风土人情，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丰富了他的诗歌题材和形象。《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茨冈》等优秀作品，都表达了他向往自由的心情。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普希金非常痛苦，他清理文稿，等待官方来抓他。但刚刚上台的尼古拉一世为了欺骗舆论，决定收买普希金。沙皇派人把普希金接到了克里姆林宫，装作亲热的样子和他谈了两个小时。他问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会不会参加十二月党人起义？普希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一定的，陛下！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了这件事，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沙皇没有当场发怒，反而宣布结束他的流放生活，但今后将由沙皇自己担任普希金作品的审查者。

沙皇的“仁慈”，给普希金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锁。这位伟大的诗人每写一部作品，都要受到沙皇的干涉。普希金气愤地说：“我没有能力改写我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宁肯自己的作品被扼杀，也不肯屈从沙皇的蛮横无理。

沙皇也很快明白，普希金的口和笔是无法驯服的。于是，他派警察秘密监视普希金，到处跟踪，拆看他的信件，并指使无耻文人散布谣言，诽谤普希金。沙皇的监视，密探的骚扰，压得普希金喘不过气来。

1829年初春，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普希金，不顾对他行动自由的限制，毅然前往高加索，去看望流放在那里的十二月党人。这次未经允许的行动，招致了沙皇的不悦和严厉的斥责。为了摆脱这种“囚犯”生活，普希金多次请求让他去欧洲或中国，但都遭到拒绝。

1830年，普希金为了准备婚事，回到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波尔金诺村，整整住了三个月。这是普希金一生中创作的高峰时期，被称为是“多产的秋季”。他完成了长篇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创作了《驿站长》、《吝啬的骑士》等一批小说和剧本，以及近30首抒情诗和论文。

作为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根尼·奥涅金》是一部具有高度的独创性

和俄罗斯民族性的作品，它揭开了 19 世纪俄罗斯长篇小说史的第一页。作品的主人公贵族青年奥涅金，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人物。他热衷社交生活，但又感到生活的虚伪和无聊。朴素热情的姑娘达吉雅娜对他表示好感，但却被他拒绝。他为了了一件小事，在决斗中用枪打死了达吉雅娜妹妹的男友连斯基，因而感到十分痛苦和悔恨，四处漫游。当他再次遇到达吉雅娜，并真正爱上她时，她却早已嫁人。纵观奥涅金的一生，他是一个毫无作为的“多余的人”。

普希金用了八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目的在于告诉人们，造成奥涅金这种性格的，正是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普希金期望能够唤醒俄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克服自私和懦弱的缺点，振作起来，以实际行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争得祖国和个人的自由。

1831 年 2 月，普希金同比他小 13 岁的娜塔丽亚结婚。他们从莫斯科迁居彼得堡，普希金又进入外交部工作。

年青貌美的娜塔丽亚很快喜欢上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生活，总是要求普希金陪他外出交际跳舞。苦恼的事情接踵而来。沙皇尼古拉也为娜塔丽亚所倾倒，有意任命年已 35 岁的普希金为宫廷近侍，而这通常是给十七八岁年轻人的荣誉。沙皇的目的是为娜塔丽亚参加宫廷舞会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是有意贬低普希金。普希金气得发了狂，但在朋友们的极力劝说下，也只能忍气吞声，消极地对待这个职务。

沙皇采用手段逼迫普希金顺从，普希金却没有低三下四的奴性。在辞职、请长假都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普希金哀叹道：“给了我灵魂和才能，却让我生活在俄国，这是魔鬼的作祟啊！”

正在这时，一个谋害普希金的阴谋正在形成之中。利用受到沙皇重用的法国人丹特士，正在疯狂追逐普希金妻子的机会，有人给普希金寄了一封恶毒的匿名信，污辱普希金夫妇。普希金忍无可忍，决定与丹特士决斗。当妻子跪下来求他不要去时，普希金意味深长地说：“难道我去决斗是为了你吗？”他明白，自己是在同俄国整个的黑势力决斗。

1837 年 1 月 27 日清晨，当普希金刚刚在决斗射击位置上脱下大衣，准备停当，丹特士首先开了枪，普希金应声倒下，两天后与世长辞。

普希金的死，震动了整个俄罗斯，群情激奋。三天之后，有 5 万多人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和致敬。自从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彼得堡的街道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群。极度恐慌的沙皇政府害怕发生骚动，突然下令取消了举行隆重葬礼的承诺。在宪兵的押送下，由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等人把普希金的遗体，埋葬在他父母的田庄米哈伊罗夫斯基村的圣山镇教堂。

向沙皇喷吐怒火的人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这是一位著名的俄国诗人，在获悉普希金遇害的消息后，冲破沙皇不许宣传的禁令所发出的复仇之声。这首《诗人之死》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凶手和幕后指使者的心脏，成为反对沙皇统治的战斗檄文。人们争相传诵这不朽的诗篇，为俄国文坛又出现一位杰出的诗人而欣喜庆幸。

这位诗人就是继普希金之后，俄国 19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诗人莱蒙托夫。

1814 年 10 月 15 日，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退伍军官家庭。他自幼丧母，随外祖母生活在边查省。1830 年秋，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在这所被誉为俄国进步思想中心的学校里，他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活动，热心研究政治、哲学、文学等问题。受到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他开始创作否定贵族上流社会，追求自由的诗歌。莱蒙托夫继承了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传统，在作品中善于把抒情与写景结合起来，做到情景交融，创造了鲜明的诗歌形象。

1832 年，莱蒙托夫因参加抵制保守教授的活动，被迫离开莫斯科大学，进入彼得堡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皇村近卫军骑兵团服役。莱蒙托夫对彼得堡沙龙和客厅里的空虚无聊生活深感厌倦，他把对权贵们社会本质的透彻了解，通过剧本《假面舞会》形象地表现出来。由于该剧对整个上流社会进行了尖锐揭露和批判，莱蒙托夫虽再三争取发表，但都未能如愿。

1837 年 1 月，“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被上流社会迫害致死，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激起悲愤的感情巨澜。“愤怒出诗人”，历史突然间把莱蒙托夫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推上了反抗暴政的光荣位置。莱蒙托夫以罕见的勇气，不顾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不许声张普希金之死的禁令，发表了《诗人之死》一诗。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扼杀自由、天才、荣耀的刽子手。”把多年积压在人民胸中的怒火，用诗的语言喷吐出来。

《诗人之死》轰动了 19 世纪 30 年代的俄国，这首政治抒情诗以手抄本的形式迅速流传。它被认为是“俄国诗歌中最有力量的一首诗”，标志着莱蒙托夫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登上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诗坛。

《诗人之死》一诗激怒了尼古拉一世，诗人立即遭到逮捕和放逐。后因茹科夫斯基等人从中活动，莱蒙托夫获准回到彼得堡。虽然这时他作为著名诗人到处受到赞扬，但他对黑暗现实的憎恶和同辈人容忍现实的可悲，仍进行深刻的批判。在抒情诗《沉思》中，他的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得到很好的表述：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那前途不是黯淡定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就要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莱蒙托夫对俄国上流社会的否定，总是与他对生活的热爱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诗歌风格虽显沉郁，但不颓丧，虽令人柔肠百转，但不使人悲观泄气。1841 年他去世前，既创作了《别了，涤荡不净的俄罗斯》这自敌视“老爷的王国”的抒情诗，又写了《祖国》这首对大好河山和淳朴人民怀有深情

的诗篇。小说《当代英雄》则是莱蒙托夫创作活动的总结。

1840年2月，莱蒙托夫在一个舞会上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发生冲突，沙皇政府借机小题大做，军事法庭根据尼古拉一世的直接指示，判决莱蒙托夫第二次流放高加索，再次想假手杀人。1841年2月，莱蒙托夫因病回到彼得堡，亲身感受到了宫廷宠臣及走卒们对他的敌意。

正当莱蒙托夫决心脱离军队，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时，突然接到48小时内离开彼得堡的急令。7月15日，在他前往流放地途中，受到几个贵族的挑逗，在同退伍少校玛尔廷诺夫决斗中不幸身亡，年仅27岁。

从为普希金之死伸张正义，到自身也惨遭上流社会的卑鄙报复而死于同样的决斗圈套，仅仅四个年头。莱蒙托夫过早地结束了他的思想和艺术的探索，正如高尔基所说，莱蒙托夫是一曲未唱完的歌。他的悲剧告诉人们，否定暴政的人受到暴君的否定，却得到历史的肯定。作为反抗暴政的歌手，莱蒙托夫在俄国文学史上永远发出耀眼的光芒。

丑小鸭闯入哥哈根

1819年9月6日，一个14岁的男孩为了实现当个艺术家的理想，只身来到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这个瘦高个的半大男孩，手里拎着又小又旧的行装，口袋里只有13块钱。他凝望着教堂的钟楼和尖顶、雄伟的皇宫和剧院，目不暇接，满心喜悦，可是他想得太简单了。一连几天，他到处碰壁，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个素不相识的乡下人。

忽然这个男孩想起了曾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位意大利歌唱家西博尼的名字。当他由女仆带进这位歌唱家的客厅，唱了一首咏叹调后，在座许多人的脸上最初那种寻开心的笑容消失了。人们感到好像有一股清澈的溪流在客厅里流淌。接着，他又为大家朗诵了一首长诗，更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就这样，这个只身来哥本哈根的男孩被西博尼收留。他就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童话作家的安徒生。

1805年，安徒生出生在丹麦富恩岛上的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母亲是个洗衣妇。贫困的生活并未能阻止小安徒生对文学的爱好。每天晚上，父亲给他讲《一千零一夜》的神奇故事，念莎士比亚的剧本时，他总是在神话世界中进入梦乡。11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安徒生和母亲的生活更加没有了保证。

1818年的一天，13岁的安徒生来到克里斯蒂安亲王的会客大厅。这个其貌不扬，手、脚和鼻子都显得“大了一号”的少年，在介绍人的陪伴下，前来请求亲王的帮助，使他能去读书或当个演员。但是亲王没等安徒生说完，就摇了摇那头假发，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你是个手艺人的儿子，应该学会一门手艺，这要比老想跳出自己的圈子而又一事无成的人好得多。”

话音刚落，一个贴身侍从谄媚地对亲王说：“您看，这个孩子的举动、风度，甚至声音，都有一股鞋匠的味道。您说的真是再好不过了，他只是块作手艺人的料。”

安徒生忍受不了这种嘲弄和奚落，他噙着眼泪，像发誓一样吃力地说道：“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说完扭头就走。沉重的橡木门在他身后“嘭”的一声关上了。安徒生决心用毕生的奋斗来扼住命运的咽喉。

生活的艰难，迫使母亲不得不改嫁。母亲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心，因此想把他送进学校，希望他长大做个裁缝。可是，安徒生不想当裁缝。从他看过哥本哈根的剧团演出后，他对演戏发生了极浓厚的兴趣。他一门心思想当一个演员，把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在一个阴沉的早晨，安徒生告别了祖母和母亲，离开了家乡。他提着又小又破的行囊，辗转来到举目无亲的哥本哈根。

西博尼收留安徒生后不久，新的打击又降临了。这年冬季，天气格外冷，安徒生从老家带来的衣服都穿破了，鞋子也破烂不堪。为了跟西博尼学习声乐，他每天冒着严寒，踩着冰雪去上课。为了买笔和纸，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几乎整个冬天都在与伤风咳嗽作斗争。更糟糕的是，他已到了变声期，嗓子突然变得粗哑难听，西博尼爱莫能助，只好送客。安徒生当演员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在此后的一年中，安徒生像只可怜的“丑小鸭”，到处受奚落和侮辱。他试着写作剧本，被人说成是轻率无知，满纸涂鸦。但他从事艺术事业的顽强意志并没有动摇。1822年，他写的剧本《阿芙索尔》受到热心人的鼓励。在一些好心的艺术家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份助学金，进入了一所正规学校

读书。1828年，他又考入了哥本哈根大学。

在学校里，安徒生废寝忘食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充分利用时间创作诗歌和剧本。但是，他的真正才能却显示在童话创作方面，先后创作了160余篇童话。这只当年的“丑小鸭”，终于脱下了灰色的旧衣裳，变就了美丽的白天鹅，准备展翅飞翔。

安徒生最初的童话作品有《火镰》、《豌豆上的公主》、《人鱼公主》、《皇帝的新装》等。由于不是贵族出身，加上童话中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使安徒生在成名之初，曾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斥。但在海涅、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一些欧洲大作家的支持下，他很快在国内外读者中获得了声誉。又接连创作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坚定的锡兵》、《夜莺》、《丑小鸭》、《雪女王》、《卖火柴的小姑娘》、《影子》、《老房子》和《母亲的故事》等。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朗。这是安徒生许多童话的基本主题。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中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有皇帝、大臣、地主贵族，也有普通的劳动者。安徒生以笑为武器，对统治阶级和“强者”的愚昧无知、野蛮残暴、自私虚伪、吹牛拍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斥，同时对弱者、对普通百姓却寄予满腔的同情。正是这种创作立场，使安徒生的童话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赢得了无数人的心。

安徒生的后半生大部分是在旅行中度过的，他在漫漫的旅途中探索着，构思着故事，童话是安徒生与孩子们沟通心灵的桥梁。不论走到哪里，不管站在他面前的是贵族的后代，还是乞讨的贫儿，他都用童话来陶冶孩子们的情怀和心灵。他一生没有结过婚，没有子女，他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未来的一代，被人们称为是“永久的孩子”。他和世界各地的许多小读者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一个在非洲出生的小女孩玛莉给他写信说：“我非常爱你，亲爱的，亲爱的安徒生。”

《皇帝的新装》和《夜莺》是安徒生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童话名篇。《卖火柴的小女孩》则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从1835年到1874年的几十年中，安徒生几乎每年都在圣诞节时推出一本童话集。每到圣诞节即将来临时，丹麦人，特别是少年儿童就很自然地会想到：安徒生又有什么新童话，是忧郁的，还是快活的？是讲夜莺还是一位白雪皇后？等着吧，他反正总有好事拿出来。

但是1875年的圣诞节，却使丹麦人失望了。因为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刚过了70寿辰的安徒生因病去世了。

革命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多少年来，这首不朽的《自由与爱情》颂歌，在一切热爱自由的人民中间传诵着。它冲破了语言和国界的限制，哪里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哪里就响着它激荡人心的旋律，鼓舞着人们为自由而献身。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匈牙利的伟大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

1823年1月1日，裴多菲出生在匈牙利佩斯城郊一个屠夫家庭，母亲是个农妇。家境虽贫寒，但裴多菲自幼学习刻苦，打下了很好的拉丁文基础，还学会了德文和法文。15岁时，已开始写诗，并十分喜爱戏剧。

1839年，父亲因一点小事，断绝了裴多菲的经济来源，使他不得不停学，到军队里当了一名步兵。后因患肺结核病而退伍。从此，裴多菲作为流浪艺人，走遍了匈牙利各地，深深了解到广大人民在奥地利统治下所经受的种种苦难。1842年，他所写的第一首诗《酒徒》公开发表后，裴多菲开始采用匈牙利民歌的形式从事写作，风格简朴，语言生动，朗朗可诵。

1843年，裴多菲在大诗人魏勒希马尔蒂的帮助下，担任了《佩斯时髦报》的助理编辑。第二年，他出版了长诗《农村的大锤》和《勇敢的约翰》，表达了匈牙利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裴多菲很快成为闻名全国的诗人，不久，他加入了佩斯激进的青年组织——青年匈牙利，并成为它的领导人。

19世纪40年代的匈牙利，正处在政治革新运动的浪潮中。1848年，在法国革命和维也纳三月革命的影响下，匈牙利爆发了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3月15日，裴多菲领导了佩斯地区的工人和青年学生举行起义。一万多名起义者在夺取了兰纳印刷厂后，提出了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召开议会、建立匈牙利军队、释放政治犯等12项要求。

当天下午，一万多名群众冒雨在民族广场集会，坚决支持维也纳三月革命。腰佩长剑，臂戴红白绿三色袖章的裴多菲激昂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时间到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作自由人呢，还是作奴隶？

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作自由人！作自由人！”人群齐声高呼。裴多菲继续朗诵着：

向匈牙利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一万多名群众庄严宣誓。这首激动人心的不朽诗作很快被印成传单，裴多菲又在诗的后尾加写一句：“1848年3月15日争取了出版自由后，第一次印刷的印刷品，它成了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会后，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奔向总督府，正在召开的总督会议，被迫同意了起义者提出的12项要求。许多爱国者被从监狱中放出，起义队伍更加扩大了。

匈牙利革命胜利后，奥地利王室进行疯狂的反扑。9月27日，新任匈牙利总督朗伯格伯爵到达佩斯。第二天清晨，佩斯人民即掀起暴动，在一片“绞死叛徒！共和国万岁！”的怒吼声中，朗伯格被从马车上拖下来，当场毙命。两天后，匈牙利人民又在巴克兹战役中打败了气势汹汹的奥地利大军。裴多菲在这时期，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和政纲性长诗《使徒》等一大批作品，鼓舞人民的斗志。

1849年4月，匈牙利人民在科苏特领导下，正式宣布脱离奥地利独立，成立共和国。同时组建了一支匈牙利革命军。裴多菲被任命为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总司令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

正当匈牙利革命军与奥地利军队进行浴血奋战时，沙皇在奥地利的请求下，派出10万俄军进入匈牙利。匈牙利革命军处于两面夹攻之中，革命到了生死关头。裴多菲赶往东部战场。

7月31日，俄军已将匈牙利军队团团包围。一支由300名骑兵组成的冲锋队，正准备向俄军发起最后的冲击。裴多菲就在这支队伍中。子弹像雨点般射来，裴多菲机警地躲进了旁边的玉米地。忽然，两个哥萨克骑兵向他扑来，躲避不及的裴多菲被长矛所刺中，英勇献出了生命，这时他还不满26岁。

裴多菲短促而壮烈的一生是诗人和革命家结合的范例，他是匈牙利人民的光荣。匈牙利人都不相信他已死上，甚至过了10多年后，许多人还在盼望着他的归来。

钢琴之王

1840年1月4日，正是东欧的隆冬季节。然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此时却春意盎然。布达佩斯人民都在关注着正在国民剧场举行的音乐会。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场音乐会啊！场内的近千名听众疯狂了，欢呼声、喝彩声震撼着剧场。场外的两万多名高擎着火把的音乐迷，冒着严寒守候在门外。

人们视线的中心是一位年仅29岁的青年钢琴家。他高高的鼻梁，长发披在脑后。他的钢琴技巧十分娴熟，演奏风格异常豪放。他忽而昂首挺胸，用两只手猛击琴键，发出雄壮的鸣响，忽而又俯理身来，倾听那小溪流水般柔丽的琴声。当他满怀激情地演奏《匈牙利狂想曲》作为结束曲时，音乐厅内一片沸腾。

演出结束了，六名身穿民族盛装的匈牙利人走上台，把一把象征最高荣誉的宝剑敬献给音乐家。只见他头戴金制的月桂冠，身佩闪光的宝剑，在听众的簇拥下走出了剧场。迎候在门外的人群向他欢呼致意，高擎火炬的浩荡人流，一直把音乐家送回到住处。

这位深受匈牙利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音乐家，就是钢琴之王李斯特。

1811年，李斯特出生在匈牙利的莱依丁库。父亲是一个公爵家的管家，爱好音乐，还会弹钢琴。李斯特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弹琴。由于他从小就很有毅力，练琴十分刻苦，6岁时就在家乡参加了音乐会的演奏。

李斯特的父亲为了让儿子得到深造，决定把全家搬到音乐之乡维也纳。在卖掉家具凑够路费后，父母带着李斯特终于来到维也纳，一家三口挤在只有一张单人床的一间小屋里。母亲睡在床上，父亲睡在长凳上，李斯特则睡在钢琴下。

尽管生活清苦，父亲还是为儿子聘请了优秀的钢琴老师。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李斯特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次演奏会，并引起了轰动。

第二年，12岁的李斯特又举行了第二次演奏会。这次演奏会对李斯特开始音乐家的生涯具有重大的意义。

举行演奏会那天，李斯特刚走上台，就一眼看到自己仰慕已久的音乐巨人贝多芬坐在第一排。当时，贝多芬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加上他对弥漫于维也纳音乐界的肤浅之风的反感，他平时已很少参加一般的音乐会。这次，这位音乐巨人竟破例来参加一个12岁匈牙利孩子的演奏会，怎么能不引起轰动呢！

也许由于贝多芬在场的缘故，李斯特这一天演奏得格外出色。欢呼声，鼓掌声多次使他的演奏不得不中途停顿下来。当李斯特演奏完最后一曲时，怀着崇敬的心情向贝多芬鞠躬致意。贝多芬这时从座位上站起来，像头雄狮一样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台，搂住李斯特，亲吻他的额头。53岁的音乐巨人拥抱一个12岁的后起之秀，维也纳欧洲各国报纸都详细报导了这一动人的场面。作为钢琴家的李斯特随之也闻名欧洲。

不久，李斯特全家迁居巴黎。从1823年至1848年，李斯特侨居法国26年。此时，正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高涨，革命风暴席卷欧洲的时代。受到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李斯特开始思考人生，并热衷于“民主共和政体”。他满怀激情地创作了《革命交响乐》，又前往里昂，为里昂纺织工人举行募捐演出，创作了钢琴曲《里昂》，把“不能靠劳动而生，不如为战斗而死！”

作为自己作品的题词。

1838年,27岁的李斯特正在意大利旅行,突然从报纸上看到匈牙利遭受特大水灾的消息。他心情非常沉重,立即驱车直奔维也纳,连续举行了10场救济匈牙利水灾的义演,引起巨大反响,场场爆满。他把演出收入的25000法郎全部捐献给了祖国匈牙利。

李斯特性格开朗,热情,待人宽厚。他不但同雨果、肖邦等著名人士保持着深厚的友情,同时对年轻的初学者也非常热心。

一天,李斯特路过一个小镇,这里正在举行钢琴演奏会。人们告诉李斯特,这个女演奏家还是他的学生呢!他看了一下挂在墙上的海报,感到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学生。于是,他找到这位女演奏家的住处,想问个究竟。那位女钢琴手一见到李斯特,大吃一惊,她低下头,满脸羞愧,流着泪说:

“对不起先生,我打了您的招牌,不然,人们是不会来听我的演奏的。”

李斯特问清原委后,便把她拉到钢琴旁,让她弹奏了海报上列出的一首曲子,并纠正了几处,指点了一会儿,然后对她说:

“好了,现在我已经教过你弹琴,今后你就是真正的‘李斯特的女弟子’了。这次演奏会上,我可以为你演奏一首。如果节目单还没有印,那么就请添上一行。”

女钢琴手欣喜万分,又一次流下了眼泪,她对李斯特的宽厚和热情感激不尽,终生难忘。

宽厚的李斯特,对待达官贵人却不那么客气。他在俄国旅行演出时,应邀去克里姆林宫为沙皇演奏。沙皇躺在沙发上,一边听李斯特弹琴,一边跟别人聊天。李斯特愤怒地把琴盖一关,中止了演奏。沙皇吃惊地问他怎么不弹了?李斯特回答道:“陛下谈话,我理应静默,不便打扰。”这巧妙的回答,竟使沙皇哑口无言,无从发作。

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李斯特在当时的欧洲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演奏技巧具有一种魔力,令人销魂落魄。他到各国旅行演出,足迹遍及英、法、德、意、奥、西、葡、波、俄等十几个国家。时时处处受到音乐爱好者狂热的欢迎。人们都把他当作“音乐皇帝”一样拥戴,称他是“欧洲第一钢琴家”、“钢琴之王”。

面对无数的赞誉和丰厚的收入,李斯特更多地想到的却是处在贫穷中的普通民众。他几乎把全部收入都用于赈济灾民,帮助贫困的友人和公益事业上。李斯特从小热爱贝多芬,即使在取得了几乎与贝多芬同样高的声誉时,他仍然非常尊敬贝多芬。著名的科隆贝多芬纪念碑的建筑费用,几乎全部是李斯特所捐献的。

经过多年的旅行演奏,李斯特感到非常疲劳。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也使他悲观消沉。就在这一年,他接受了德国魏玛宫廷的邀请,担任了宫廷乐长一职。

李斯特不但是位杰出的钢琴家,也是一位才能卓著的作曲家。在魏玛定居的10多年中,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作曲上,创作了钢琴曲、合唱曲、交响乐,宗教音乐等大量作品。其中《但丁神曲交响曲》、《浮士德交响曲》被认为是李斯特的代表作。

虽然李斯特一生侨居国外,但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他用匈牙利民间音乐旋律创作了大量乐曲,这些作品取材于匈牙利的历史事件和民族英雄,

具有浓郁的匈牙利风格。如《纪念裴多菲》、《匈牙利英雄进行曲》、《拉科奇进行曲》、《急行军进行曲》、《匈牙利颂歌》、《匈牙利国王之歌》等。

这一时期，李斯特还完成了“交响诗”这种崭新的音乐体裁的创造。这是一种含有“诗的内容”的管弦乐作品。他以诗歌、戏剧、绘画及历史事迹为题材，广泛采用主题变幻的手法，塑造出表现特定标题内容的艺术形象。这种以文字或题目来阐明作品思想内容的器乐曲，就是一般所说的“标题音乐”。李斯特创作的交响诗《塔索》、《匈牙利》、《前奏曲》是他一生的杰作，又是近代标题音乐的名作。

李斯特晚年时，回到祖国匈牙利，创办了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担任院长，为匈牙利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才。由于个人生活不如意，他后来出家当了修士，热心于宗教。

1886年，年迈的李斯特在赴德国参加纪念德国大音乐家瓦格纳的庆祝活动途中，因患肺炎去世，终年75岁。

幸福王国

1844年，一个自称“巴布”的年轻伊斯兰教徒，在伊朗各地广为传教。他用宗教的语言给人们勾画出一幅“正义王国”的美好蓝图。在这个王国里，人人平等，没有欺压，大家都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巴布”在阿拉伯语中是“门”的意思，表示救世主马赫迪的意志，将通过此门传达给人民，把人们引入美好的境界。

巴布的真名叫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出生在伊朗设拉子市的一个棉布商家中。成人后，曾在一个小镇上独立经商五年。1843年，他所在教派的首领去世，未指定继承人，于是他在第二年自称“巴布”，同他的门徒一起到各地去传播他的新教义。

巴布的宣传很能打动穷苦百姓的心，迎合了他们改变现实不平等生活的期望，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伊朗人，形成了巴布教。三年后，巴布进一步自称本人就是先知马赫迪，信徒们的热情更高了，教徒很快遍布全国，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伊朗政府感到十分恐慌，急急忙忙地逮捕了巴布，并开始缉捕巴布教徒，这就埋下了武装起义的导火线。

巴布教徒面对官府的缉捕，开始深入群众，扎根到城乡的广大贫民当中。他们向广大农民宣称，新光知即将降临，陈旧的教典都已失效，所以人民没有必要再向统治者纳税服役。巴布教的传教活动，吓坏了统治当局，伊朗政府急忙调动军队，驱赶别达什镇的教徒。巴布教徒迅速转移，奔赴各地。

1848年9月，伊朗国王死去，巴布教徒决定利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时机，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年10月，700名巴布教徒发动武装起义，在打败当地驻军后，转移到伊朗北部的塔别尔西陵墓。

按照伊朗的古老传统，塔别尔西陵墓是一块禁地，即使里面藏有犯人，也不能加以逮捕。巴布教徒在陵墓区驻扎后，就开始建立自己的“幸福王国”。他们修筑了一个八角形的城堡，每个角都有一个砖砌的塔楼，城堡周围挖了一条很深的濠沟。城墙与濠沟之间布置了许多陷阱。城堡内部修筑了许多木房，供教徒居住。聚集在城堡的教徒，实行资财公有，平均享用，实行共餐制。消息一传开，陵墓附近的农夫扶老携幼，带着粮食和牲畜，纷纷前来加入“王国”。一些寻求幸福的人，更是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起义队伍很快增加到2000人。

伊朗国王下令军队进行镇压。但地方军队根本不是起义军的对手，几次进攻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国王只好让王叔马赫迪·古里率领王军，亲自前来指挥进攻。

这一天，起义军得知已有部分王军进驻陵墓附近的阿弗拿村，就决定夜袭敌军。当天深夜，正当疲倦的王军官兵进入梦乡时，起义军首领侯赛因带领一个小分队，悄悄潜入阿弗拿村。突然一声呐喊，杀向睡梦中的王军。当场杀死王军官兵100余人。

王军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廷大为震惊。王叔亲率8000人的大军星夜赶往陵墓。不想营地再遭夜袭，两个王子被活活烧死。国王再次派出重兵，将塔别尔西陵墓团团围住，随后用大炮猛轰。起义军虽数次发起突袭，但处境越来越困难。几个月后，城堡里只剩下250人，粮食、弹药已基本断绝。但他们仍在奋勇抵抗。

1849年5月，王叔手捧《古兰经》，对城堡里的巴布教徒大声发誓：“虔

诚的教徒们，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离开城堡，你们的生命和自由一定会有保障！”但当起义者放下武器，走出城堡时，他们立即撕下面具，恶狠狠地高喊：“真主已经下了命令，要惩罚这伙伊斯兰的叛逆！”话音未落，一群刽子手冲上来，砍下了每一个起义者的头颅。霎时尸横遍野，血染大地，城堡被摧毁了，塔别尔西陵墓的战斗，被淹没在血泊中，“幸福王国”终于演成一幕壮烈的悲剧。

1850年7月，伊朗国王下令杀死巴布。临刑这天，大群官兵守卫着广场，周围站满了群众，当巴布带着镣铐押进广场时，人群中发出了低低的哭泣声。枪响后，浓烟冒起，人们定睛看去，不禁惊呆了，巴布不见了，顿时人群骚动，祈祷、欢呼声响成一片。原来行刑者只打断了悬吊巴布的绳子，巴布趁机逃到附近的平房里，行刑队马上搜捕，巴布终于被杀害了。然而正像广场上的哭泣声、祈祷声和欢呼声所显示的那样，巴布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永远不能磨灭。

马克思与海涅

1845年初，法国政府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请求，命令马克思限期离境。在离开巴黎前夕，马克思在给诗人海涅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跟海涅的别离对我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块儿带走。”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海涅之间存在的真挚和深厚的友谊。

亨利希·海涅，这位德国的伟大诗人，1797年12月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终年忙于商店生意，聪明能干的母亲则特别小心谨慎，她不喜欢诗歌，不许海涅看小说。有时女仆给海涅讲些神鬼故事，母亲知道后也要大加责备。

少年时代，给海涅印象最深的是拿破仑，他从小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拿破仑，很早就向往着法国的自由精神。由于崇拜拿破仑，因而对于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异常痛恨。1811年，拿破仑途经杜塞尔多夫，海涅挤在人群里，久久的注视着这位横扫欧洲的无敌英雄，心中暗暗赞颂着他。

海涅中学毕业后，根据父母的意见，到法兰克福的一家商店当学徒。第二年，他在富有的伯父赞助下，到汉堡开了一家商店，可海涅对经商不感兴趣，不久商店就倒闭了。

1819年，22岁的海涅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在大学期间，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华逐渐显露，除了规定的法学课程外，他旁听了德国文学、德国语言、历史及考古学等课程，每当有所感受，他就写成诗，并向人请教，再反复修改。他认为，诗歌就应该像一个真正自由的德国女孩，精神焕发，不能矫揉造作，无论如何，不能把诗弄成苍白的尼姑或夸耀门第的小姐。

海涅的创作始于抒情诗歌，1827年，他把自己10余年来的诗作汇集成册，定名为《歌集》出版，受到读者欢迎，其中许多诗篇被音乐家谱成了歌曲。这本《歌集》在海涅生前13次再版，他因此成为德国著名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

1824年至1828年，海涅根据自己旅行所得，先后出版了四部著名的散文游记：《哈尔茨山游记》、《观念——勒·格朗特文集》、《英国片断》以及关于意大利的记载。海涅把抒情与论辩结合起来，把神话与传说融汇于诗情画意之中，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巧妙地结合，获得了很大成功。

海涅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社会的歧视，他因此更加深切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即使在小有名气后，他仍然关心革命，向往自由。1830年，法国爆发了七月革命，正在北海养病的海涅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他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法国革命的发展，并挥笔写出了革命颂歌：

我是剑，我是火焰，
黑暗里我照耀着你们，
战斗开始时，
我奋勇当先，
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海涅向往着革命的法国。为了“呼吸新鲜空气”，1831年4月，他从汉堡动身，前往巴黎，并从此永远在巴黎定居。他不断给德国报纸写去通讯，报导法国革命的消息。同时也将德国文化介绍给法国。海涅的到来，受到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肖邦等人的欢迎。但他激烈的言论，引起普鲁士当

局的仇恨，他的作品被禁止在他的德国故乡发行。

结识马克思是海涅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它使海涅的思想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飞跃。1843年10月，马克思受到普鲁士当局的迫害，侨居巴黎。同年12月，46岁的海涅和25岁的马克思相识，并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段时间，海涅天天和马克思夫妇见面，向他们朗读自己的诗作，倾听他们的意见。正是由于马克思的帮助，海涅创作出了他最好的政治诗歌，如《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恩格斯在读过这首诗后，兴奋地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1843年10月，海涅在流亡13年后，第一次回德国探望病中的母亲。他根据这次旅行所得，写出了他一生中的创作之冠：《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他看到祖国黑暗如故，心中充满了忧虑，但是并不悲观。他满怀信心地提出了革命的理想：

我们要在地上幸福生活，
我们再也不要挨饿；
绝不让懒肚皮消耗
双手勤劳的成果。

马克思很重视海涅的这部长诗，亲自把它送到法国《前进报》发表。同海涅的其它作品一样，这首长诗出版后，在德国立即遭到查禁。

海涅的晚年是在悲惨的境况中度过的。他年轻时就经常患病。1845年后病情恶化。1848年，马克思回国创办《新莱茵报》，曾约请海涅参加，但他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这一年起，直到去世，海涅整整有八年时间瘫痪在床上，双目几乎失明。

但是，这个“革命的好鼓手”并没有因病停止战斗。他在“床褥坟墓”中，仍以顽强的毅力，用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出大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

这个坚强的战士，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充满了感情。他在逝世前几年，曾经这样称颂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无疑地是德国最能干的头脑，毅力最充沛的人物。这两个革命博士和他们果敢坚决的学生们都是德国独特的男子，他们据有生活，未来属于他们！”

1856年2月，海涅在顽强地坚持了八年之后，终于告别

印在英镑上的护士

凡是见过英国 10 英镑钞票的人都知道，这种钞票的正面印有英国女王的头像，背面印的则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肖像。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也是开创当代护理事业的先驱。

弗·南丁格尔是英格兰人，生于 1820 年，家庭很富有，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她优雅俊美，勤奋好学，才智出众，父母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上流社会的名媛。可是她对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产生过厌倦，渴望做些有价值的事情。她有一个美好的心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产生了解除他人痛苦的崇高理想。一旦选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她就献出自己的青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845 年弗·南丁格尔 25 岁，这年秋天，英国一些农村流行瘟疫，她不顾父母的阻拦，积极地投入了护理病人的工作。这项工作结束以后，她向父母正式提出要到护理训练班学习，当一名护士。

她的这项决定，使她的父母大吃一惊。当时护士的社会地位很低，在医院干这类工作的是找不到生活出路的妇女，她们成天跟污秽的东西打交道，为人所不齿。一个道地的名门闺秀，竟然想去当一个护士，她的母亲简直气得发疯，大发雷霆，认为这有损家族的声誉。可是南丁格尔忘不了医院里那些痛苦的病人。在她的心目中，做护理工作，救死扶伤，是高尚的、纯洁的，“生活的意义在于为那些陷入痛苦中的人们做更多的事情。”一时进不了护理训练班，她就专心读书，钻研医院报告和政府编印的关于互生医疗事业的蓝皮书，写下了大量的笔记。有一次，她借旅游之便，冲破阻力，在德国一所医院中找到学习护理工作的机会，在那里呆了几周。回来后她对父母说，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十分愉快。以后几年她离开家庭，在一家私人开设的诊所里做“监护”，从事她为之倾心的护理工作，并显示出了才能。

1853 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和土耳其联军与沙皇俄国军队交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英国政府号召妇女们到战地医院进行救护，并任命南丁格尔为“驻土耳其英军总医院护理监督”，由她率领 38 名招募来的青年妇女组成的护士队，奔赴土耳其斯库台的战地医院。这所医院是由军营改建的，污垢遍地，破旧不堪，到处睡满了伤病员；没有被褥，缺乏床位，许多人赤身露体躺在泥地上；药品、食品奇缺，冬天来临，每天都有大批伤病员死去。当南丁格尔满怀热情地到达时，医生对她疑虑重重，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种种冷遇。她不理睬这些，日以继夜地带领护士们给伤员缠绷带，进食喂药；她组织人整顿医院，修建排水道。她以个人声望募集到了一大笔钱，实际上负责整个医院的给养，从刀叉、副食品，到手术台、剪刀，一应俱全。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战地医院面貌一新。医院当局也慢慢地十分器重这位英格兰小姐。

前线战斗越来越激烈，大批伤员涌进医院，病床严重饱和。南丁格尔拿出了自己的积蓄，雇人新造厂两排病房。当一批又一批伤员到达时，她和护士们准备了干净的被褥和热菜热汤，伤员们流着眼泪感激地说：“我们简直到了天堂！”医院的病房干干净净，食品、药品充足，加上精心的护理，伤病员的死亡率很快由原来的 50% 下降到 2.2%，她的业绩传遍了前线各个战场。

南丁格尔对待伤病员非常和蔼，体贴入微，重病人常常由她亲自护理。在那些垂危病人的床前，常常能见到她瘦弱的身影在俯身照料和安慰这些不

幸的人，而且一直守候到病人临终。军人们对她非常尊敬，一个士兵写道：

“见到她从眼前走过，心中都会感到舒畅。她会向你问候，同时又对更多的伤兵点头、微笑；当然，我们成百上千个人躺在那里，她不可能都照料到。只要目送她从你眼前走过，甚至亲吻她的影子，再躺下去也会感到心满意足。”

除参加手术和护理工作外，她还经常在夜间手持油灯，巡视伤病员，直到深夜。因此，伤病员们又“亲昵地称呼她为“光明天使”。南丁格尔成名以后，她的母亲曾热泪盈眶地对丈夫说：“我们仿佛是水鸭子，而她，却是我们孵出来的天鹅。”

1856年战争结束了，南丁格尔是最后一个离开战地医院的。英国政府和全国军民筹办盛大仪式，准备欢庆她的功绩，而她却身穿便服，头蒙黑纱，从后门溜回了她的家。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她的身体垮了。于是她就致力于办学和著书立说。

1860年她终于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近代护士学校，开设严格训练的课程，使一批批护士在这里受到良好的教育，树立起良好的护士道德风范，为科学的护理事业打下了基础，并使护理学成为医学的一门正规学科，她写的《护士札记》是医院建设最早的著作之一，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

南丁格尔美丽、富有、机智聪颖、博学多才，为了献身给大多数民众的福利事业，终生未婚，毅然摒弃了维多利亚女皇时代显赫的社会地位，因而受到人们的极大尊敬。

南丁格尔自幼身体羸弱。战争期间连续过度的劳累，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她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的。由于健康的原因，也是为了摆脱社交活动的干扰，她长期深居简出，过着近于隐居的生活。尽管如此，英国和世界各地的仰慕者仍络绎不绝地到她的寓所造访。这位慈祥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安乐椅上，总是尽量给予来访者以支持和指导。

南丁格尔晚年视力逐渐减退。从1901年起，双目完全失明。1910年8月13日，她以90岁高龄，在安睡中离开了人世。英国政府本来计划把她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墓园中，以表彰她的功绩。后来还是尊重她的遗愿而改变了决定。南丁格尔的灵柩在六名英国军士的护送下，被运往故乡汉普郡郊区她的家庭墓地，落葬在她的父母墓旁。墓碑上只简单地镌刻着：“F·N·1820年生，1910年。”

现在，每年5月12日的“国际护士节”，全世界的护士都会想起弗·南丁格尔，因为这个节日就是以她的生日确定的。

信鸽与火车的比赛

在当今世界各大通讯社中，英国的路透社是资格最老的通讯社之一。它素以快速的新闻报道和新闻稿被世界各地报刊广为采用而闻名。说起路透社的发迹史，还真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故事。

19世纪30年代电报的问世，给新闻通讯事业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批新闻社。英籍德国人朱利亚斯·路透于，1851年在伦敦创设的路透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816年，路透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大家庭。13岁时，他在叔父开办的银行里当职员时，结识了正在从事电报实验的科学家高斯，对电报的功用很感兴趣。1848年，他在柏林经营的书店，因出售政治方面的禁书而被迫停业。路透离开柏林，来到巴黎的哈瓦斯通讯社工作。不久，他和妻子自办了一个小报馆，把法国报纸上的新闻剪辑起来，译成德文后寄给德国报馆。由于资金很少，他们不得不把卧室兼作办公室，报馆办得并不成功。

1849年10月，意外的机会降临了。德国邮局允许民众使用政府在柏林和亚琛之间新设立的电报线路。路透闻讯后，立即赶往亚琛，在那里设了一个通讯社，最初只是向亚琛的商人们通报有关柏林市场的最新行情。半年后，巴黎至布鲁塞尔的电报线路也开放了。但亚琛至布鲁塞尔之间还没有电报线路，两地相距几百公里，为得不乘上几个小时的火车来传递新闻稿。路透找到了一个绝妙的与火车邮递竞争的办法。他租用了40只经过特殊训练的信鸽，开始办理通讯鸽邮递业务。这些信鸽沿途不停，连续飞行，且安全可靠，速度比火车邮寄大为提高。通讯鸽业务为路透赢得了声誉，它一直开办到亚琛至布鲁塞尔之间的电报线路接通为止。

1851年，英国政府开始在英吉利海峡铺设电缆，准备接通与欧洲各人城市的电报联系。路透马上迁居伦敦，并加入英国籍。在海底电报线路接通前一个月，他成立了路透通讯社。最初，路透通讯社只限于向交易所、银行、股票商等发送欧洲大陆的金融快讯，并以此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但路透并不满足，他想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直到能够最快的向各家报纸出售各种时事新闻。

可是，事情办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像《泰晤士报》这样的大报，当时在国外都驻有自己的特派记者，业务自成体系，根本看不起这小小的路透社。路透没有气馁，他知道能否以最短的时间得到准确的新闻，是新闻通讯社生存的前提。于是，他挑选精明强干的记者派往国外，并指示他们，在各类消息中，时事新闻优先向回发送。如果线路不通，可使用信鸽尽快将消息送回。

1854年英俄克里米亚战争中，路透社又开始采集传递军事新闻。1858年，路透社记者最早向英国发回了拿破仑三世讲演稿的独家新闻，使路透社令人刮目相看。从此，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英国各家大报开始经常采用路透社提供的各类新闻稿。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欧洲各大报刊和通讯社，竞相向美国派驻记者，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新闻角逐。

由于铺设在大西洋底的电缆线路遭到破坏，各国记者只能通过定期邮船往回发送消息。每逢邮船到达英国南安浦敦码头的日子，英国各报社的接船人早已焦急地等在那里，只要远远地看到邮船，记者们立即跳上快艇迎上去，接过从邮船上扔下来的新闻稿盒后立即上岸，抢着往伦敦电传南北战争的最

新消息。

在这场比赛速度的新闻战中，路透社的消息总是抢在前头。受到一家新闻社在爱尔兰海南拦截美国邮船，把新闻稿从爱尔兰科克港直接电传伦敦的启发，路透派人在科克港以西 90 英里的一个小码头，秘密铺设了自己的电缆。路透社的记者在码头附近接过邮船上的新闻稿后，直接电传伦敦。这样，就使路透社比其它各报提前八个小时报道美国内战的消息。

1865 年，驻纽约的一位路透社记者，在邮船离港后不久，获悉美国总统林肯遇刺的“爆炸性”消息。他立即跳上一艘快艇追赶邮船。当他在公海上追上邮船时，这位记者把新闻稿钉在一块木板上，奋力扔上邮船。他的这一“壮举”，使路透社比美国官方提前两天公布了这个惊人的消息。

当然，路透社为了抢先发送消息，也不免闹出过一些笑话。那时发送一封电报费用十分昂贵，路透要求手下的记者尽量做到言简意赅。这样，有时一二个字母拼错或译错，就会使整条新闻面目全非。

一次，一条关于澳大利亚第一条铁路破土动工，总督亲自为工程奠基的电文发回伦敦。原文是：“女王领地澳总督挖了(TURNS)第一锹土(SOD)。”但收到的电文却是：“女王领地澳总督一胎双胞胎(TWINS)，首胎为子(SON)。”英国各报照登不误，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总督那时尚未结婚！

1865 年，路透将通讯社扩展为一家大公司，自己提任首席经理。他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钱在北海底部相继铺设了三条电缆，以扩展业务，终端通达德国的诺尔顿，把通向俄国、中东的电报线路连接起来。后来又进一步沟通了印度和锡兰的线路，并在印度的孟买和锡兰的科伦坡开设了新的分支机构。随着电报线路向世界各地逐步延伸，路透社的记者尾随而至。很快，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了路透社记者的足迹。

1871 年，英国女王授予路透男爵封号。

1878 年，路透退休，由他的儿子接任经理职务。

1899 年，路透去世，终年 83 岁。

到 20 世纪中叶，路透社已发展为一个新闻业托拉斯。它的总社设在伦敦，在 180 余个国家和地区驻有成千名记者。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在德国特里尔城的布吕肯大街上，有一幢普通的楼房，淡黄色的粉墙，棕色的门棚和窗沿，四周种满了鲜红色的玫瑰花。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就诞生在这里。

马克思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父亲在当地做律师。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个“富裕的文明的，但不是革命的”家庭。马克思在特里尔生活到17岁，直到1835年中学毕业。他的毕业作文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少年时代马克思服务全人类的凌云壮志：“如果人只是为了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决不能成为真正的完人和伟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这篇作文得到了主考老师“思想丰富，理解深刻”的最高评语。

同年，马克思前往波恩大学学习法律。一年后，他又转入了柏林大学。来到柏林后，他强烈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密切关注着德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在大学期间，他结识了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参加了这个主张有神论和革命的组织。1841年初，马克思在毕业论文中借用古希腊哲学家的诗句：“不畏神威，不畏闪电，也不怕天空的惊雷”，来表达自己所要选择的生活道路。这篇论文经耶拿大学哲学系决定，他不必答辩就可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这时他仅22岁。

不久，马克思给一家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第一篇政治性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逐条驳斥了新检查令，揭露了普鲁士政府的虚伪和反动。书报检查官扣压了这篇充满战斗性的檄文，但这却标志着24岁的马克思，勇敢地投入了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1842年10月，马克思应聘担任了科隆《莱茵报》的主编。这家由莱茵自由资产阶级创办的反对派报纸，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办得生气勃勃，面目一新。订户从800份猛增至3000多份。零售数更是直线上升。马克思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抨击普鲁士政府的文章，揭露了广大农民的悲惨处境。

普鲁士政府十分恼怒，政府官吏先是对《莱茵报》实行双重检查，后又要求该报每天在付印前须送行政区官员“审定”，在仍无法阻止该报散发革命言论的情况下，普鲁士官吏气势汹汹地用查封报纸来威胁该报的股东。唯恐失去财源的股东们哀求当局宽恕，并要马克思改变调子。马克思怒不可遏，断然辞去了报纸主编的职务。

1843年深秋，马克思同等待了他七年的未婚妻燕妮结婚。婚后，他们一起到欧洲革命的心脏——巴黎。马克思很快投入了沸腾的斗争生活，同流亡巴黎的各国秘密工人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844年2月，马克思和黑格尔左派分子卢格合办了激进派杂志《德法年鉴》。普鲁士专制政府一听到马克思的名字，马上以该刊犯有“预谋叛国和侮辱国王”的大罪，下令在各边境口岸予以堵截。大批军警在莱茵河的航船上和德法边境的许多通道是，搜出了几百本《德法年鉴》，一概加以没收，使这个新刊物的发行困难重重。不久，马克思与卢格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因而这个刊物只出民一期就停刊了。

但是，《德法年鉴》仍为革命播下了星星之火。马克思在这一期刊物是，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进一步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指出革命理论必须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在消灭剥削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马克思明确指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织工举行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马克思高度赞扬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和革命精神，热情称颂工人们在自己的斗争中，始终能够把矛头指向剥削制度，反对私有制的社会。

马克思在法国的革命活动，使得普鲁士统治阶级日益感到恐惧。他们把马克思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用尽一切卑鄙手段对他进行迫害。普鲁士政府在以马克思的著作有害社会为山，命令普法边境上的警察机关，只要马克思在国境线上一出现，就将他逮捕。同时不断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驱逐或引渡马克思。法国内阁终于在1845年1月中旬，要求马克思离开法国。

1845年2月，马克思全家来到布鲁塞尔。比利时当局非常不愿接受革命流亡者的避难。为此，布鲁塞尔警察局要求马克思保证，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这也就剥夺了他获得任何直接收入的来源。

普鲁士当局这时仍不甘心，要求比利时当局引渡马克思。在马克思针锋相对的斗争下，这个企图遭到可耻的失败。

即使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马克思继续坚持研究政治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他把为无产阶级制定改造现存制度的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1841年，马克思在大学毕业论文中，曾表达了要用哲学改造世界的决心。他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中，替人类窃取火种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他满怀激情地在论文中引用了普罗米修斯的豪言壮语：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
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愿被缚住在崖石山，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四年后在比利时，这位壮志凌云的青年，终于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战士。

回旧祖国的心脏

1822年的一天，波兰首都华沙的一家报纸，用醒目的大字刊出这样一段话：“上帝把莫扎特赐给了德奥人，把肖邦却赐给了波兰人。”如同60年前6岁的音乐“神童”莫扎特曾轰动过欧洲一样，此时，12岁的肖邦轰动了波兰。这个容貌清秀、性格文静的少年，以他精湛的琴艺，使整个波兰为之倾倒。

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年出生于华沙一教师家庭。父亲尼克拉·肖邦是个法国人，侨居波兰多年，在华沙的一所寄宿学校中教授法文。肖邦的母亲是波兰人。

肖邦自幼学习弹钢琴。8岁时在华沙举行了首次公演，获得一致好评，到12岁时，他已经成为波兰全国闻名的小钢琴家了。在他的老师、波兰著名的音乐教育家爱尔斯涅的影响下，少年肖邦对祖国的文化和民间音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虽在华沙上学，但假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乡下亲友家度过的。在波兰民间文化的乳汁抚育下，肖邦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

肖邦生活的年代，正是波兰处于外族占领最黑暗的年代。这个被马克思称为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的国家，从1772年到1795年，三次遭到瓜分。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在沙俄的坚持下，波兰遭到第四次瓜分。名义上存在的“波兰王国”，却由沙皇直接任命的军队总司令和总督治理。在沙皇军队的野蛮统治下，波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

正当波兰处于革命爆发的前夜，肖邦的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决定让20岁的肖邦出国举行旅行演出，因为这似乎已经成为欧洲音乐家成名的必由之路。

1830年11月2日，在萧瑟的深秋景象中，肖邦的父亲在华沙为肖邦举行了告别音乐会。音乐会十分成功，当大厅里还回响着掌声时，后台已涌进了祝贺的人群。老师爱尔斯涅送给他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一只盛满祖国泥土的银杯，恳切地希望肖邦不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只银杯带在身旁，绝不能把祖国遗忘。肖邦激动地接过了银杯，含着热泪离开了故土。

同年12月初，肖邦到达维也纳刚刚一个星期，就传来了波兰人民发动华沙起义的消息。陪同他前来维也纳的朋友决定回国参加起义。临别前，朋友劝说肖邦不要与他同行，因为瘦弱的肖邦不适合参军，应当拿起艺术的武器，在国外为祖国服务。肖邦虽然听从了朋友的劝告，但内心的爱国情感仍使他焦灼不安。他在给老师爱尔斯涅的信中写道：“我从得到华沙起义的消息那大起，直到现在，除了提忧和挂念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觉……”“作为一个艺术家——还在摇篮里，而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已度过了二十多个年头……。”

1831年9月，肖邦在斯图加特听到了华沙陷落，起义失败的消息。他以悲愤的心情写下著名的《革命练习曲》和《d小调前奏曲》，表达了对自由波兰深深的感情。

华沙起义失败后，肖邦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从父亲的意见，保留俄国“国籍”，请求延长俄国签发的护照，这比今后还可以回国，当一名为统治者欣赏的音乐家；另一种则是放弃俄国国籍，这就意味着永远离开波兰，当一名流落他乡的流亡者。肖邦毅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宁愿当一名流亡者，而个愿向俄国统治者低头。

1831年9月，肖邦来到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虽然他与上层社会交往，经常出入当时盛极一时的沙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亡国之痛。他在写给法国艺术部长的信中，自称是：“一个不堪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的……波兰人。”

肖邦把自己对祖国的感情，倾注在音乐创作之中。他一生创作了58首《玛祖卡》舞曲和19首《波兰舞曲》，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充满着浓厚的波兰乡土气息。

来到巴黎的第二年，22岁的肖邦首次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以杰出的音乐修养、自然优雅的风度，很快成为巴黎社交界令人注目的人物。贵族伯爵们竞相请他去赴宴，去演奏，他的玛祖卡舞曲也一首首地被出版商们拿去出版，《音乐杂志》上越来越多地出现肖邦的名字。欧洲各国的音乐迷们，日益频繁地重复着年轻的德国作曲家舒曼赞扬肖邦的名言：“脱帽吧，先生们！这就是天才！”肖邦的作品在德国几周内就被销售一空。

在滚滚而来的一片赞扬声中，肖邦并没有被冲昏了头脑。他很快厌倦了灯红酒绿的巴黎上层社会生活，很少再举行公开演出。只有在同流亡在巴黎的波兰同胞聚会时，他才感到欣慰和快活。他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波兰流亡者，为他们举办义演，即使在他健康状况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不放弃这种帮助。

1837年，俄国驻巴黎大使以沙皇宫廷的名义，聘请肖邦担任“俄罗斯沙皇陛下首席钢琴家”，但被肖邦坚决拒绝：“我虽然没有参加1830年的起义……但我的心是同革命者在一起的”

1846年，波兰革命者在克拉科夫举行武装起义，这个消息曾经使得肖邦激动不已，但起义失败了。1848年，波兰境内的革命运动连遭挫折，令人痛心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来，使肖邦心情颓丧，痛苦地把自己称作是：“波兰的孤儿”。同年，他前往英国访问。岛国的环境和气候使肖邦的肺病更加恶化，吐血不止，但他仍然坚持为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举办了一次音乐会。

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爆发后，革命的烈火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躺在病床上的肖邦，望着窗外的火光，听着远处的枪炮声，内心无比激动。他不顾任何人的劝告，坚持去车站为即将回国的同胞送行。心情的激动和过度的劳累，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1849年10月18日傍晚，年仅38岁的“钢琴诗人”肖邦，离开了人世。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朋友们取出18年前从波兰带来的银杯，把杯里的泥土撒在他的棺木上。依照肖邦的遗嘱，他朋友把他的心脏装在一个匣子里，从巴黎运回到波兰，安置在华沙圣十字大教堂内。

智慧的明灯

1842年11月的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普鲁士退役军人，在返回故乡的路上，特意在科隆下车，到莱茵报社去拜访马克思，由于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马克思既冷淡又拘谨地会见了这位陌生的青年。在这位青年热情地表示愿意经常寄送“英国通讯”后，两人就分手了。

然而谁能想到，不过二年的时间，当这两位青年再度会面时，情况却已大不相同，共同的追求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这位德国青年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20年11月28日，恩格斯诞生在普鲁士莱茵省的巴门市。他的父亲是纺织工厂的老板，虔诚地信仰宗教，性情暴躁而又独断专行。母亲性格软弱，心地慈祥。恩格斯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特别表现出了非凡的语言才能。他在中学时就掌握了法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多种外语，成年后，他能以12种语言交谈和写作，并能阅读20种文字。

恩格斯的青年时代非常注意观察周围的世界，很早就关注纺织工人的贫穷和困苦。他常常提出种种疑问，却遭到困循守旧的父亲的训斥。1837年秋天，恩格斯的父亲认为作为长子的恩格斯应该去经商。中学还未毕业的恩格斯只好离开学校，到父亲的营业所工作。17岁的恩格斯对此怨恨不已。但他仍在业余时间坚持刻苦自学，广泛阅读了各种书籍。

1838年8月，恩格斯又被父亲送到不来梅的一家大贸易公司当办事员。不来梅这个大商港的空气比巴门自由了许多，这使恩格斯有机会接触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他密切注视着欧洲的反封建斗争。日益坚定地确立的民主主义观点，与他过去所受过的宗教教育不断发生着矛盾。经历了艰苦的内心斗争，他终于摆脱了旧信仰的负担，公开表明自己从宗教转向哲学，转向科学。

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第一篇政治性论义《乌培河谷来信》，无情地批判了这个黑暗的社会。他在这一年写的一首诗中，还表达了他要冲破家庭和社会藩篱的决心：

一股汹涌的洪流，
呼啸着独自奔出山谷，
松树在它面前轰然倒下，
它就这样给自己冲开一条大道；
我也将和这股山洪一样，
给自己开辟一条道路。

1841年，恩格斯应征到柏林炮兵旅去服兵役。由于他悉心钻研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很快就成了一名好炮手。当时，柏林大学是普鲁士的教育中心，恩格斯一有空就去柏林大学旁听。在那里，他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人，并积极参加了他们的一场哲学论战。

当时，普鲁士政府为了加强对思想和舆论的控制，不断解聘进步学者，同时将一些思想顽固保守的教授推上讲台。昏庸老朽的哲学家谢林来到柏林大学任教授。针对谢林宣称“神是世界是高予一切的力量”，散布要把宗教和科学调和起来的谬论，21岁的恩格斯先后写了《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等三篇文章，把这个庞然大物驳得体无完肤。那时很少有人知道，敢于向这位“哲学权威”挑战的，竟是一个志愿兵炮手身份的旁听生。

1842年9月，恩格斯服役期满。他在科隆与马克思第一次见面后，回到家乡。父亲马上派他到英国曼彻斯特一家纱厂担任总助理。恩格斯正想去考察蓬勃兴起的英国宪章运动，便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把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形式予以公布，经几百万工人签名，要求议会通过这个宪章，使每个工人都有选举权。恩格斯很快参加了这场斗争，几乎每个晚上都去访问工人，参加“宪章派”的会议。有一位爱尔兰青年女工玛丽·白恩士，常常陪恩格斯到工厂和工人住处去访，她后来成了恩格斯的战友和伴侣。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考察了英国的许多城市，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著作和官方文件。他热情支持英同宪章运动，和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寄给《德法年鉴》的主编马克思。马克思看到与自己的观点非常接近，就刊登了出来。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双刊号的目录上，第一次并排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名字。个久，恩格斯又整理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他的结论是：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在书中引用了一首战斗的诗篇，期望用火热的激情，点燃了工人斗争的火种：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家时路过巴黎，又一次专程去拜访了马克思。

这一次他们两位见面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当马克思寓所的门铃响过，马克思打开门时，他马上认出了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恩格斯。他们紧紧地握手，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几分钟后，两位思想上的战友便促膝谈起来了，好像一对老朋友。

马克思请恩格斯到雷让斯咖啡馆去喝咖啡，并把法国的工人运动领袖介绍给他。晚上，两人在马克思家彻夜长谈，讨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通过交流思想，他们日益发现在一切基本观点上不谋而合。两人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了同样的科学观点和结论。在相聚的10天里，他们一起商议，并开始合写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荒谬论点的重要著作——《神圣家族》。三个月后，全书写成。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写的书。在书中，他们阐明了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从而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外表非常不相同：恩格斯身材高大挺拔，马克思则矮小粗壮些；恩格斯总是穿着讲究，马克思则不修边幅；恩格斯举止沉着，马克思灵活好动。

他们两人都有独特的工作作风。马克思对事物持批评态度，比较审慎，工作起来也缓慢些，艰辛些，而恩格斯则轻快多了。马克思的思维抽象能力超过恩格斯，而恩格斯的眼光比马克思敏锐，但不够深入。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文风方面都是独树一帜的大师。恩格斯的文字明白晓畅，行文有如清澈见底的一弯流水，马克思的文体却不那么谨严，行文好像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恩格斯待人接物的艺术稍逊于马克思，后者比前

者更善于跟同志们合作。而在私人经济方面，马克思则远远不如恩格斯，后者精明，前者漫不经心。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在一起，是真诚纯洁的心灵和勇敢坚强的性格，共同的革命事业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震动世界的宣言

布鲁塞尔同盟街上有两座相邻的住宅，门上都挂着一块名牌。五号的名牌上写着：“卡尔·马克思”，隔壁的一户名牌上写的是“弗里德里希”。

1847年春季的一天，“的铃！的铃！”五号大门上的门铃急促地响起来，一位从伦敦来的客人正在急切地按着门铃。

门开了，只见一位留着大胡子的青年走了进来。马克思问道；“您是...”

“我叫莫尔，钟表匠”。

“欢迎您，莫尔先生，请进！”

马克思知道，莫尔是“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在欧洲各的工人中都有会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国际工人组织。坐定以后，莫尔打开皮包，郑重地取出一封书信，说道：“这是我们同盟所有领导成员签名的正式委托书，想请您和恩格斯先生为同盟写一个宣言。”

“可是，恩格斯先生现在正在巴黎。”

“是的，我们已经派人到巴黎去请他。我相信，你们两位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请求。”

接着，莫尔诚恳地表示，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经过讨论，承认自己的观点太陈旧了，相信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准备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而兴地站起来，紧握着莫尔的手说：“我和恩格斯一定把宣言写出来。”

同年夏天，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为经济困难未能出席。恩格斯根据事先同马克思商量好的计划，指导了大会的全部工作。大会采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了新的章程，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战斗口号，取代了“人人皆兄弟”这个旧口号。从此，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式诞生了。

为了避免进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是秘密的。同盟一成立，就着手进行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工人教育协会”。同时，又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传阵地。1847年9月，他们又组织了“国际民和协会”。通过这些公开的群众组织，教育和组织工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

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特别注意各国工人干部的培养，把工人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来，使革命队伍不断扩大。

1847年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了这次大会。马克思的到会，给出席大会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代表后来回忆说：

马克思，“二十八岁至三十岁，中等身材，宽肩膀，精力充沛，有一个高而美好的前额，密集而墨亮的头发，目光锐利。他嘴上已带有使他的敌人望而生畏的讽刺表情。他说话很简要，很连贯，有严密的逻辑性。他从来不说多余的字，每一句话都是思想，每一句话都是他论证链索中的必要环节。”

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新的《章程》和制定纲领。在10天的会期中，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都很不一致，如财产的公有能不能一下子就做

到，共产主义能不能很快就大规模实现，革命要不要暴力等。

经过激烈的辩论，绝大多数代表都同意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大会顺利地通过了《章程》，并决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同时把它作为公开文件，向全世界发表。

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投入紧张的工作，通力合作，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宣言》共分为四部分，着重阐述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的。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作者用这种形象的语言作为开始。而在《宣言》结尾，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豪迈的革命气魄，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用德文正式发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广泛开展，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第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光辉的革命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墨西哥英雄六少年

在墨西哥城风景优美的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入口处，竖立着一座十分引人注目的塑像：一个面带稚气的少年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护卫着身边的母亲。塑像后面是六根高大的大理石圆柱。这是墨西哥人民为纪念在墨美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六名少年英雄修建的纪念碑。

1846—1848年是墨西哥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由南方奴隶主控制下的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南方大种植园主的利益，对邻国墨西哥发动了一场以强凌弱的可耻战争。

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许多有志青年从墨西哥各地，来到墨西哥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技能。这所由蒙特尔德将军主持的军事学校，就设在墨西哥城西郊查普尔特佩克森林中的一座古城堡内。

在这批新学员中，有六位英俊少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17岁的胡安德拉巴雷拉，父亲是个将军，他12岁入伍，14岁时被授予炮兵少尉军衔。此时，他是为了“成为一名真正有学问的军官”，主动申请来军校学习的。马尔盖斯、梅尔加尔和德奥卡三人也都是军人的后代，他们从小失去父亲，为了继承父辈的事业，来到军事学校。维森特是骑兵队长的儿子，埃斯库蒂亚是一个孤儿。

他们六人中年龄最小的马尔盖斯才13岁。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也许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人生的意义，但严酷的生活现实已使他们懂得，保卫祖国是自己神圣的责任。德奥卡在入学申请书上写到：“在我们的共和国遭到侵略的时刻，我志愿到军队中服役，希望能在当前对美国的战争中，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1847年3月，美军在攻陷维拉克鲁斯港后，迅速向墨西哥城推进。军校所在的查普尔特佩克要塞担负着保卫首都西大门的重任。军校学员早已开始进行准备，修工事、筑炮台，德拉巴雷拉以中尉身份编入了工兵营。大战日益临近，军校动员年幼的学员和非战斗人员一起撤离，但这六名少年军人都坚决要求留下履行自己的诺言：“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美军向墨西哥城的进军遇到顽强的抵抗。经过休整，美军于1847年9月召再次发动进攻。9月13日凌晨，猛烈的爆炸声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古老的查普尔特佩克森林上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整座要塞被密集的炮火震得颤动起来。7000余名美军分成两路发起强攻。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六名少年军人勇敢地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德拉巴雷拉和战友们一起坚守在森林和公路连接处的炮楼上，这是美军进行攻击的主要目标。在美军的密集炮火下，一批批战友倒下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他将一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人。两个最年幼的小伙伴马尔盖斯和埃斯库蒂亚，奋战在东面的小山脚下，他们毫无惧色，奋力射击，直到周身被子弹打穿为止。三天后，人们发现他们相互依偎着倒在血泊之中。

枪声渐渐稀疏了，古城堡的大门几乎被爱国者的尸体堵塞了。美军冲进城堡，白刃战开始了。墨西哥人用佩剑、刺刀、棍棒与敌人拼杀。梅尔加尔正守卫在了望台下面，同战友一起不停地向敌人射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用刺刀刺死了一个敌人，然后退到房间里继续射击，直到身受重伤不能再射击为止。在另一处楼梯口，维森特被几个敌人团团围住，当敌人看到他这么年幼而义如此勇猛时都惊呆了，就在这一刹那，维森特的刺刀插入了

一个敌人的胸膛。德奥卡从楼房的窗户中跳出，在一幢平顶房的房顶上与敌人遭遇。独自一人与敌人展开搏斗。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忠诚，他用一面战旗裹住满是伤痕的身躯，纵身跳下山崖。三天后才找到他的尸体。

枪声平息了。美军在付出了死伤 862 人的代价后，攻占了查普尔特佩克要塞和墨西哥城。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拥有“英雄少年”的墨西哥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英雄少年”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传遍了墨西哥全国。为了表彰他们的光荣业绩，墨西哥政府在同年 11 月和 12 月，先后授予这六名少年军人以荣誉奖章和十字勋章。

1884 年 3 月，墨西哥军事学校决定，将六名少年军人的名字永远列在军校点名册的最前面，并注上“为保卫祖国而光荣牺牲”的字样，让他们同活着时一样，参加操练和检阅。

1947 年 3 月，根据军事学校副校长普拉塔将军指示，将六位少年军人的遗骨从查普尔特佩克公园中移出，以最隆重的军礼仪式安放在配有白银底座的水晶棺中，陈列在军事学校的大厅内。

穿红衫的英雄

1849年7月1日，罗马共和国制宪会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四面受敌，危在旦夕的形势。只见一位满身血污的将领径直向会场走来。他的衣衫已被刺刀划破了几处，扭曲的指挥刀只有一半能插进刀鞘。人们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欢迎这位刚刚从战场赶来的军事领导人。他就是被马克思称为是“意大利天才”的红衫英雄加里波第。

1807年7月，朱泽培·加里波第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尼斯的一个水手家庭。16岁时，这位青年水手加入了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开始了革命的生涯。根据马志尼的指示，他打入撒丁王国海军，秘密策动海军起义。后因起义计划泄露，被迫流亡到南美洲。在那里，他召募意大利侨民，组织了一支意大利军团，参加南美民族解放斗争达14年之久。军团的士兵头戴阔边帽，身着红衫，所以有“红衫军”之称。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加里波第异常兴奋，马上动身回国组织了志愿军，投入反对奥地利占领军的斗争。他所率领的红衫军骁勇善战，数十次击溃敌军的进攻。革命失败后，加里波第流亡到美国，先在纽约做工，后来在一艘商船上担任船长。

此时，意大利仍分裂为许多小国。北部被奥地利占领，南部两西西里王国受到西班牙波旁家族的控制，中部则归属于罗马教皇，并驻有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在意大利诸国中，只有西部的撒丁王国，仍保持着表面的独立。1852年，精明强干的加富尔出任撒丁王国首相，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的目标，加富尔决定利用法、奥矛盾，收回伦巴底和威尼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重又进入高潮。1858年，加富尔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缔结反奥秘密条约，撒丁王国以割让萨伏依和尼斯，换取法国出兵对奥地利作战。1859年反奥战争爆发。

加里波第这时应加富尔之请，欣然出山，率领一支志愿军队伍，深入伦巴底，先后取得了著名的瓦雷泽和科摩大捷。反奥战争的初步胜利，在意大利半岛引起巨大的震动，中部各邦陆续奋起响应，推翻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实现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面对席卷全意的巨大革命风暴，拿破仑三世害怕起来，担心一旦意大利真正统一后，将成为法国的强劲对手。因此，他背弃诺言，反过来逼迫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媾和。眼看着统一意大利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断送，加里波第愤怒地宣布退出法国、撒丁联军。

拿破仑三世的背叛并未能真正阻止意大利人民的斗争。1860年4月，西西里岛的巴勒莫爆发人民起义。加里波第应邀组成1100人的“红衫军”，分乘两艘轮船，从热那亚港启航，远征西西里，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红衫军”远征。5月11日凌晨，红衫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受到当地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当地起义者的有力配合下，红衫军所向披靡，在攻占巴勒莫城的血战中，创造了“专制制度的两万名卫兵不得不向为数不多的城市居民投降”的奇迹。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整个西西里岛。加里波第接受了西西里“专政者”的称号。红衫军这时也从“千人团”扩充为“万人团”。

全意大利的眼睛都注视着红衫军的远征。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岛的辉煌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意大利人民，革命烽火四起，民心大振。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同年8月，加里波第率部乘胜渡过墨西那海峡，直捣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9月6日，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出逃，加里波第等不到

大部队进城，带了两名军官首先进入那不勒斯，人民倾城而出，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这位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被推举为那不勒斯临时政府的“专政者”。意大利南部的统一基本完成。

加里波第此时本可依靠人民的力量，一鼓作气，自下而上地统一意大利，但在这关键时刻，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他被加富尔玩弄的政治权术所迷惑，表示甘愿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放弃南意“执政者”的称号。1860年11月，撒丁国王和统一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并肩骑马进入那不勒斯，携手在大街上前进。那不勒斯全城轰动，人们怀着幸福和激动的心情，注视着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幕。1861年3月，意大利王国在都灵宣布成立。撒丁国王被宣布为意大利国王。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意大利帮助普鲁士打败奥地利，收回了威尼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意大利趁法军调离罗马教皇国，把“迷信、轻浮、才智浅薄”的末代教皇国君庇护九世赶入梵蒂冈。1871年，罗马被宣布为意大利首都，意大利统一大业至此完成。1882年6月加里波第病逝，终年75岁。

疯狂的澳洲淘金热

1851年5月15日，英属澳洲的《悉尼先驱晨报》刊出了一则消息：一个名叫爱德华·哈格雷大的男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省的巴瑟斯特，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黄金，他已将该地用圣经中的黄金城奥菲尔命名。这条消息一经刊出，10天内就有上千人丢开一切来到奥菲尔。还有更多的人正在赶往奥菲尔的路上。这些人有的乘坐马车，有的推着小车，更多的人靠肩扛背驮，带着简单的工具和铺盖，在原始丛林中缓慢而艰辛地跋涉。

新南威尔士省发现黄金的消息，吸引了附近各省居民的大批迁移。为了阻止人口流亡，维多利亚省不得不以高额悬赏，鼓励在本省探矿。结果不但很快发现了金矿，而且蕴藏量超过了新南威尔士省。不久，昆士兰省、西澳大利亚省都陆续发现了金矿。

一时间，发现金矿几乎成了澳洲每个人同别人交谈时的话题。“澳大利亚河床上布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子，就像雪地上的麦粒一样”，“有人一斧头就砍出了价值4千镑的黄金！”这些传闻像闪电一般，传到了欧洲、美洲和亚洲，挑起了人们的

发财欲望。成千上万来自各个国家的淘金者，卖掉房子，扔下土地，冒着危险飘洋过海，不顾一切地涌向澳大利亚的丛林。

澳洲这片昔日英国流放犯人的地方，很快成为世界的热点地区。在英中，利物浦、默西等港口挤满了开往澳洲的船只。在澳洲，墨尔本港口外等候靠岸的船只，更是桅杆林立，应接不暇。短短10年中，澳大利亚的人口从40万猛增到114.5万，几乎增加了两倍。

然而，并不是每个前往澳洲淘金的人都可以发财。随着黄金不量的迅猛增长，新的问题不断出现。由于各矿区采得的黄金需要汇集到悉尼银行，再转运到欧洲。长距离的运送和沿途茂密的原始森林，给土匪打劫提供了机会。这些土匪大多数是流放到澳洲的囚犯。新南威尔士省当局不得不成立特别护送队，武装押送运金车，从此产生了澳洲历史上有名的黄金护运队。衍生出了无数的惊险故事。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各矿区所在省无不借口澳洲的全部土地属英王，地下的金子也归王室所有，规定每个采金者每月必须预付1镑10先令，以获得许可证，否则不得私自采金。当局为此招募贵族乡绅子弟，武装收取采金税。这些纨绔子弟任意欺凌采金人，四处追捕无照采金者，被称为是“维多利亚的沙皇”。1854年11月，为反对特许证税，尤利卡矿区的2000多名采金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与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最后被镇压。

在澳洲的这场淘金热中，还有5万多名华人来到采金区。他们大多不是永久居民，单身而来，与人无争，由于华工勤奋心细，即使是在白人开采过的废矿和尾矿中，也往往运气不错，这使白人感到嫉妒，终于酿成了几次有名的反华排华事件，使得华工的“黄金梦”大多变成血染史书的“黄金泪”，也给澳洲历史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19世纪中期的澳洲淘金热潮，对于澳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无数采金工人的血泪的基础上，为澳洲带来了文明。正如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所预言折：“黄尔的发现将结束澳大利亚丛林中的野蛮状态，停止流放囚犯，结束那种迫使牧羊人像猴子一样与澳大利亚土著一起生活在荒野上的物质落后状态。”

黄金的大量开发，使得现代交通、通讯手段变得极为必要，从而为澳洲商业贸易的繁荣打下了基础。1854年3月，墨尔本至威廉斯敦之间的电报通讯开通。同年9月，澳洲第一条铁路通车。现代物质文明的光辉，终于划破了千年密封的黑暗。

同样，千万只挖掘黄金的铁铲，也动摇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观念。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一个贵族老爷赏给路边一位采金人1个先令，叫他自己搬运行李。这位采金人打量了贵族一下，然后把脚放在树桩上说：“你给我系上鞋带，我给你5先令。”平民经济地位的提高，带来了政治上平等的要求。

淘金热潮最终还推动了澳大利亚朝着独立国家发展的进程。1851年8月9日，《人民倡导者》报刊出文章，指出：“金矿包含着一切未来伟大的因素——未来独立国家的因素，我们要成为一个民族自治的国家，不做遥远国家的属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斗争，澳大利亚联邦终于在1901年1月1日宣告成立，英国对澳洲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史从此结束。

未完成的《死魂灵》

1852年初春，在莫斯科的一幢寓所中，一位患病的中年作家，正从病床上挣扎着爬起米。只见他拿出厚厚的一叠手稿，扔进了壁炉。他凝视着熊熊的火焰把稿纸烧成灰烬，流露出沉痛和决绝的神情。10天以后，这位作家满怀着悲愤和失望，在贫穷和忧愁中死去。

他就是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俄国农奴制无情的揭露者果戈里。他烧掉的手稿，就是著名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的第二部。我们现在看到的《死魂灵》中文译本，是鲁迅先生翻译的，其中第二部只有几章残稿，就是这个缘故。

1809年3月20日，尼克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地主家庭。受到喜爱戏剧的父亲影响，果戈里从中学时代起就显露出文学才能。1825年，震动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也给青年时代的果戈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1828年，他从涅仁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农奴们屈辱无权的悲惨处境，使他感到烦闷和不安。他抱着“为人类服务”的志向来到彼得堡，但到处碰壁，直到第二年才当上个小职员，微薄的薪水连件厚外套都买不起，有时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度日。这段艰苦的生活经历，使果戈里亲身体会了“小人物”的苦难处境。不久，他就辞掉了小职员的差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

1831年，果戈里在一个文学家的家里，认识了他所崇拜的普希金。第一次见面，普希金就喜爱上了这个身材矮小的“小俄罗斯奇才”，经常和他促膝谈心，直到深夜。受到普希金的鼓励，果戈里在这一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1832年春，又出版了该书第二部，从此果戈里开始在文坛上显露头角。

果戈里中学时代曾写过喜剧。一次，普希金给他讲了一段亲身经历：普希金为了创作有关普加乔夫的作品，曾到奥伦堡搜集材料，当地人把他当成了彼得堡派来“私行察访”的钦差大臣，闹出不少笑话。联想到自己所了解的官场生活，果戈里大受启发，不到两个月，就写出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首次上演，即获得惊人的成功。果戈里在剧中对统治阶级的辛辣讽刺，轰动了整个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生气地说：“这叫什么戏，人人都不痛快，而我比谁都更不痛快。”

写了《钦差大臣》之后，果戈里又掉转笔锋，开始着力描写那些穷乡僻壤的地主贵族。他用一枝又泼辣又幽默的笔，画出了一幅俄罗斯农奴制度的百丑图。这幅作品，就是他在1842年出版的《死魂灵》第一部。

《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投机家。为了营利，他到各个地主庄园去收购死去农奴的魂灵，然后再以移民为借口，向政府申请无主的荒地，最后再把得到的土地连同农奴一同押给政府，从中发财。

果戈里在书中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的画廊。这里有每日作着甜梦、内心无比空虚的寄生虫玛尼洛夫；有闭塞、迷信、智能低下、多疑的守财婆科罗皤契加；有专事吹牛撒谎的无赖恶棍罗士特莱夫；有外表像熊般粗暴，内心像狼一样狠毒的梭巴开维支；有家境富裕但过着十分贫苦日子的吝啬老头泼留希金等。通过这一系列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确实已经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

《死魂灵》以俄国的“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这种对于俄国封建农奴制如此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里是第一人。

同《钦差大臣》一样，《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居然叫嚷着要给果戈里戴上镣铐，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充军。

《死魂灵》第一部出版后，果戈里再次动身前往国外治病，整整六年的侨居生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死魂灵》的第二部里，他极力想表现俄国生活的光明面，以唤起人们维持现存社会的热情。但他写了改、改了写，始终觉得不能把自己的构思表达出来。他感到自己的创作力枯竭了，精神上感到极度的痛苦，他写完了《死魂灵》第二部的最后一页，却越看越不满意，痛苦的心情达到了极点。1845年，他把第二部手稿的一部分焚毁，开始重写。

1852年，身患重病的果戈里，对自己几年来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的二稿仍不满意。他终于决定将二稿付之一炬。焚稿10天后，他在极度的思想矛盾和痛苦之中告别了人世。

日本的伏尔泰

1853年的一天，由四艘炮舰纵成的美国黑船舰队，在柏利少将的率领下，强行闯入日本的浦贺港，要求同幕府将军就开港进行谈判。柏利声言，如不同意，“立即交战，以决定胜负”。长期生活在闭关自守环境中的幕府官员，很少看到这种冒着滚滚黑烟的大型炮舰，惊惶失措之余，只得同意开港。第二年，日本被迫在神奈川签订了开港贸易《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英国、俄国、法国相继闯进来。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强力打开了。日本的封建社会犹如长期密封在棺材中的木乃伊，突然遇到外界的新鲜空气，迅速开始变化。

日本许多有思想的下级武士，看到西洋人的威风，这时也产生了了解世界的想法。同时他们看到平素骄横的幕府官员。在西洋人面前却束手无策，感到异常气愤，因而又萌生了要求变革的思想。

美国施展炮舰外交，迫使日本开港的消息传遍全国后，在日本青年中引起了学习西方炮术的思潮。1854年2月，一个19岁的青年跟随哥哥来到长崎，拜炮术专家山本物次郎为师，开始学习西方炮术。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

1835年，福泽谕吉出生在中津浦（今大分县）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丧父。少年时代的福泽一面从事家务劳动，一面学习汉文，阅读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学书籍。1853年，美国军舰迫使日本打开门户后，福泽深感日本要强盛必须向西方学习。他怀着振兴日本的抱负，先后到长崎、大阪、江户等地学习荷兰语和英语，在学习炮术的同时，更多地学习了何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不久，他在江户开办了一所荷兰语学塾。

福泽一直渴望着能到国外参观访问，直接了解西方社会的情况。从1860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的翻译前往美国开始，他曾3次出国，历访英、法、荷、普、俄、美等国。多次出国访问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看到日本与欧美各国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他期望能尽快把西方文明开化之风带回国内。因此，他在出访期间，用点滴节省下来的外汇，购置了大批外文书籍，包括各种辞典、史地、法律及经济著作，回国后再组织学生翻译，其中许多书籍被广泛采用为教科书。

日本被迫开港后，社会上“攘欧论”盛行。福泽因倡导学习西方文明，处处受到传统势力的猛烈攻击。就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福泽仍以极大的胆略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为日本的文明开化事业作出贡献。

从1862年起，福泽连续发表了60多种著作，其中以《西洋事务》、《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最为著名，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西洋事务》一书完全是根据福泽的访问笔记写成的，它详细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向日本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社会的窗户，成为轰动日本全国的畅销书。当时日本朝野凡是谈论西方文明，主张开港的人，案头都有这部著作。

1872年，福泽发表了被称为“明治的圣经”的重要著作《劝学篇》，吹响了日本向近代文明社会进军的号角。在这部著作中，福泽用通俗的语句指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而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敦促国人要多读书，多接触新事物，钻研对社会真正有用的学问。

他认为一国文明事业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立志学问，充实力量。他主张放开眼界，将东西方事物进行比较，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取得真理。

《劝学篇》力排传统思想，宣传功利主义和进取精神，对日本后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和制度，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这本书一出版，人们争相购阅，销量多达 70 余万册，对日本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福泽全面提出了学习西方文明的主张。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他说明了落后必然挨打的道理，“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但是，福泽并不崇洋媚外，他主张日本欧化的出发点，是“想从根本上扭全国人心，以便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这一时期是福泽作为启蒙思想家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其思想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

福泽还是日本近代教育史是私立大学的创始人。1868 年，他创办了“庆应义塾”，后来又不断扩充，建成为日本的第一所西式学校，有了这所宣传文明开化的基地，为日本的维新改革事业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他因此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为了从根本上打破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福泽极力主张通过兴办教育，使日本逐渐走向文明社会，以推进日本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办学宗旨。为此，他强调学校应讲授两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学说。

福泽的许多思想，对日本明治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日本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与福泽谕吉的名字是联在一起的。

明治维新后，福泽的思想逐渐趋向保守，对内主张“官民调和”论，对外则为日本向外扩张开脱，公开宣场“日本肩负文明教师的责任，……应把朝鲜带进文明世界”，鼓吹要把中国和朝鲜“包括到我文明圈之中”，暴露了他的政治局限性。

1901 年 2 月 5 日，福泽谕吉患脑溢血病逝世，终年 68 岁。

荷花与薄饼

1857年，在印度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正当人们为自己的国家沦为英国殖民地整整一个世纪而感到痛苦和彷徨，忽然在印度农村和士兵连队中开始奇妙地传递两样东西：荷花与薄饼。荷花在士兵部队里传递，从一个连队到另一个连队；薄饼在农村里传递，从一个村子传到另一个村子。荷花、薄饼是起义的信号，接到后就表示作好起义准备。起义日期统一在这一年的5月31日。

确定这个日期并到各地进行联络的是一个土邦王的养子，名叫纳那·萨哈卜。英国人取消了他的赡养金，并威胁他，要随时没收他的土邦采邑。这样，他满怀对英国殖民者的仇恨，寻求解放自己国家的道路。然而，英国殖民者的暴行使印度人民忍无可忍，终于促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1857年2月一个闷热的中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达姆达姆村，一个出身高级种姓的士兵，拿着一只铜杯向营房走去，路上一个出身低级种姓的扫地工人向他借杯子喝水，这个士兵表示拒绝，于是扫地的就说：“你的种姓出身现在还有什么可神气的！你们马上都得用嘴去咬牛脂和猪油了。新子弹包裹纸上都涂着这两种东西。”话音未落，这个士兵把铜杯一扔，一口气跑回营房，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整个营房。印度士兵们无不怒火满腔，认为这是英国殖民当局对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们的蓄意侮辱。多年来积压在士兵们胸中的民族仇恨一下子迸发出来，很快掀起了一场反英的民族大起义。

3月29日，一位名叫曼加尔·潘迪的印度士兵，首先借早操检阅之机，号召弟兄们起义，并开枪打死三名英国军官，英国人把他抓起来用绳索绞死。反抗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5月10日，驻扎在米鲁特的第三骑兵连提前起义，数千农民从郊区赶来汇合。第二天清晨，起义军进逼德里，城内人民奋起响应，杀得英军四处逃窜。

起义者在德里组织起自己的政权——行政会议，它由六名军官，四名文官组成。莫卧儿末代皇帝巴哈杜·夏哈被拥为国君，发表文告，号召印度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团结一致，“用鲜血的洪流把印度土地上的英国名字冲洗干净。”德里光复的消息像闪电似的传遍了印度各地。短短几个月，印度北部、中部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燃烧起民族起义的熊熊烈火。

英国殖民当局不甘心失败，惊魂稍定，他们马上进行了疯狂的反扑。总督肯宁从伊朗调来大军，截住开赴中国的侵略军，并招募锡克人和廓尔喀人组成雇佣军，从孟买、加尔各答、旁遮普等地向德里方向进攻。沿途肆意滥杀，甚至将俘获的起义者捆在炮口上轰死，令人发指。

面对英军的疯狂反扑，起义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6月初，英军包围了起义中心德里，但猛攻三个月仍进不了城。9月14日，一股英军终于攻入德里，起义军寸土必争，一条200码长的小巷中堆满了英军的尸体。当英军攻击查摩清真寺时，聚集在那里的几千名穆斯林立即拔出佩刀，扔掉刀鞘，冲向英军。英军用排枪射击，当场打死200余人。穆斯林们怒发冲冠，迎着弹雨猛冲过来，英军来不及上子弹，只得拔刀招架，被杀得节节退却。由于英军源源涌入德里，起义军经过六天的浴血奋战，在击毙了上百名英国军官，二千余名英军士兵后，撤离了德里。

德里陷落后，勒克瑙和章西成了起义中心。1858年3月，英军集中2万兵力和180门大炮攻占勒克瑙，入城后洗劫了两个星期。

自 1858 年 5 月以后，印度民族大起义转入游击战阶段。此时，起义军仍有 20 万人左右，其中以唐蒂亚·托庇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影响最大。唐蒂亚出身平民，参加过德里、勒克瑙、章西等地的保卫战。同年 5 月，他联络章西起义军，出征瓜廖尔城，并在这个城市建立起临时政权。随后，他依靠人民，团结各地起义武装，转战于印度中部的广阔战场上。

英国殖民当局在加紧进行武装镇压的同时，又对起义军施展政治分化的手法。1858 年 11 月，英国女王颁布诏书，许诺不再侵犯印度大小封建主的利益。于是，大小封建主纷纷叛变投敌，并摇身一变，协助英军搜捕起义军领袖。这给起义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859 年 4 月，由于叛徒出卖，唐蒂亚不幸被捕。在他就义那天，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刑场四周的山头上，向自己的民族英雄告别。唐蒂亚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地走上绞架，自己把绞索套在脖子上，为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章西女王巴依

1858年4月，在印度中部的章西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英国殖民军正在和印度起义军激战。一场殊死拼杀后，全城暂时安静下来。一个青年妇女一手执佩刀，登上堡垒，用她那冒火的眼睛注视着全城：一片片倒塌的房屋和躺在血泊中的居民……。这时，身边的人急切地对她说：“女王，英国人已经杀进了南门，我们还是转移吧！”

女王沉思片刻，突然，她大喊一声：“跟我冲！”她带领着最后的1000余名士兵向英军冲了过去，又一场白刃战开始了。但是，这次冲锋因寡不敌众，还是失败了。女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王宫。士兵向她报告，北门的守将和炮长都阵亡了，北门也已失守。

“我要亲手点燃军火库，和这伙强盗同归于尽，和章西城共存亡！”女王坚定地说。

部下们都不赞成她的想法，极力劝她立即突围。女王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大家的意见，决定转移出去继续进行反英斗争。第二天，人们点燃了王宫附近的房屋。大火熊熊而起，把冲进城内的英军挡住了。当天晚上，女王把养子捆在自己的背上，骑着一匹白马，在十几名随从的护卫下，冲出城门，向远处飞奔而去。

这位勇敢的女王就是印度传奇式民族女英雄拉克希米·巴依。

巴依从小性格刚毅，武艺高强，成年后嫁给章西土王，成为土邦王后。然而，土邦的宫廷生活，并没有给巴依留下什么豪华的遗产，带给她的却是国破家亡，土地沦陷。1853年章西土王去世。由于没有亲生儿子，只是收养了一个养子，巴依以养子监护人的身份代行土王职权，被称为“章西女王”。

英国殖民当局早已对章西土邦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章西土王之死，恰恰给他们提供了可乘之机。于是，英国总督以土王无嗣，领土自动丧失为理由，不顾章西女王和章西人民的反对，对章西实行全面吞并。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后，章西人民在女王巴依的率领下，全体动员起来，一齐投入战斗。只见她身着戎装，手持战刀，亲自率领起义军打死了英军在章西的最高指挥官，占领了军火库，恢复了章西土邦的独立，巴依重新登上王位。

章西的独立和复国，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极端仇视。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858年1月，英军调集重兵，由中印度英军总指挥罗斯亲自率领，向章西发动进攻。章西军民早已严阵以待。他们把附近地区的粮食柴草运进城内，或就地烧掉，不给英军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同时在城墙上加筑工事，架设大炮，做好了准备。

同年3月，英军围城后，在城东和城南修筑炮台，准备攻城。两天后的一个清晨，天色刚刚大亮，正当英军准备早餐时，章西起义军的一门大炮突然向英军开火。英军仓惶跑上炮位，开炮还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英军虽具有大炮数量多、口径大的优势，但章西起义军在巴依的坚定指挥下，仍使英军连遭挫败。

激烈的炮战持续了五天，英军虽蒙受惨重伤亡，但城内的起义军消耗也很大，城南的几处堡垒已被击毁，露出大段的缺口，章西城危在旦夕！

怎么办？女王巴依决定派人去向康普尔起义军的领袖唐蒂亚·托庇求援。不料康普尔援军在途中遭遇英军的伏击，不得不向后退，章西城的处境

更加困难了。

4月3日，英军向章西城发起总攻。在叛徒的指引下，英军突破南门，窜入城内，英勇的章西人民在巴依的指挥下，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同英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坚守在高地的500壮士，全部献身在阵地上。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章西。

巴依带领残部冲出重围后，同唐蒂亚·托庇的起义军汇合，进驻瓜廖尔城，准备在这里迎战英军。女王巴依的人马负责镇守该城东门。

1858年6月18日，英军对瓜廖尔城发起总攻击。这一天，章西女王身着男装，纵横驰骋在枪林弹雨之中。英军在打败各路守军后，开始从四面向女王包抄过来。这时，巴依身边只剩两名女将和十几名骑兵，但她仍沉着应战，只见她突然挥起佩刀，勇猛地扑向一个缺口，夺路而走，挡在面前的英军一个个被砍倒，眼看就要把英军甩在身后了，不巧，一条宽宽的沟渠挡住了女王的去路，她新换的坐骑又跳不过去。英军乘机包抄上来，把她团团围住。她一人同英军骑兵拼杀起来。英军依仗人多势众，乱刀一齐向她砍来，一刀正砍中她的头部，顿时血流如注。她仍然挥刀猛杀。又是一刀，砍中了女王的胸口，就在她落马的一刹那间，她用尽全力把那个英国骑兵砍下马去。

女王遇难时，她的一名女随从刚刚冲到女王身边。她把女王扶进一间小茅屋。就在这间小茅屋里，女王巴依停止了

新果戈理的诞生

在俄国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同被誉为两大柱石。然而，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作家是怎样迈出成功之路第一步的吗？

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自幼喜爱文学。1838年，他按父亲的愿望进入工程学校，五年后毕业。但他在工程局工作一年后决定改以写作为生，当一名职业作家。

1845年，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第一部小说《穷人》。生性腼腆的他却没有勇气把书稿投向出版社或杂志社，怕编辑先生不屑理睬。后来还是由他的一位同学，拿去送给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看完书稿，涅克拉索夫被《穷人》中真实动人的描写所深深感动，他迫不及待地 and 这位同学连夜去拜访作者，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睡梦中被惊醒时，涅克拉索夫立即紧紧拥抱了他，两人都兴奋得流出了泪水。

告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立即带着书稿去找誉满全俄的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他一进门就大声喊道：“一个新的果戈理诞生了！”别林斯基看到他这副兴奋的样子，故意开玩笑地说：“自然，现在果戈理会同菌子一样多哩！”

然而，当别林斯基一口气读完《穷人》后，他不但同意涅克拉索夫的看法，而且显得比涅克拉索夫更为激动。他明确表示：“我就是舍弃俄国文学，也支持这篇作品！”并称赞说：“最可惊叹的是：寥寥数语，就使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若是一般作家，怕是写上10页，也未必能写到如此程度。而且作者对于穷人所表示的巨大同情是如何感人啊！作者一定是一位极其贫穷困苦的人！”

别林斯基同样急切地要见作者，并极力主张要在聚会的场合朗读和推荐《穷人》。不久，《穷人》首先在涅克拉索夫主编的《彼得堡文集》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别林斯基在为《穷人》所写的评论中，称赞它是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得到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这两位文坛名人的支持，《穷人》一问世，就受到热烈欢迎，24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顷刻成为享誉俄国文坛的著名作家。

继《穷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发表了《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等中篇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1849年，他因朗读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以及秘密筹备印刷所的罪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被判处死刑。在刑场上即将执行枪决的紧张时刻，沙皇官员忽然宣布改死刑为苦役及充军。28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四年苦役、六年军役。

在西伯利亚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忍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病痛和孤寂的折磨，即使在流放生活结束后，他仍深陷于贫穷、家庭纠纷和癫痫病发作的包围中。痛苦的生活经历，直接反映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有人认为，他本人的遭遇，几乎同他在小说中塑造的任何一个悲剧性人物完全一样。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波侮辱与被损害的》，书中继续了《穷人》中有关“小人物”的主题，成为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不久，

他又发表了小说《死屋手记》，记载了自己对西伯利亚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控诉了苦役制度对犯人在肉体、精神上惨无人道的摧残，揭露了流放制度下苦役生活的黑暗。

1866年出版的《罪与罚》一书，是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两家穷人与两家富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写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后社会转变过程时期彼得堡的生活。

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的《白痴》，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主题，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他又完成了小说《恶魔》和他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大师，尤其擅长揭示反常心理的动机。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震撼人心的描写，是一般作者难于比拟的。他的作品戏剧性强，情节发展迅速，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同时，他还把对弱者的同情融入故事中。他认为，人的灵魂只有通过苦难的磨难才能获得净化。深刻的悲剧性和同情心，成为他作品的显著特征。

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病去世。终年60岁。

苏伊士运河

全长 172.5 公里的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它是当前世界上最具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运水道。它北通地中海，南通红海，沟通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结欧、亚、非三大洲。从欧洲经运河到亚洲的水路，要比绕道好望角缩短 8000 至 10000 公里。在全世界所有的通海运河中，无论在使用国家之众，通过船只之多以及货运量之大等方面，苏伊士运河均名列前茅。然而你可曾想到苏伊士运河苦难的过去，它的历史就是一部浸透着埃及人民血泪的辛酸史。

早在 4000 年前，古埃及法老索斯特立斯就曾在尼罗河支流上开凿过一条运河，后人称之为“法老运河”。到公元前 7 世纪，尼罗河支流被泥砂淤积，法老运河也被堵塞，很快被人们所遗忘。

1798 年，拿破仑率领大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占领了埃及。他雄心勃勃，亲自带了许多工程师去寻找古运河的遗迹，进行实地勘测，准备在这里挖掘一条运河。但是，他的工程师测量出现错误，他们告诉拿破仑说红海的水位要比地中海高出 10 米，开凿运河是不可能的事。不久，拿破仑因急于回国，开凿运河的事随即作罢。英国势力随后打入了埃及。

19 世纪 30 年代后，英法两国都急于想打通地中海至红海的通道。1854 年，曾任法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的勒赛普斯，终于获得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特权。他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组成“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资本为 2 亿法郎。勒赛普斯同埃及政府签订的租让合同规定：运河区租期 99 年，期满后全部归还埃及；埃及政府无偿提供开凿运河所需的土地，并提供劳动力；公司有权免税输入开凿工程所需的机器；埃及可获运河纯利润的 15%。英国最初虽反对法埃两国的租让合同，但因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人民大起义的发生，英国也迫切感到对运河的需要，不久也就予以默认了。

1859 年春，苏伊士运河正式破土动工。数十万埃及劳工开始了在沙漠中进行的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工程。数万人在烈日下干活首先要有饮水，沙漠里哪儿有水？于是，就在开凿运河的同时，开凿一条尼罗河的引水渠，把淡水引来。这条水渠与运河并行，运河开凿到哪里，水渠也就开凿到哪里。这样，实际上是开凿了两条运河。

根据埃及工程师里南特的计划，运河工程主要是开凿一条南北基本垂直的人工河，中间又利用了三个湖泊，可大大节省人工。但是，运河的北段是盐渍地，中段是沙漠，开凿难度很大。即使在南段的湖泊区，因为湖水太浅，要把湖底挖深，难度仍然不小。

运河公司常年雇用着 6 万名埃及劳工。他们使用锄头、铁锹等最简陋的工具，甚至被迫用双手挖掘泥土，用篮子搬运。这些劳工的收入极其微薄，伙食很差，生病又没有医药，处境同 4000 年前埃及人民为法老修筑金字塔时不相上下。过度的劳累和饥饿先后夺去了 12 万埃及民工的生命。苏伊士运河可以说是用埃及劳工的白骨垒成的。

为了开凿运河，埃及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由于无法拿出合同中承担的开凿费用，埃及政府被迫向英法等举债，1863 年外债已达 1600 万英镑。

1869 年 11 月 17 日，经过 10 年的艰苦施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北起地中海的塞得港，内至红海的苏伊士城。由于地中海与红海水位基本

相等，故运河没有设立船闸。河道平均宽度最初为 100 米，深 9 米。后经多次展宽修浚，河道宽度达 160—200 米，平均深度为 15 米，可通行 8 万吨巨轮。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越来越被世人所公认，对于运河管理权的争夺日渐激烈起来。1874 年 11 月，英国利用埃及财政困难，用 400 万英镑的代价，收购了属于埃及的运河公司 44% 的股票。从此，运河经营管理权分归英、法两国共管。1882 年，英军侵入埃及，占领整个运河区，随即把它建成庞大的军事基地，企图独占苏伊士运河。

西方各国对英国的野心一致表示反对。1888 年 10 月，英国被迫同法、德、俄等国签订《君士坦丁堡公约》，“保证一切国家在任何时候对苏伊士运河的自由使用”。这样，英国独占运河的野心没有实现。运河仍由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掌握，总公司设在巴黎。这种由英、法共管运河经营管理权的局面维持了近百年。

直到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下令将“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才回到埃及人民的手中。

约翰·布朗起义

1859年12月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监狱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3000名国民警卫队散布于监狱周围15英里的范围内，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在监狱里，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正在写下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罪恶深重的国家中的滔天罪行。我过去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看到，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放下笔，老人昂然走向刑场。透过身边林立的刺刀，他遥望蓝岭山巅，无限深情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我今天才有幸真正认识它。”负责行刑的刽子手问他：“拉绞索时，要不要我给你一个信号？”“不，不要，利索点搞完了事。”老人镇定地回答。

这位名叫约翰·布朗的老人，究竟犯了什么重罪，要被处以如此极刑？这还要从美国废除奴隶制运动说起。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由于未能在宪法中对于奴隶制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得此时的美国并存着两种社会制度：北方各州是工商业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南方各州是大种植园形式的黑人奴隶制。成千上万的黑奴，在监工的皮鞭棍棒下，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过着非人的生活。即使在废除了奴隶制的北方，种族歧视也十分严重，黑人被排除在许多行业之外。南方奴隶主还可以任意在北方自由州搜捕逃奴。

从18世纪20年代起，废除奴隶制的呼声激荡着北美大陆。北方各州的工人、农民、黑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纷纷投入这一运动。他们到处演讲，印发报刊和书籍，对万恶的奴隶制进行揭露和抨击。斯托夫人所著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接连再版，轰动一时。

废奴主义者还组织了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地下铁路”，帮助黑奴逃离南方，移居加拿大或美国北方。地下铁路的内部分工明确：“经理”是逃亡行动的组织者；“乘务员”是向导；“乘客”是逃奴；“车站”则是中途供应食宿的中转站，大多安排在同情废奴运动人们的家中。参加地下铁路工作的白人，最多时达到3000多人。到1860年前，大约有4万名黑奴，通过地下铁路而获得了自由。

约翰·布朗于1800年出生在康涅狄克州的一个白人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参加过独立战争，父亲是一名积极的废奴主义者。他的家庭就是地下铁路的“中转站”。在家庭的熏陶下，布朗从小就同情奴隶。成年后，他积极参加反奴隶制斗争，结识了很多黑人朋友。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女婿都成了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1854年，南方种植园奴隶主派遣武装匪徒进犯堪萨斯，用刺刀在那里强行建立奴隶制。此事激起了北方人民的愤怒。大批工人、农民武装起来，涌入堪萨斯，同种植园主发生了武装冲突。堪萨斯成为美国南北两种社会制度尖锐斗争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布朗虽已年过半百，仍然和四个儿子、一个女婿，先后赶往堪萨斯，被任命为堪萨斯义勇军“自由近卫队”上尉。在保卫奥萨瓦扬米的战役中，以少胜多，打退了十倍于己的敌人，“奥萨克扬米的老布朗”名扬四方。

在参加堪萨斯战斗期间，布朗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实现解放黑奴的伟大计划。1859年10月16日，59岁的布朗带领着一支22人的队伍，在弗吉尼亚州的哈泼斯渡口举行武装起义，迅速占领了波多马克大桥、军火库，控制

了整个城镇。起义者逮捕了当地的奴隶主，并开始解放附近农场的奴隶。由于当地黑奴较少，大多又是家庭奴隶，响应起义者仅有 50 余人。加上联络不通，地方民团和军警很快集结，反扑过来。布朗等人被迫退守到一个消防站里。

林涛在怒吼，河水在奔腾，最后的时刻来临了。起义战士关闭门窗，在墙上挖开枪眼，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两昼夜的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包括布朗的两个儿子在内，共有九人牺牲，六人逃脱，布朗等七人被俘。奴隶主法庭判处布朗及其战友绞刑。

布朗就义的当天，北方各州下半旗致哀，高大建筑物都饰以黑色标志，教堂鸣钟，以示哀思。约翰·布朗起义虽然失败了，然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解放奴隶的事业却是不朽的。

“约翰·布朗的尸体埋在坟墓里，可是他的灵魂继续前进！”

美国内战时期，北方军队中的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一起，正是高唱着这首《共和国战歌》奔赴战场，最终打败了南方的叛军。

忘记科学便失去力量

1860年9月，在荒凉的阿尔卑斯山，出现了两个奇怪的旅行者：一位年近40岁的中年人和一名当地向导。他们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驮着一件奇怪的行李——一箱盛着肉汤的尖头玻璃瓶。他们爬山越岭，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终年积雪的山顶。他们没有休息或去浏览山顶风光，而是赶忙从木箱中取出20个玻璃瓶，然后打开封口，让山顶的新鲜空气进入瓶中，接着用酒精火焰封口。全部完成后才心满意足地带着瓶子下山了。

他们在干什么？这位中年男子是谁？

他就是法国伟大的科学家、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路易·巴斯德。

1822年12月，巴斯德出生在法国多尔的一个皮匠家庭。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在读书方面，他受到特别的“照顾”，更可贵的是，巴斯德从小就很有志向。由于学习用功，曾多次得奖。18岁时，他在给读书不认真的妹妹的信中写道：“立志是一件重要的事啊！志向是工作的先导，而工作伴随着胜利。意志则是通向光明、幸福和胜利的大门，工作便是入门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有个‘成功’来伴随和庆贺你们的努力。”妹妹读了信后十分感动，从此用功读书。

巴斯德是个十分看重工作和事业的学者。1849年1月，27岁的巴斯德来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化学教授。在同校长洛朗一家的交往中，他爱上了校长的女儿玛丽。依照当时的习惯，他给玛丽的父亲写了一封正式的求婚信：“我两年前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任中学物理教员。18个月前我被授予博士衔，……我的家只有一笔小小的遗产……，但我却有着大学教授的远大前程……”

玛丽一家接受了这位富有远大前程的青年人，但到婚礼那天，他却是被人从实验室拉到婚礼现场，他嘴里还在嘟囔着：你们该知道，我每周六天连续不断地讲课和编写讲义，只有星期天才完全属于我——属于我的科学工作。

1858年，法国鲁昂博物馆馆长普歇宣称：他已用实验证实了生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天然自生”。例如，有机液体只要发生腐败，就能够自然诞生出新的生命，并不需要从外部输入生命的胚种。

生命真能自生出来吗？1860年，法国科学院悬赏2500法郎以解决这个问题。此时，正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职的巴斯德，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决心用实验的结果来推翻“天然自生论”。他用一团干净的棉花塞在玻璃管里，然后抽走空气，这样，空气中的微尘都被过滤在棉团上，在显微镜下可以在棉团上发现大量的微生物，把这些沾有微尘的棉团放入经过煮沸的有机液中，液体不久就因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而腐败。巴斯德从而得出结论：飘浮在空气中的微尘是有机液体，“生微生物和发生腐败的根源。”

为了让那些“天然自生论”者彻底认输，巴斯德决定找一个空气洁净的地方，再进行一次实验。这样，他就来到了阿尔卑斯山，进行了开头所说的那个吸取空气样品的登山“旅行”。这次实验的结果，20瓶新鲜空气中，只有一瓶变了质，这就更加证实巴斯德的结论。他以此发表了《论空气中所含的微生物》的科学论文，进一步断定空气中有微生物胚种，并指出这些微小生命就是引起有机物腐败和人类疾病的根源。这是人类第一次认识微生

物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法国科学院鉴于巴斯德的这一伟大功绩，把悬赏的奖金授予他，从此，巴斯德被公认为是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

但是巴斯德并未就此满足。1865年，他在研究蚕病原因时，第一次找到了致病的微生物，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病菌”。两年后，他又找出了防止蚕病传染的方法。从此，巴斯德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防止病菌传染的方法，并向医生们宣传和推广高温杀菌法。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这种无菌医疗、安全可靠的消毒方法，称之为“巴氏消毒法”。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巴斯德热心引导青年献身科学事业。他特别不能容忍那些空头政治家。普法战争期间，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写道：“那批政治家，天天空谈那些抽象的政治问题，却不谈根本大计。现在的祸患正是我们应得的惩罚。50年来，我们忘记了科学，以致失去了发展它的条件，从而失去了它在民族命运上所应提供的无限力量。”

1880年后，巴斯德在研究鸡霍乱病和羊炭疽病的基础上，掌握了制造疫苗的方法，并开始研究人类疾病的病菌。经过广泛试验，制成了伤寒、霍乱、白喉、鼠疫等多种疫苗，从而有可能开始控制多种传染病的蔓延。

狂犬病是一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病毒性急性传染病，死亡率极高。巴斯德在晚年致力于研究狂犬病的急救和防治方法，精心研制出一种狂犬病疫苗。

1885年7月的一天，一位妇女带着9岁的儿子来找巴斯德求治。当巴斯德得知这个名叫麦斯特的男孩是为救护同伴而被疯狗咬伤14处时，十分感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同意使用仅在动物身上作过试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第一针后，孩子睡得很好，随后逐渐加大剂量，连续治疗了10天，先后注射12次，奇迹出现了，奄奄一息的男孩被救活了。狂犬病被征服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四方，仅经巴斯德亲自救活的就有349人。

为了表彰巴斯德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法国政府决定授予他大十字勋章。巴斯德坚持。除非他的两个助手也同时得到奖章，否则他决不受勋。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受勋后，他们三人热情拥抱，互相祝贺。

1874年，法国政府在发给巴斯德1.2万法郎养老年金的同时，决定建立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巴斯德学院”。世界各国闻讯后纷纷捐款赞助。1888年11月14日，巴斯德学院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政府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仪式。与会者高度赞扬了巴斯德为人类科学事业所做出的革命性的贡献。

巴斯德在答辞中，谈到了自己一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当你相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件重要的科学发明并热切地希望将它发表时，你自己先要克制几天、几周，甚至几年，要想方设法推翻自己的实验。只有在一切相反的假说统统排除以后，才将你的发现公之于众。”

巴斯德十分关心青年人的成长，经常勉励他们要抓紧大好时光，不要虚度光阴。他说：“青年人要首先问问自己，‘我学习了些什么呢？’还要问问自己，‘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呢？’最后，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愉快地知道，你已经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多少做了点贡献。”

巴斯德用一生的奋斗实践了自己的愿望，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认为，他的工作不只是为了法国，他说过一句名言：“科学无祖国。”他的贡献正在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1892年12月27日，法国政府为巴斯德70寿辰举行了盛大宴会。当衰弱残废的巴斯德挽着法国总统的手臂走进大厅时，来自法国和国外的著名人物和科学家，起立鼓掌向他致意，乐队奏起了胜利进行曲。在许多人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后，英国的伟大科学家李斯特在最后的颂词中说：“你为世人揭开 f 传染病的黑幕！”

这时，巴斯德站了起来，与李斯特热烈拥抱。一生朝气蓬勃、声音洪亮的巴斯德，这时因半身麻痹，说话声音已极其微弱。

1895年9月27日，正在威尔涅甫休养的巴斯德与世长辞。终年73岁。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当年曾被巴斯德救活的牧养童麦斯特，后来一直留在巴斯德学院做看门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要破坏巴黎的巴斯德墓，这时已年过七旬的麦斯特，为守卫巴斯德墓而献出了生命。

俄国农奴制的废除

19 世纪初年，俄国政府的报纸上，不乏出售和交换农奴的广告。如：“出售：家奴两名，一名为照看猎犬者，并会做鞋，现年 30，已婚。其妻为洗衣妇，并会放养家畜，现年 25。一名为音乐家兼歌手，现年 17，能吹大笛，唱低音。关于价格，可至阿尔巴特街第一号公寓 17 号甲接洽。”

此时，欧美先进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已普遍采用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而在俄国，却依然盛行人身依附的封建农奴制。俄国皇室、贵族、教会和国家占有全部土地，农民按其所依附的对象，分为私有农民、国家农民和采邑农民。农民租住地主的土地，除缴纳繁重的地租和服劳役外，他们的一切，包括人身、子女都属于农奴主所有，毫无人身自由。正如一位俄国文艺评论家所描绘的那样：农奴制的俄国暗无天日，就像一个监狱、一口棺材，散布着腐朽的臭气。到 19 世纪中期，由于俄国农奴制度已日益衰落，使整个俄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农业生产停滞，工业开工不足，生产水平极端落后。废除农奴制，为日益成长的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已成为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在俄国农奴制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1856 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更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极端腐朽：通往前线没有铁路，军队和辎重仍用大车和帆船运送；老式步枪只有 300 步的射程；士兵像囚犯一样服役；军官贪婪愚懦，指挥无方，前线甚至连军用地图都没有。

战争的破坏，连年的灾荒，加上沙皇政府的横征暴敛，使俄国人民再也难以容忍，农民起义次数逐年增加，1860 年全国发生了 108 次农民暴动。

极端黑暗的统治导致尖锐的阶级斗争，动荡不定的时代产生了大批有识之士。继十二月党人之后，俄罗斯的土地上又涌现出了果戈理、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一批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发出惊雷般的“自由的俄罗斯言论”。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钟声》杂志上发出呼吁，俄国“首要的、必要的、刻不容缓的步骤”是要“把言论从检查制度中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地主压迫下解放出来！把纳税者从严刑毒打中解放出来！”《钟声》传遍了俄国，打破了俄罗斯大地上奴隶般的寂静，敲响了农奴制的丧钟。

1856 年，在内外交困中上台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深感农奴制已无法维持下去。他在接见莫斯科贵族代表时无可奈何地说：“谣传说我想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你们可以随意见论这件事。不过，不幸的是农民和地主之间存在着敌视的感情……我确信，迟早我们要解决这件事……从上而下来解决这一点，比从下面来解决要好些。”

1857 年，在形势逼迫下，亚历山大二世召开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着手讨论和草拟解放农奴的方案。但是阻力仍然存在。秘密委员会里的执行主席背着沙皇散布说：“宁愿把手砍掉也不签字同意农民带土地获得解放。”由于各种阻力，草案的起草工作拖延了好几年。

- 1861 年 1 月 28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改革草案时，亚历山大二世急不可耐地重申：“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今后的任何拖延都会有害于国家。”。1861 年 2 月 19 日，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废除农奴制的特别宣言》，声称：“在祈求上帝赐予援助后，朕决定把这一事业切实地推动起来。· · ·，...农奴在适当的时候将获得自由农民的

一切权利。”接着，他又批准了一系列法令，包括《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般法令》、《赎地法令》以及《地方法令》等 17 个文件。其要点是：

一、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享有自由农村居民的各项权利；地主不得任意买卖、交换、抵押或赠送农奴，也无权干涉农奴的家庭生活。

二、农民在获得人身自由时，可以通过赎买得到宅旁园地和份地。宅旁园地依法缴纳 60 卢布的赎金，六个月后即取得所有权，份地在法律上仍属地主，农民有永久使用权。在此之前，农民仍要对地主尽一定义务。

三、为了管理解放后的农民，沙皇政府利用！日的村社组织，在村社上面组织乡。村社和乡隶属地方政府，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地主贵族在“调停者”的名义下对地方政府拥有监督权。

沙皇政府还在解放农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其他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2 月 19 日法令保留了较多的封建主义残余。

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役的时间长，农民表示不满，各地部出现过暴动和骚乱。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也对法令对农民的剥夺予以了揭露。赫尔岑在《钟卢》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娟”。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但是，这些运动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遭到逮捕。

1861 年解放农奴的法令公布后，俄国的欧洲部分计有 1025 万隶属于地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1863 年和 1866 年，沙皇政府又分别解放了 100 余万采邑农民和 900 余万国家农民。前后共计解放了 2100 余万男性农民。女性农民也同时获得了解放，但不取得份地，也不必付赎金。

解放农奴法令尽管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但它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纲领，它是俄国历史上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它使二千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为资本主义工厂提供了自由劳动力；通过向农民收取的大量赎金，为大机器生产提供了资金。改革以后的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

铁血宰相俾斯麦

1862年9月的一天，在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大厅里，议会预算委员会和内阁成员正在面红耳赤的辩论着一个重大问题：是否批准内阁提交的增加军事预算的要求。正当人们各执一词。辩论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一个前额很高、蓄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突然站起来，表情严肃地说：

“诸位，德意志的未来在于它的强权和实力。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演讲和众多的议决，而是靠铁和血！”

全场内的人们不禁为之一愣。一位议员冷冷地说：首相阁下，您就职刚刚一个星期，我希望你能够尊重议会的权力。如果政府方面再次要求增加军事预算，议会仍将再度否决！要是您一意孤行，那么议会有权罢免您！”

这位中年男子嘿嘿冷笑道：“议员先生，您错了。我们这里不是英国。我们这些大臣是国王的奴仆，而不是你们的奴仆。我将坚决奉行铁血政策，并将不顾议会的决定而进行军事改革！”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此时担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的奥托·俾斯麦。他因发表了这篇充满暴力色彩的讲话，从此被人们称为“铁血宰相”。

1815年4月1日，俾斯麦出生在普鲁士的一个大容克地主家庭。他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童年。在大学期间，他曾与同学作过27次决斗。1835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使斯麦回到家乡管理自己的两处领地。强壮的体格，粗野的个性，追求目标的毅力，不择手段的极端现实主义态度，构成俾斯麦的个人特点。

俾斯麦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素以分裂割据，小国林立而著称的德意志，刚刚组成了以奥地利为主席的德意志邦联。但是这个邦联松散无力，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统一的货币、关税和度量衡。这种混乱状态破坏了德意志的商业和交通，严重妨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在各方面明显落后于英法等国。因此，作为邦联内的军事封建大国，普鲁士从贵族到资产阶级，都盼望着由普鲁士来统一德意志。

俾斯麦成年后，在政治上属于顽固的保守派。1848年3月，当他听说柏林发生革命时，毫不犹豫地自己的领地上组织了军队，准备开赴柏林救驾，以解国王之危。他狂热的容克立场，赢得了国王威廉一世的赏识和钦佩。

在此后的10年中，俾斯麦一直担任普鲁士国驻德意志联邦代表会的代表，在政治上开始飞黄腾达。1859年出任驻俄大使，1861年改驻法国。1862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自此之后，他把持普鲁士——德国政权长达30年之久。

俾斯麦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时，正是德国处在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这使俾斯麦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能，实现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领导之下的政治主张。他通过三次发动对外战争。在“铁和血”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1864年，俾斯麦首先拉拢奥地利，共同对丹麦开战。在打败丹麦后，俾斯麦在瓜分战利品时设下围套，让奥地利获得荷尔斯泰因，普鲁士夺得石勒苏益格。由于从普鲁士到石勒苏益格必经荷尔斯泰因，这就为普、奥冲突埋下了伏线。

俾斯麦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打败德意志邦联内的最大对手奥地利。他深知只有打垮奥地利，才能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德国。为此，他先拉拢

意大利签订同盟条约，然后又用甜言蜜语稳住俄国和法国，取得了他们不干涉德意志内部事务的保证。一切部署就绪后，俾斯麦于 1866 年 6 月，下令普军侵入奥地利不久前占领的荷尔斯泰因。普奥战争爆发。

7 月 3 日，两军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村展开决战。俾斯麦投入大量兵力，孤注一掷，自己则怀揣毒药，以备不测，结果普军大获全胜。

同年 8 月 23 日，普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奥地利宣布退出德意志邦联，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拿骚、法兰克福四个邦国被并入普鲁士。1867 年，普鲁士在统一了德意志北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俾斯麦在统一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三步是普法战争。1870 年 9 月，法国在俾斯麦挑动下首先对普宣战。色当一战，拿破仑三世被俘，普军大胜。1871 年 1 月 18 日，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晋升为公爵。他是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和普鲁士邦的宰相，大权独揽，1890 年，新继位的德皇威廉二世不愿受到这位老宰相的束缚，利用俾斯麦内外政策的失利，迫使他主动辞职。他离开柏林，回到卡尔斯鲁厄庄园。1898 年 7 月，俾斯麦在孤独中死去，终年 83 岁。

炸药大王可贵的遗嘱

186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一位29岁的青年同他的两个哥哥一起，来到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的一条河边。在选定了一处合适的地点后，三人放下手里的东西，开始忙碌起来。

只见那位年轻人把一支封好的玻璃管，放进一支锡管里，装上导火索，点燃之后猛地扔到河里。一声巨响，水柱升起，大地震动。他们三人相视而笑，“啊！威力真大！”那位青年高兴到极点，“紧闭着的爆炸大门终于被我敲开了！”他情不自禁地大声喊起来。

这位青年就是世界闻名的化学巨匠、“炸药大王”诺贝尔。1833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出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军医，父亲是一个发明家，长期致力于爆炸性化学的研究。诺贝尔刚出生，一场大火，把全家烧得残破不堪。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前往芬兰，后又转往俄国工作。诺贝尔9岁时，随全家来到俄国。父亲为他们兄弟三人请了位俄国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精通工程技术，他除了教授俄语外，还常常给他们讲授科学技术知识。就是这位俄国教师，在诺贝尔稚嫩的心田上，撒播了科学技术的种子。

17岁时，父亲把诺贝尔送到美国，学习了两年的造船工程。回到瑞典后，诺贝尔便把主要精力放在炸药发明上。几年后，他和父亲，哥哥一起，发明了一种液体炸药，其爆炸力十分强大，人们称之为“诺贝尔爆发油”，风行全世界。

但是，液体炸药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非常不容易运输和保管。一次，美国旧金山一辆运送液体炸药的火车，在途中受到震动，整个列车被炸得粉碎。不久，满载液体炸药的巨轮“欧罗巴号”，因风浪颠簸引起炸药爆炸，沉没在大西洋中。这样一来，弄得世界各国都害怕“诺贝尔爆炸油”，许多政府不准它进口，运输公司则大多拒绝承运这种可怕的液体。

“怎样使炸药能够安全运输呢？”诺贝尔反复思考和试验着。1864年9月3日，一场灾难终于爆发了！只听“轰”一声巨响，黑色的浓烟直冲天空，诺贝尔实验室顿时化为灰烬。当场有五名工作人员被炸死，其中一人就是诺贝尔的弟弟，诺贝尔的父亲也从此半身不遂。

正当炸药试验困难重重时，诺贝尔又接到政府对他进行爆炸实验的禁令。诺贝尔只得搬出市区，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了一只平底船，到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马伦湖上继续进行实验。他在船上度过了整整四个年头，经过数百次的失败，终于在1867年秋大获得成功。他把液体渗入一种硅土里面，这样，即使遇到一定的温度或震动、摩擦，炸药也不会爆炸，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能够安全运输的固体炸药——黄色炸药。这种炸药必须引爆后才能爆炸。为此，诺贝尔经过多次试验，又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引爆装置——雷管。

1875年，诺贝尔又发明了威力更强大的胶质炸药。1887年，又发明无烟炸药。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支持下，诺贝尔在法国建立了炸药厂。各国商人争先恐后要求订货。到诺贝尔40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的“炸药大王”和化学工业巨子。

诺贝尔把一生献给了炸药的研制和发明，获得了杰出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他获得的发明制造专利多达255项，其中有关炸药的就有129种。但他从不在意于个人的金钱和财产，拒绝别人为他画像和刊登照片。

早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就把他所得遗产几乎全送给了瑞典的慈善机构。他认为：“金钱只要能够个人生活，就行了，过多了会成为压制人的才能的祸害。”“传给儿女过多的财产，不是鼓励懒惰，就是使他们不能发展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才能。”

长期献身于科学研究，使诺贝尔积劳成疾。1896年12月10日，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在他的工厂里突然去世，终年63岁。他被安葬在斯德哥尔摩郊区。

诺贝尔最初发明炸药的目的，是用于工程建设，造福人类。当他看到自己发明的炸药，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战争时，他感到非常痛心。为此，他在处理自己死后的财产问题时，一反旧式传统，在1895年11月27日签署了一份独特的遗嘱：

他的财产除分给两个侄儿各5000英镑外，其余的1962590英镑，全部充作基金，存入银行，把利息作为奖金，每年奖给世界各国对于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药学有重要发现和发明的人。

遗嘱中还特别注明设立和平奖，奖给为人类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些奖金被称为“诺贝尔奖金”。

从1901年起，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每年在12月10日下午4时30分，即诺贝尔逝世时，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颁发诺贝尔奖金、奖章和证书。获奖人由不同的机构负责推荐确定：物理、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医学奖由斯德哥尔摩卡罗林医学科学研究院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诺贝尔委员会评定。除和平奖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外，其余各项诺贝尔奖金，一律由瑞典国王亲手颁发。获奖者不分国别。之后，又增加了一项“经济奖”，也在瑞典颁发。

在诺贝尔金质奖章的背面，刻有这样。一句赞词：“多么仁慈而伟大的人物，人们仰赖他的贡献和发明，使得人们智慧生活更见充实。”

诺贝尔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却很少顾及个人生活。他终生未娶，一直独身。青年时代，当他所热恋的女友因病亡故，诺贝尔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失去心爱的人所造成的巨大悲痛，把全部思想感情寄托到科学事业上。正如他在诗中所述：

仰望广袤夜空中璀璨星辰，
个人哀伤其实微小似尘。
驱散难以摆脱的悲痛、惆怅，
将生命奉献于科学事业的山岗！

诺贝尔以他那不畏劳苦，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以及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诺贝尔奖金，永远激励着后来的人们。

